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甘肃中华文化学院

#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GAN SU TONG ZHAN  
LI LUN YAN JIU

2023年  
第**3**期  
总第69期

准印证号（甘）LK6200056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编辑手记

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在举国喜迎建国74周年之际,在全国开展第二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火热时节,新一期学报温润出刊,为大家奉上14篇如同玉珠一般的理论果实,期望给尊敬的读者朋友带来金秋时令沉甸甸的收获。

本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刊用了三篇力作,福建古田干部学院、中共龙岩市委党校党性党风党纪教研部副部长黄敬荣博士在《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和路径》一文中提出: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伟大精神和伟大道路探索,具有契合性和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四条实践路径: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科学世界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支撑;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精神状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赢得历史主动;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源泉。我们和作者油然而生同样的理解:以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科学世界观、蕴含的精神状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必将更好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期“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专栏奉上的是五位专家学者的饕餮美餐。党领导统一战线已经有百年的历史,基于此,忆往昔峥嵘岁月,北京社院孙宝林教授在把握其理论百年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律、重要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基本脉络的基础上挥就《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及现实启示》佳作,告诉我们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现实启示是:遵循党的精神加强理论建设;在双结合中加强理论建设;紧跟时代发展加强理论建设;在兼容并蓄中加强理论建设;结合工作实践加强理论建设,这些启示对新时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领域颇有借鉴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月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强调:希望各民主党派把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作为深化政治交接的重要内容,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讲话凸显出政治交接的重要意义,江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才学敏锐地关注了此问题,在《政治交接与民主党派能力建设研究》中总结出民主党派政治交接存在五个短板:在程序和制度方面不规范不完善;组织建设弱化;后备干部的培养受到思想工作短板制约;民主党派合作共事能力受合作意识、方式和能力的影响;政治交接建言献策能力受调查研究能力和质量的制约进而提出建立和完善民主党派政治交接的机制和制度;在政治交接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提高建言献策能力、提升合作共事能力、提高组织领导能力等五条建议。作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重要参与者的我国各民主党派,不妨俯下身子认真学习与思考,有效帮助其在扩大人民民主、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防范执政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诸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张凤玲

#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GANSUTONGZHANLILUNYANJIU

2023 年第 3 期(总第 69 期)

封面题字：何鲁鹿

#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 目 录

主管单位：

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甘肃中华文化学院

编委会成员

主 任：孙雪涛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玉真 王亚莉

石岱千 刘仲奎

李晓霞 张耀宇

杜怀明 尚勋武

苟天宏 郁川虎

赵金云 赵凌云

郭天康 姬安岳

秦 禾 秦忙龙

敏隆邦 葛建团

蒲晓贞 霍卫平

### 统战理论新思维

习近平听取新疆党政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等六则

..... (4)

###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和路径 ..... 黄敬荣(6)

坚持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 张师平(11)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民主新语义 ..... 张凤玲(17)

### 新型政治制度研究

比较政治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服务国家治理的优势 ... 王 凯(24)

新型政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 ..... 王远启(31)

###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及现实启示 ..... 孙宝林(37)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统战理念变革研究

..... 王书波 夏静雷 徐 阳(43)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创制与“两化”发展理路探赜 ... 钟科丞(48)

2023年第3期(总第69期)

2023年9月20日

政治交接与民主党派能力建设研究 ..... 张才学(55)

新时代党的留学人员事业的若干思考 ..... 张 晨(62)

网格化背景下民主党派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 屈莉莉 于 静 段文浩 刘 磊(66)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 傅 宁(70)

从左宗棠家规家训看中华文化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促进意义  
..... 柴文斌(73)

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 达文梅(78)

主 编:王亚莉

编辑部副主任:王 昊

蒲富平

执行编辑:王 昊

卢婉春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安宁西路818号

邮政编码:730070

电话:0931-7634058

0931-7783804

传真:0931-7783804

电子邮箱:

GSTZLLYJ@126.com

印 刷:

甘肃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 统战理论新思维

2023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回到国内后,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报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抓实。无论是出台法律法规还是政策措施,都要把是否有利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首要考虑。要坚定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逐步提高群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能力。要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引导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宗教观。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现代文明教育、科普教育,引导他们积极融入现代文明生活。要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人口和产业聚集度,加快建设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来源于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

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指出: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故事,是当前国际传播工作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是新时代中国最真实、最广泛、最生动的发展故事,为国际社会读懂中国提供了一个观照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贯通发展实践与价值理念、融合中国发展与人类进步的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全新图景。要充分发挥现代化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议题引导和议程设置作用,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阐释和选题策划,更全面、更生动、更有效地讲好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故事,推动国际受众更好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念、路径模式及其世界意义,更好地读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不断地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力量。加强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发行宣介,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蕴含的价值理念、政策主张。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国际传播研究,针对国外受众策划推出简明易懂的知识读本,并将其融入媒体传播、人文交流和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增强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国际认同。以历史视野和时代情怀讲述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实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工程,深刻阐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讲好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贡献、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贡献,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现实贡献、对建设人类美好未来将作出更大贡献。(来源:《学习时报》(2023年8月21日A1版))

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智库副理事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郑筱筠指出: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机制,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首先是转化,是在坚持“两个结合”(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次是深化,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中华文化经过浸润之后形成融和机制作用于宗教,达到“通”的效果和目标;最终是内化,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融通”的基础上,展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最终达到中华优秀文化浸润宗教的“润化”的效果和目标。(来源于《中国宗教》2023年第7期)

陈心颖学者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近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意见》极大地提振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为推动我国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心剂。为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与预期,是切实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需要厘清关于对民营经济认识和实践中的误区。一是要谨防民营经济“走过场”的误区,树立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信心;二是谨防“污名化”的误区,提升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光荣感和责任感;三是要走出“用力失衡”的误区,构建既“亲”又“清”的政商关系;四是要走出“所有制歧视”误区,促进国企民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来源于《学习时报》(2023年8月21日A1版))

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金瓯以浙江省党外人士“同心同廉”建设为例,提出了推进党外人士“同心同廉”建设的对策建议:一是通过在党内开展党外人士“同心同廉”工程相关内容的学习,打造面向党外人士的清廉文化阵地,强化思想引领,进一步凝聚“同心同廉”共识;二是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党外人士“同心同廉”工程实施方案,包括目标任务、配套机制和评价方案,规范、高效推进工程建设;三是完善清廉党派组织制度建设和清廉民企制度建设,引导建立全方位的社会监督体系,提升清廉建设能力;四是优化健全工作机制,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立并完善党委牵头主抓、部门具体落实、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充分调动发挥各部门的独特资源和特色优势,打破边界、形成合力,推动统战系统与纪委监委、公检法司、组织部、公检法司、审计、税务等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增强沟通联动。(来源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徐国民和王国洪研究生指出:“两个结合”论断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是我们党在新征程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其中“第一个结合”侧重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第二个结合”侧重马克思主义要扎根中华文明,具备民族特色,为中国人民所掌握,成为改造世界的

强大物质力量。“两个结合”就其目标来说,直接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要将这种理论的指向性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必须在动态发展中实现紧密结合。

首先,要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实现动态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具有内在一致性,道路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而探寻道路的实质就在于推进“两个结合”,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面向民族复兴大业,我们必须立足现实、直面问题,不断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与思想文化底蕴,在解答现代化道路总问题、破解西方现代化陷阱、求索人类社会发展“三大规律”进程中,进一步夯实和拓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其次,要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实现动态结合。一种新型文明类型的出现,必须以一种区别于其他文明类型的文明复兴为标志,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创造的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中所呈现出的新成就,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因此在结合过程中,我们既要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充分激发中华文化活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焕发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璀璨光芒;又不能妄自尊大、泥营粟斯,而必须看到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融合创新是历史发展大势所趋,要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中不断吸收养分、凝聚共识。最后,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动态结合。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于应对当今世界日益突出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现实需要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共同需要,充分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胸怀与智慧,深刻描绘了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建美好世界的未来蓝图。而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必须立足传统,不断发掘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基源泉的中华和合文化的丰富内涵,从根源处充分汲取养分、受到涵养。(来源于《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责任编辑:张凤玲

# 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 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和路径

黄敬荣

**【摘要】**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伟大精神和伟大道路探索,具有契合性和内在联系。从逻辑上看,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上具有契合性。从内在联系看,伟大建党精神具有主客观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统一的特点,伟大建党精神的四个维度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内涵。从实践路径看,伟大道路探索离不开伟大精神指引,在新的赶考路上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 逻辑 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sup>[1]</sup>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精神的引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

目前学界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密切关系。<sup>[2]</sup>然而,学界就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间到底存在何种具体联系、如何联系缺少较系统的探究,这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内在关联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本文试图探究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关系,厘清两者之间的契合性,既有利于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又有利于以伟大建党精神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 一、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契合逻辑

### (一)历史逻辑:近代中国大变局是逻辑起点

近代中国面临着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近代中国该何去何从、路在何方成为当时面临

的时代课题。近代中国各阶级都在探寻救国救民、救亡图存的道路和方案,并开始了在这样时代大变局下气壮山河的“寻路”的征程。这样的历史背景成为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历史根基,蕴含着的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历史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就其本质而言是道路探索问题,近代中国卷入到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体系中,近代中国人对工业化、近代化的认识体现了对现代化的向往和追求。但各种救国方案和救国道路尝试后都以失败告终,意味着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救国道路是行不通的,注定不能亦步亦趋跟在他国后面,必须基于本国国情,独特的历史命运和面临的时代课题也决定着中国道路探索的独特性和艰巨性。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sup>[3]</sup>。放到近代中国时空背景下考察,路在何方的道路探索问题是当时面临的课题,也是近代中国历史逻辑的起点。历史逻辑看,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都是在近代中国道路探索中形成的,在历史逻辑上相契合。

###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原点

**基金项目:**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研究基地2023年度项目“从契合到引领: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和路径”。

**作者简介:**黄敬荣,男,福建古田干部学院、中共龙岩市委党校党性党风党纪(廉政教育)教研部副部长,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



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近代中国先进分子放眼世界寻求新的理论以实现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在经历一次次失败后,最终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近代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也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其科学性和真理性赋予伟大建党精神以源头活水。中国共产党创党先驱们还根植中华大地的沃土,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自强不息的精神、民本思想、爱国主义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精神的高度契合中共同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批判中形成的,诞生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见证了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通过“现代化的工业”“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产关系”“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等表达着现代化思想,对西方现代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反思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深刻影响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思想。早期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的认识基础上,提出以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为条件,建立起“更高级的、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sup>[4]</sup>,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主义社会形态。

从理论逻辑看,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原点。马克思主义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影响深刻,也深刻影响近代中国道路探索,使中国人民精神上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 (三)实践逻辑:孕育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奋斗

伟大建党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创党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在内忧外患的革命环境中,为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压迫,早期中国共产党先驱们不惧白色恐怖,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开始创党活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信仰追求、初心使命、政治品格和斗争精神,这些都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特质。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丰富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还形成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受到降维打击的近代中国人对工业化、近代化等现代化概念有了初步认识。当时的“体用之争”展现了如何实现近代化的理论探讨;洋务运动学习和效法西方则是追求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在20世纪30年代前多以“新化”(梁启超为代表)和“欧化”(陈独秀为代表)表达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体现对文化现代化的追求。早期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如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对工业化、近代化、现代化等有了较深认识,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要实现民族独立才能为实现现代化奠定根本条件。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启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社会改造才能实现现代化,党的一大党纲就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sup>[5]</sup>,中国共产党将改造旧社会为己任,为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创造条件,中国对现代化的探索发生历史性转变。

可见,从历史逻辑看,近代中国大变局是理解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是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原点;从实践逻辑看,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都孕育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奋斗。在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上,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逻辑契合性。

## 二、伟大建党精神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影响

(一)精神原点:在主客观统一中让中国式现代化更具科学性、独特性

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原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创建中国共产党,并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人运动和革命实践,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形成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些精神成为推进中国伟大社会变革、伟大道路探索的不竭精神动力,并在此过程中成功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主客观的统一,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

伟大建党精神让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科学性。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内涵,体现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坚定性和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认识、改造世界,辩证科学地看待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充分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弊端明显,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国家通过血腥的殖民掠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逻辑,带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实现的是物质和精神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深刻认识到我们追求的现代化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同时,不能走西方通过战争、殖民、掠夺实现现代化的老路,而是通过和平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这些都让中国式现代化更具科学性。

伟大建党精神让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特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做到“两个结合”,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让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特性。中国式现代化打破所谓“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走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优势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从实践道路看,我们走的是不同于西方“串联式”的现代化道路,而是“并联式”的现代化道路;走的不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打破西方国强必霸的逻辑。同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领导力量,也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主客观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是因为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有别于西方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的政治品格,在推进现代化中能够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秉承自我革命的特质,以强大的领导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 (二)精神动力: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精神力量

在方法论层面,伟大建党精神“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内涵体现中国共产党奋勇向前的昂扬状态和敢于斗争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创建中国共产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怕

牺牲、舍生忘死的品质和奋勇向前的精神状态,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以积极昂扬的状态推进现代化事业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

伟大建党精神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奋勇向前的精神状态。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民族大义,舍生忘死、舍生取义、英勇斗争,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奋进精神,最终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创造根本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掀起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涌现很多生产英雄、建设英雄、发展英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在伟大觉醒、伟大创造中走出一条现代化建设新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更加主动的精神力量、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开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伟大建党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以斗争精神攻坚克难的勇气。“不怕牺牲”蕴含着的是“敢不敢”进行斗争,“英勇斗争”蕴含着的是“能不能”斗争、“如何”斗争。面对外部挑战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坚持“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敢于举旗亮剑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体现的是敢于斗争,同时以高超的斗争智慧善于斗争,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成功应对和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对于国内的矛盾、问题,敢于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自我革命的勇气进行斗争,勇于以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坚定不移深化改革,也善于在斗争中求团结、求进步,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 (三)价值旨归:在党性和人民性统一中突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党性和人民性是高度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是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这既是党性又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在价值论层面,“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内涵体现中国共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将中国式现代化既作为党的事业,也作为人民的事业,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坚强的领导力量。“对党忠诚”的内涵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保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推进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力量、精神状态、破解难题、创新发展等都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这项前无古人事业的推进注入活力,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历史伟业,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因人民而立、因人民而兴,始终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同样如此,“不负人民”的内涵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民立场和价值目标,充分体现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落脚点,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性,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更加突显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等独特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既锻造了中国共产党本身,又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既成功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自身又成为全体人民、社会主义事业最可靠的主心骨,实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四)实践向度:在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统一中赋予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从实践论层面看,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内涵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特质,体现中国共产党将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相统一,既认识到党的初心,又认识到要担负使命,赋予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使命。

在初心使命的统一中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和自觉。中国共产党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源自何处?重要的是源自于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自觉。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创造根本条件,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改革开放,带领中华民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可见,践行初心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动力。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担当使命中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实践逻辑,摆脱落后挨打现状和西方殖民主义逻辑,而是以伟大复兴的目标指向和逻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西方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践行初心中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道路自信和自觉。

在初心使命的统一中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光明前景。就我们面对的形势和国情而言,我国要实现的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4亿人口规模的现代化,相当于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量;我国还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艰巨性、复杂性可想而知。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任务的艰巨性,勇于担当使命,肩负起历史重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同时,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接续奋斗中,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光明前景。

可见,伟大建党精神的四个维度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伟大建党精神具有主客观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统一的特点,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使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被动转为主动,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 三、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实践路径

(一)以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科学世界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支撑

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是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同时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新的赶考路上要以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科学世界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支撑。

首先,以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唯物史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自觉运用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唯物史观指导实践,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要深化对社会建设规

律的认识,深刻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重大时代课;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独特的世界观、文明观、价值观、生态观等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新图景。其次,以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实践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以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实践观,深刻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在实事求是中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光明前景和面临的挑战,从不断发展的实际出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践行好初心使命。还要在“两个结合”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凝心聚魂、指导实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后,要以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人民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要将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人民至上的科学内涵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奋斗目标,将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激发人民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热情和积极性,凝聚起磅礴伟力,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品格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也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中、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锤炼政治品格。新的赶考路上仍要发扬好这些政治品格,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是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牢记初心使命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征程,中国共产党要始终牢记自己“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深刻认识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其伟大意义、光明前景,肩负起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二是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要发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推进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三是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的“赶考”路上,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勇于自我革命,打破利益藩篱,清除改革道路上的障碍,更好实

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以自我革命的勇气进一步正风肃纪,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以优良的工作作风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前进。

(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精神状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赢得历史主动

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着开拓进取的发展观和精神状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践中探索到的道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新的赶考路上,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精神状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赢得历史主动。

第一,以奋进的精神状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赢得历史主动。在新的征程,仍需保持昂扬斗志、顽强意志,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源头活水的精神力量,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以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担当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担当精神积极作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要敢闯敢试,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探索出新路子,在解决发展问题中出实招,在深化改革上寻求新突破,在激发内生动力上勇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担负起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第三,以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斗争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发扬斗争精神,认清斗争形势,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与各种反和平、反进步的势力作斗争,维护事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稳定发展等核心利益。还要增强斗争本领,做到原则问题寸步不让,策略问题灵活机动。最终做到在斗争中求团结,积极团结和争取各种力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谋求合作共赢,让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世界发展相得益彰,既在世界发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又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 四、结语

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伟大精神和伟大道路探索,从逻辑上看,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上具有契合性。从内在联系看,伟大建党精神具有主客观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统一的特点,

(下转第30页)

# 坚持我国新型政党制度 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张师平

**【摘要】**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冲锋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关问题研究方面,不能脱离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时空境遇,不能缺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分析视角。本文首先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家政党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政党制度具备高度的整合功能、良好的稳定功能和有效的民主功能。进而论述实践中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和功能,能够形成有机整合、促进长期稳定、践行人民民主,从而充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政策建议,即要着力推动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继续建设高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并高度重视将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统一起来。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式现代化 政党政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1]</sup>党的二十大集中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也由此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冲锋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需要全国上下团结奋斗”<sup>[2]</sup>。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不是旁观者,而应该是亲历者、实践者。作为一种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新征程上,如何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功效,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聚众智、建诤言、献良策,是一项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不同维度、不同侧面,有不同的话语表达和路径阐释,但不管怎

样,不能脱离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时空境遇,不能缺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分析视角,这也正是本文尝试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角度来阐释和论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关问题的动因所在。

## 一、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对国家政党制度的独特要求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由古代文明转型为现代文明的总趋势、总进程,“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标志,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sup>[3]</sup>。现代化事业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事业,而是全人类共有的事业,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努力提高自身的现代化水平。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起点不同、国情各异,现代化进程和道路也不尽相同。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超大规模国家要全面迈向现代化,更要努力探索一条既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又切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国家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奋斗。在

作者简介:张师平,男,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成功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化新路。正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生发于近代中国和新中国成立最初三十年,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以开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变革性实践中得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一幅现代化的全新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实践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国家的整个制度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制度体系要与之配套,要能够有力地支撑起这一伟大事业。也即是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系列制度作支撑,而“政党制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支柱之一”<sup>[4]</sup>,因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又特别强调了对国家政党制度的独特要求。

#### (一)要求政党制度具备高度的整合功能

近代以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整个国家处于一种一盘散沙的局面,这种境况下,且不说实现现代化,就连最基本的生存发展环境都很难维系,“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sup>[5]</sup>。后续中国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深刻总结道,“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sup>[6]</sup>。基于此,中国所开展的现代化建设,有自身独特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出的答案”<sup>[7]</sup>。即使中国艰难开启了现代化历程,也是作为一个后发赶超型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按照美国政治学者布莱克的观点,后发型国家实行现代化的赶超性,要有强大的政治权威来发挥一些导向和组织功能,而且面对社会转型中大量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也需要通过强大的政治权威来给予协调与保障社会的秩序。否则的话,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进程就会受到阻滞,就会出现所谓的现代化中断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实行的是国家主导的后发赶超式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要求国家制度有强大的整合功能,要求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样才能有效引领和推动国家沿着现代化目标坚定前行。亨廷顿也非常鲜明地提出,现代化发展需要强大的社会整合力,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整合力,在

进行现代化这么艰难的道路上很可能失败。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作为核心制度的政党制度具备高度的整合功能,包括在意识形态、政治资源、利益关系等方面形成强有力的整合,以此来不断推进现代化事业。

#### (二)要求政党制度具备良好的稳定功能

在动乱不堪、冲突不断的旧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sup>[8]</sup>,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谈不上推进国家发展,更别奢望国家强盛。由此推之,社会稳定也理应是推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按照西方政治学观点,“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动乱”<sup>[9]</sup>,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极易出现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易于滋生动乱,搞得不好是驾驭不住的,这个往往是导致现代化难以成功的非常重要因素。比如南美洲国家阿根廷,曾经一度国内生产总值跃升至世界第七位,但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于已经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没有很好地予以处理,以致之后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的位次越走越低,很难再发展上去了,出现了所谓的“拉美陷阱”现象。所以,虽说现代化终究会带来稳定,但其进程却极易出现不稳定情况。因此,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特别强调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就中国发展情况而言,也尤其强调稳定的内外部环境。政局稳定、社会稳定是现代化国家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样绕不开这道难题,因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sup>[10]</sup>。进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艰巨任务,必然要求作为国家政治制度支柱的政党制度具备良好的稳定功能,以此确保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长期安定有序。

#### (三)要求政党制度具备有效的民主功能

一直以来,民主是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理念。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矢志不渝追求和践行民本政治,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长期走在世界前列。近代以后,即使处在内忧外患境地,中国人民也未曾放弃对民主的孜孜追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实现人民民主的历史

重任。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人民民主”理论,特别强调没有广大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应该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理应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和价值目标。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sup>[10]</sup>,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因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进一步强调“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sup>[11]</sup>。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进而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离不开制度的民主化,也离不开民主的制度化,要突出强调制度与民主之间的耦合,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sup>[10]</sup>，“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sup>[10]</sup>。质言之,没有民主,也就称不上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可以说是追求民主、实现民主的历史过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核心和国家政治制度支柱的政党制度具备行之有效的民主功能,以期更好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 二、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支撑

如前所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系列制度作为强有力的支撑,其进程必然会对国家层面的政党制度提出明确的要求。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催生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主导现代化”<sup>[14]</sup>,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当代中国政党政治模式和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确立起的第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本身就归属于政治现代化范畴,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归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发展中,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和功能,能够充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正日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的重要制度支撑。

### (一)形成有机整合,为中国式现代化累积社会条件

近代以来,在探寻现代化新路的过程中,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希冀通过政党政治来探寻新路。为此,在

政党政治模式的探索上,中国先后经历一系列实践,诸如资产阶级多党竞争模式昙花一现,国共两党合作模式最终破裂,国民党一党专制模式走向破产,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扎根中国土壤并日益发展壮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于之前的政党政治模式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整合能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前提,又有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合作,“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sup>[12]</sup>,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这是我们这项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新型政党制度紧扣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不断巩固和扩大共识,在其制度架构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广泛代表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加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又从各自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反映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利益和诉求,这样合在一起,新型政党制度的利益代表无疑是最广泛的。通过最广泛代表群众利益,形成最广泛的共识,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有机整合,这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具备整合功能,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累积社会条件的内在机理。

### (二)促进长期稳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政治前提

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发展中,需要有完善且稳定的政治体制、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作为坚实保障。一方面,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完善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国情,必须根植于一定社会深厚的土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sup>[12]</sup>。新型政党制度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又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广泛参与,以合作、协商代替了对立、争斗,避免了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能够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这一点,很好地印证了亨廷顿的观点,他认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政党的力



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sup>[8]</sup>。也就是说,一个越强大成熟的政党领导,越有利于政治稳定;一个越能够兼容和同化,包括新兴社会力量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制度,越有利于政治稳定。这两条恰恰跟我们新型政党制度的设计是相契合的,在规范政党与政党关系、政党与政权关系、政党与社会关系等核心政治关系方面,新型政党制度越来越展现出强大优越性,因而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sup>[9]</sup>。所以,虽然我们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曾经也遇到了相当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但是我们基本上能把国家稳定住,确保大局稳定,并推动国家朝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 (三) 践行人民民主,为中国式现代化供给内生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sup>[14]</sup>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sup>[15]</sup>政党制度是民主的核心制度之一,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sup>[12]</sup>,创新了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生动彰显了其制度本身的民主功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供给了内生动力。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大限度畅通各方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借助制度化渠道广泛汇集民意、议政建言,协助执政党拓宽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并及时反映所联系阶层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增进制度化的民意提取,通过人大、政协等平台听取各方面意见,在这种制度化的民意提取基础上再来进行决策,确保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新型政党制度还创新了党外监督形式,使民主监督进一步制度化程序化。“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sup>[16]</sup>。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过,在中国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只有共产党有资格犯大错误,犯了错误怎么办?有三个办法,就是三个监督,人民的监督、党内监督

和民主党派监督。<sup>[17]</sup>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挚友和诤友关系,双方互相补台而不是拆台,遇事多协商,坦诚接受监督。通过广泛凝心聚力,奔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从而形成最大公约数,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这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纷争、党派偏私的弊端,展现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促进人民民主方面的独特优越性。

### 三、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前文既已论述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家层面的政党制度有着明确的独特要求,也已阐明了新型政党制度确实在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优势和作用,顺而言之,还需着重阐发通过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不断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从而更好地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sup>[1]</sup>,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各民主党派把多党合作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结合起来,在参政议政中聚众智,在民主监督中建诤言,在政党协商中献良策”<sup>[18]</sup>。要真正保证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成功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就要把制度优势切实发挥出来,把制度效能充分彰显出来,而这需要在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上做到持续发力。

#### (一) 着力推动中国共产党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全面引领和塑造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动力机制”<sup>[19]</sup>,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最显著特征。为此,“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保证党的领导”<sup>[20]</sup>,在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方面,毫无疑问必须始终不渝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要确保新型政党制度永续发挥功效,这一制度中的各政党主体就要永葆生机活力,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着力推动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现代化,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执政党,是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决定性力量,担负着崇高使命。“所谓政党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



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生活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sup>[21]</sup>。为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应紧密围绕执政能力建设、政治把握力建设、政治领导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要坚定不移推进可以焕发出党和国家生机与活力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效发挥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要持续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建立起能够有效治腐、防腐、拒腐的党内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要坚定不移加强自我革命,真正将人民的监督、党内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落到实处。这些方面,既是推进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又在客观上有利于推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 (二)继续建设高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sup>[22]</sup>这是一个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作用,对于坚持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性,揭示了提高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效能与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用的内在关系。为此,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履行职能”<sup>[23]</sup>。民主党派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坚定不移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者、推动者、维护者,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推进自身建设和履职尽责,为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参政党担当、贡献参政党力量。一是着力提升思想政治建设能力。把政治理论学习教育放在思想政治建设的首位,以主题教育为主线,以坚定政治信念为目的,坚持开展集体学习和交流研讨,统筹开展各类学习教育活动,带动广泛自学,系统学习政治理论、制度、历史、方针和政策,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二是扎实推进组织建设。落实参政党组织建设有关文件和纪要精神,统筹推进领导班子建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组织发展工作。以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着力提高“五种能力”,完善培训活动制度。三是努力践行优良作风。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全面实施加

强作风建设的意见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倡导自觉、勤奋、求真的优良学风,端正学习态度,改进思想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思悟用紧密结合,加强自我教育,以学风建设带动工作和生活作风转变,以实际行动反对“四风”,体现新时代参政党良好形象。四是增强制度建设效能。发挥制度建设的保障作用,把制度执行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纪律教育和执行,纳入队伍建设的基本任务,健全诫勉和问责机制。

#### (三)把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坚持、完善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在当代中国政党制度问题上,必须同样秉承这种理性态度,将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真正统一起来。回顾过往,不难得出,历经七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日渐成熟。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具民主品格,富含中华文化底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体现,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为解决世界各类政党制度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树立起坚定的制度自信。但另一方面,“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sup>[23]</sup>,为此,我们要不断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推动新型政党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切实按照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和战略布局,研究制定新的制度规定,完善和健全多党合作的制度框架体系,不断推进多党合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使这一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焕发更加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 四、结语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需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全面把握新征程的历史使命、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准确把握中国民主政

治建设、爱国统一战线事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方向 and 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进程中,不断推动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服务国家治理的效能,为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彰显出制度伟力。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 郑建邦. 坚定不移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者推动者维护者【J】. 求是, 2023(8): 23-29.
- [3] 潘萌, 刘际昕.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9(1): 57-63.
- [4] 张庆黎.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N】. 人民日报, 2019-11-25(06).
- [5]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7]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23.
- [8]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 刘为,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11] 王韶兴.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6): 4-24+204.
- [12]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18-03-05(01).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1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1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1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18]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强调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 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大作用【N】. 人民日报, 2023-01-17(01).
- [19] 唐亚林、郝文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政党引领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6): 1-11+21.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 [21] 王长江. 政党现代化论【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22] 中央统战部编著.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解答【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5.
- [23]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责任编辑: 闫丽红

#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民主新语义

张凤玲

**【摘要】**让发展回归于本质要求是人类现代化的追求。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片面的、丢弃根本的现代化,其民主化造成了对共同体利益的虚置,加深了对世界的奴役和剥削。必须回到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重新解释、定位民主的内涵和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蕴涵着全新的民主观,其对民主的理解坚持了原初意义上的民主内涵,即民主是“人民的统治”,并在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确立了民主的真正意义,用人民民主的内在品性解答了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民主异化问题,回答了何谓人类所追求的真正的民主。

**【关键词】**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民主新语义

现代化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走向强大的必经之路。近代以来,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求得生存发展乃至复兴的一个核心叙事话语。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前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形成的一条中国式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蕴涵着全新的文明观,对人类社会的民主发展赋予了新语义。

##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一)现代化以发展为取向,着眼于社会实践三重关系的改造和变迁

“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和落后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以国家为研究对象,代表着超越于传统和落后的进步、先进、文明等发展状态,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向更高质量更高文明程度的一种发展过程或状态。现代化必然带来技术物质层面的发展、思想观念的更替和制度的变迁。概而言之,“现代化是标识人类文明演进逻辑和发展趋势的核心术语,表达的是人类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总体性历史过程”<sup>[1]</sup>。可见,现代化以发展为取向,既包括经济的发展,也包括思想观念、制度的变迁和发展,其核心要义是以新技术新思想新理念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让发展回归于本质,以适应时代变迁的需求,并

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

理解现代化的内涵,需要进一步明确以下问题。一是现代化不是工业化。现代化作为文明社会的核心特征,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等在内的综合发展进程,而工业化是指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仅仅是诸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程而已。如果将工业化看成是现代化,相当于用某一过程去代替整个发展过程。显然,这一理解有失欠缺;二是现代化不是西化。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先行于西欧一些国家,使得西方国家先入为主地成为第一批发达国家。但现代化绝不意味着西化,西化仅仅是西方一些国家现代化的区域性或地方性特色,并非适合所有的国家。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根据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做出规划。因此,现代化的模式不是固化的,而是可选择可调适的。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均受到来自于以下三种关系的束缚和影响:即落后自然对生产力的束缚及人对自然的破坏;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先进生产力的阻碍和对人的压迫和剥削;人的自我局限性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束缚。因此,现代化必然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包括阶级关系)、人与自我关系的改造和变迁,体现为:用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提升生产力,将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自然服务于人的发展需求并做到人与自然的

作者简介:张凤玲,女,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和谐;用先进的社会制度变革旧有的生产关系,把人从各种压迫的社会制度(包括宗教制度)中解放出来,让人的美好生活需求引导社会发展;解除各种约束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羁绊,释放个性能力,把人从自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sup>[2]</sup>。能否在生产力的发展中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社会制度的变革中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决定着人类现代化的成败。

(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对人类现代化进行重新定位和解释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开启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化革命,将人类社会生产和实践中的三重关系问题优先凸显出来。文艺复兴提倡科学,复活民主思想,把人从中世纪的愚昧无知中解放出来,让人的思考和创新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宗教改革提倡人权,反对神权,“用人的理性取代对上帝的信仰,使理性能在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sup>[3]</sup>;启蒙运动主张人民主权,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把人不合理的封建君主制度中解放出来,在理性公民所达成的“社会契约”和所让渡的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推动封建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工业革命掀起科技浪潮,推动生产力发展,把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西方现代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异化问题: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造成生态危机;创造了马克思所言的巨大生产力效率,但全民不能共享现代化成果反而陷入两极分化;推翻了封建专制,但以掠夺、殖民和战争起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问题,反而陷入新的压迫和剥削之中;以资本为中心,将人的发展屈从资本增值,人被物化或异化,“资本在摧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也摧毁了自身发展的创新基础。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片面的、丢弃根本的现代化”<sup>[4]</sup>。从这三个层面讲,西方现代化无法引领人类未来文明,人类现代化必须新的制度中重新得到解释和定位。

当西方国家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启现代化时,中国尚以“世界中心之国自居”,天朝大国的优越感使得整个社会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传统的民本政治,无论是生产力、制度和思想均未触及到变革的神经。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发起“师以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后,中国才正式开启

现代化的启蒙和探索,此时距离西方的现代化(以思想运动为起点)已有近五百年的差距了。在上下求索之中,中国的现代化依次经历了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制度变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变迁,但均未能引领中国走上稳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最终实行改革开放,以解放思想、发展经济、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为动力,把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驾驭自然的力量,推动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取得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的显著成效;以建构完善制度为根本,推动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建设,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以科学发展观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史目标。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我们对西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和认识更为深刻,也对新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化进行了深刻思考和规划。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下,我们重新定位现代化的内涵和方向,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将发展的本质回归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五位一体”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与国之间和平发展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充分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传统、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性和超越性。确切地讲,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sup>[5]</sup>

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主张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以西方为中心的狭义世界观;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本质,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共同富裕,超越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的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认为,社会制度随着历史演进而发展变化,不会终结于某一种制度,这就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历史终结论”的历史观;中国式现代化秉承“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sup>[6]</sup>的文明观,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冲突论”;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观,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民主观;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超越西方资本利益主导的生态观;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既在新的发展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进行再定

位,也在其独特性和超越性中重新定位人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蕴涵的民主观,对人类民主内涵进行了新的阐发和解释,对于推动民主制度止于至善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 二、现代化进程中民主语义的变迁

### (一)西方民主化对民主语义的改造和异化

民主化是西方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西方现代化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帮助人们走出中世纪,推动了思想观念的变迁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特别是启蒙运动所引发的社会制度变革,推翻了压迫人性发展的封建君主制度,在权利和自由的追求和维护中创建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民主,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局部解放;但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化并没有引领现代化走向至善,而是改造和曲解民主本意,推行民主霸权实施资本的压迫和剥削,由此异化了民主,对国际秩序稳定和全球和平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1.以程序性竞争性选举民主定义民主,从根本上置换了民主的真义

民主的原初意蕴是人民的统治,是人民主权的民主,它鼓励大众的真实广泛参与,以反映和实现多数人的利益为实质。然而,这种民主并不符合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特别是民主青睐无产者群体的特性使资产阶级始终对单纯的民主制抱有警惕和抗拒之心。为此,构建一种去大众化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制度,成为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制度建构的任务。在这种民主观的影响之下,资产阶级从自然权利的逻辑演化中理解民主、定位政府,确立经济交易规则,有意识地将民主、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捆绑在一起,创造出了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议制民主。进而在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将民主进一步改造为竞争性选举民主,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sup>[7]</sup>并将之作为民主的唯一实践模式。这种改造将实质性民主替换为程序性选举,将人民大众替换为政治精英,人民主权被置换为间歇性投票,民主成为获取强势资本获取权力的手段或工具。这种改造与权力分立、宪政进一步结合,使民主概念经历了一个去社会主义化和自由主义化的过程<sup>[8]</sup>,代表、同意和选举就构成了民主的基础。这从根本上改造了民主的参照物和衡量标准,改变了民主服务于务苦大众并使之共享现代化成果的本质。

2.以合法性为民主建设的终点,隐蔽民主有效治理的本质

民主以有效治理为本质。不以有效治理为本质的民主,并不是民众所期盼的真正的民主,无法有效激发民众的斗志和爱国精神,就不能推动现代化走上可持续之路。自由民主以合法性为制度建设标准,将人民的参与权限于周期性的选举民主中,不仅无益于做出维护社会公正、促进民众整体利益的决策,反而为资本掌控国家政权、追逐利益打开了便利之门,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隐蔽民主有效治理的本质;而且以合法性为民主标准,赢得选举而不是实施有效治理成为政治的头等大事,这往往使西方政治陷入政党之间的无序竞争之中,而忽视其政治责任;当民主发展并不能带来普遍的激励效应时,仅仅成为权力角逐的工具时,民主实践将陷入困境,民主原本团结和激励效应也深埋于资本主义制度中无法体现,民主实践的现代化意义也将不复存在。此外,资本主义国家以民主普适化之名推销合法性民主,其实质是民主霸凌和民主压迫。轮流执政、选举、分权等民主原则离间这些国家的精英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使政府与人民的离心离德,国家政权辗转于无德无能之人,使得这些国家的政治势力留恋于竞争性民主的政治机会中争权夺利、无序竞争,弱化政治权威,使这些国家的精英落入合法性为名的权利之争而无暇顾及现代化。从这个方面看,资本主义现代化从头至尾是赤裸裸的掠夺式现代化,其所谓的民主普适化口号不过是以民主的名义对世界实行掠夺和压迫。

3.西方民主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削弱民主的共同体利益基础

民主以实现多数人的统治为目的,“多数”原本是一个基于共同利益的阶级或群体,因而实现共同体利益是民主的根本要义。然而,发端于自然权利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以实现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以财产权和生命权为表现)为主,从而将“多数”演变为只重私利的个体,个人权利和自由取得了相对于国家伦理道德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助长了个人主义,抽离了国家的伦理要求,削弱了民主的共同体利益要求,引发了黑格尔所言的“特殊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的冲突,使“一个国家实体得到维系的普遍伦理的崩溃和丧失。”<sup>[9]</sup>其结果就是:“一种本来的‘共同体’意义上的民主在现代西方演变成‘个体’意义上

的民主,在其主流话语中被描述为一种‘进步’或‘发展’,其实是一种‘偏离’或‘背离’<sup>[10]</sup>。不但降低精英道德感和政治责任性,也使普罗大众“将一种并不足额的民主视为民主的唯一可接受形态,同时放弃对现代化成果平等分配目标的追求”<sup>[11]</sup>,降低民主促进社会创新和繁荣的能力;更进一步讲,资本主义现代化把资本利益的实现视为民主目标,资本家借民主之名掌控国家权力,对弱势群体实施剥削和压迫,国家沦为资本的“代言人”,民主围绕着派别私利、资本私利而运转,而罔顾多数利益或整体利益。久而久之,民主的共同体利益要求也被整个社会遗忘殆尽,一方面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所创造的现代化丰硕成果,另一方面是绝大多数人挣扎在贫困线的困境,两极分化将愈演愈烈。由于自由民主无法保障全民共享现代化成果的权益,必然不能激发全民创造繁荣的斗志,使自由民主陷入实践困境。

概而言之,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化对民主主义的改造是对民主的异化,其实质不过是以改造的民主实施对本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实行掠夺,实施阶级剥削和压迫,这一过程破坏了民主原有的利益共同体基础。这种情况绝非是马克思所乐意看到的,更非悲天悯人的中国文化所乐待其见的。必须新的现代化进程中对人类民主语义及民主发展方向重新做出解释和定位。

(二)马克思对人民主权民主的坚持和中国式现代化对民主语义的新阐发

### 1. 马克思对人民主权民主意义的坚持

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问题,认为人类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实现对自然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使人类与自然环境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人类要从压迫的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消除阶级压迫和剥削;人类要突破自我限制,就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制度,打破资本利益所带来的压迫,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民主化作为现代化和必要内容也在马克思的批判和建构中得到了新的解释。当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不仅否定现代性所带来的消极效应,而且否定承载着实现现代性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sup>[12]</sup>。这种否定不是为否定而否定,而是有所建树,注重从制度层面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实超越。

马克思从人的主体性出发,重申近代以来的人民

主权民主的意义,将人类民主的价值目标归依于广大劳苦大众,对民主重新做出了解读,认为民主就是使人性渴望通过社会劳动获取或创造个人生存、发展乃至解放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实践中,人的主体性被充分确立,人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将得到空前的释放,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进而为一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从这个层面讲,人民在现代化中处于何种地位就成为民主制度着重要回答的问题,也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分殊,也成为两种制度之下现代化之间的分殊。

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构想及其重建现代性的思考,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和解答。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并在前期人类现代化发展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重建现代性思考在中国的体现和反映,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复制,而是在对西方现代化的辨析和反思;不是简单的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延续,而是基于历史现代和未来趋势而探索形成的既具有自身独特性,又超越于西方现代化、对人类社会具有普遍示范意义的新型现代化模式,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人民主权民主的内涵重新得到了解释、丰富和全方面的实践。

### 2.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民主的新语义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蕴涵着全新的民主观,其对民主的理解坚持了原初意义上的民主内涵,即民主是“人民的统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确立了其真正意义,解答了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民主异化问题,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品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赋予民主新语义,对何谓人类所追求的真正民主做出了全新的思考。

其一、确立民主的真正意义:维护共同体之利益。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是将人民作为现代化发展的落脚点。所谓人民,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中占据绝大多数比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推动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具有相同阶级诉求的共同体。“人民”具有组织性、变革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力量,也是未来美好社会的推动者。“真正的人民不仅是社会历史的创造主体、实践主体,也是未来价值目标”<sup>[13]</sup>。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性”是

现代化的价值指向,要求民主发展以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为归依。这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对民主的认知有本质不同。资本主义现代化对民主的理解建立于维护个体自由的目的之上,因而,以防止多数暴政和民主专制的逻辑建构民主制度,形成了服务于少数特权和寡头利益的自由民主,由此割裂了个人与共同体间的联系,使民主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因此,与自由民主不同,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显著的“人民性”,“人民性”彰显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而联合起来的组织性、创新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民主发展的人民性立场,在民主理论的建构和制度实践上,着力回答谁是国家的主人、谁来掌握权力、权力如何保持本色等问题,注重发挥民主促进团结、为现代化凝聚力量汇集智慧、维护人民整体利益的效用。这就赋予了民主正当性和道义性的价值基础,将个人的发展和追求与共同体善业相统一起来,确立了民主的真正意义——维护共同体之利益,由此还原了民主的伦理属性,使社会主义民主远远超越了西方自由民主。

其二、赋予民主发展的权威要素:坚持党的领导。在人类民主发展史上,权威自古希腊民主实践以来,一直就是保证民主发挥正能量的必要因素。这在亚里士多德混和政体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欧洲工业化进程中,也正是王权的作用,促成了16、17世纪欧洲几个标志性大国的崛起。然而,西方现代化的民主制度建设却有意忽视权威对于现代化的意义,摒弃了民主发展的权威要素,把权威视为民主不相容的异己力量和威胁,仅仅在个人权利和自由基础上讲民主,容易造成民主发展的无序。而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始终受到权威的价值规约。在人民民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并不将民主视为一种单纯的政治宣誓、政治理念,而是不断以其先进性和人民性品质浸润、引导民主实践,用权威的价值规约民主发展,突出民主政治建设对于维护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人民幸福的基础性价值;在民主实践中,不是把民主作为装饰或摆设,而是坚持“民主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理念,“把政治文明发展、政治制度建设纳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而不是孤立地突出民主价值”<sup>[4]</sup>,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利益的实现融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目标中,使民主发展始终为促进政治团结、推动经济发展、建构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正能量;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引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通过法治界定和规范权力、权利的界限和关系,使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使民主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总体目的。正是党的权威领导,使政府施政体现人民性特质,使人民能够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在法律范围内追求个人利益,建设幸福美好生活。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权威是维护现代化秩序的重要政治保证。可见,权威是保证民主整体利益目标的重要政治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赋予民主发展的权威要素,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三、赋予民主有效治理的品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民主不能仅止于统治权力的合法性要求,真正的民主一定是促进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建构,一定以有效治理为目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民主,民主实践才具有实际意义,现代化的目标才能预期;反之,如果民主实践带来族群分裂、政局动荡、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民生凋敝,那么,这样的民主对现代化是毫无建树的。换言之,民主的有效性才是民主的本色,即民主实践推动国家建设或国家治理而体现出来的积极效用,包括秩序、稳定、经济增长、安全、政治清廉、人民团结、共识等。表现为:因民主激励而带来的经济增长、普遍性社会福利;因民主有序带来的秩序、稳定、和谐;因民主监督而带来的政治清明和决策有效;因民主选举带来的选贤任能和政治责任;因民主管理而带来效率和人民创新;因民主协商而带来的团结、共识和集思广益……总之,民主必须为现代化汇集智慧和力量,激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才是人们民主发展的真正意义。如果民主实践止于合法性目标,止于政党选举,那么这样的民主无助于人类美好生活建设。人类民主运行史表明,“无论民主的形式和程序多么完美,对于一个无法提高经济增长、给人民带来安全保障、维护社会平等和提供合格公共产品的政府,人们不会对它的民主质量给予很高评价。”<sup>[5]</sup>以合法性为追求的民主,如果不能解决民主的有效性,其合法性也将在民主无效性中消失殆尽。合法性有赖于从有效性中获取支撑力量。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建设表明,如果一个合法性政权缺乏有效性的支撑,最终也就丧失人民的信任。“因为如果民主不能实现最基本的有效治



理,生活其中的人们无法获得基本的安全、秩序与稳定,寻求替代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就会成为社会需要,军人统治或其他威权政体就会登场”<sup>[16]</sup>。因此,民主的本质在于有效治理。不以有效治理为追求的民主,绝不是真正的民主,绝不能称之为“世界样板”。民主的有效治理依赖于一整套能够塑造有效国家能力的政治制度安排,包括权利层面的民主制度安排和权力层面的政治制度,都能够塑造团结、凝聚共识、汇集建设性力量,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推进治理现代化。与民主的有效治理相反,民主的无效治理表现为民主实践所导致的社会分裂、政治失序、经济衰退、权力腐败、民生凋敝等,它一定是一个失败政府或失败国家所导致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不是去政府化、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而是加强有效政府、责任性政党的建设,以此强化民主的有效治理。这需要从本质上对民主做出深刻认知和理解,即不能仅仅将民主功能定位于合法性功能,而应该从民主如何有效的角度来理解民主、建构民主制度,发挥促进人民团结和有效聚合国家意志的作用。

民主以有效治理为本质,要求民主制度的建构及其实践以解决人民所要解决的问题为根本。在我国,人民民主的有效性立于以民为本的传统政治文化、合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久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终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人民民主的实践任务始终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同频共振,始终体现民主服务于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色,体现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品性。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的全过程都要体现人民意志,另一方面,要求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之中,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换言之,有效治理是政治与民主合力而为的结果。

其四、赋予民主参与新的实践形态:全过程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实践要求人民参与的全过程性。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响应了现代化的这一诉求。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后盾,引导人民全方位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去。国家领导层的更替、政府决策的形成、实施及监督,重大法律法规的形成、实施及监督、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人民诉求的表达等具体的民主实践领域,都要以特定的程序、形式和实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既指向政治参与权力,又指向选举、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民主权

利。”<sup>[17]</sup>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穿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建设中,使各方面人才能够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使全体人民能够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使人民群众能够畅通表达利益要求;使社会各方面能够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使国家决策能够实现科学化、民主化;使权力运用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因而,人民的参与是全过程性的。人民参与的全过程性也使我国的政府决策过程体现民主特质。伴随于政治过程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使政府决策及执行始终体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民主特质,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全过程性。

与我们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性相比,西式民主将民众的参与局限于选举权利,仅仅为民众的参与提供了选举渠道,民众仅在选举时机才有政治参与权利。“这种民主程序是‘间歇性’的,以选举为‘节点’,民主被割裂为一个个不连贯的‘高峰’”<sup>[18]</sup>。人民参与的全过程性凸显了我国人民民主超越于西式民主的一大优势。

### 三、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民主新语义,丰富了民主的内涵,其所蕴涵的民主要义将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全面的支撑和发展。

一是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支撑。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人的团结友爱、国家的互助合作者是永恒的王道。而资本主义文化所推行的民主霸权和强权政治摧毁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一精神基础。为此,需要回到中国文化中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悲天悯人的命运共同体文化,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为政以德、厚德载物的德治文化,为马克思关于重建现代性、解决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民主异化问题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制度建设条件。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理念的普及,人类的精神世界终将在团结互助合作中重新建立。

二是有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人民民主新的实践形态,“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到底是谁的民主的问题,而且也形成了一套兼顾民主的稳定与活力、程序性原则与实质性内容的民主实践体系”<sup>[19]</sup>。这一民主实践体系即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一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通过这一制度体系,人民既



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又参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既参与国家发展顶层设计的意见建议征询,又参与地方、基层公共事务治理;既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又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既通过人大、政协等渠道表达意愿,又通过社会组织、网络等平台表达诉求。人民利益的畅通表达和有效实现彰显了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性。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丰富民主新语义,不仅用权威的价值规约丰富民主新语义,“用人民逻辑取代个体逻辑,用合作共享逻辑取代冲突竞争逻辑,用政党引领逻辑取代选举驱动逻辑”<sup>[20]</sup>,而且通过过程性制度安排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寓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发展中,保障人民全方位参与现代化建设并共享现代化成果,从而保证民主发展始终发挥汇集人民智慧和力量、激励人民斗志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赵义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意蕴与价值追求[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01):5.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3.
- [3]夏光.东亚现代化与西方现代性[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
- [4]侯惠勤.人类现代化历史过程的道路之辨[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3.
- [5]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07/content\\_5740520.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07/content_5740520.htm)
- [6]洪晓楠 王犇.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文明观[N].大连日报,2023-05-29
- [7]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2-396.
- [8]张飞岸.论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熊彼特“民主”概念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功能解析[J].政治学研究,2011(5):4.
- [9]李佃来.现代性问题域中的政治哲学[J].东岳论丛,2022(1):125.
- [10]储建国.两种民主理念与中国的民主过程[J].当代中国与世界,2022(01):34.
- [11]林毅.现代化与民主的西方式悖论及其中国式解题——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优势[J].探索,2023(03):15-26..
- [12]胡慧华,刘满喜.批判或重建——马克思视野下的现代性[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06):2.
- [13]黄岩,李冲.“以人民为中心”对人民主体观的守正创新[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28-33.
- [14]李婧,田克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持续推进与创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1):60.
- [15]陈尧.科学辨识民主与国家治理的关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7-11.
- [16]包刚升.民主的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31.
- [17]任剑涛.民主的中国特性与全球共性[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6):71.
- [18]郭道久.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J].求知,2022(02):15.
- [19]林毅.现代化与民主的西方式悖论及其中国式解题——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优势[J].探索,2023(03):23.
- [20]艾昆鹏.政治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逻辑及实践优势[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6):67-69.

责任编辑:李霞

# 比较政治视角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服务国家治理的优势

王 凯

**【摘要】**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产物,具有服务国家治理的功能效用。西方政党政治在其当代实践中普遍存在对国家目标、共同体意识、民主与利益代表等现代性价值的偏离。在应对和接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方面吸纳了政党政治的现代性优势,另一方面使政党政治“中国化”,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弥补了西方政党政治在服务国家治理中的短板,而且发挥了巨大的治理效能。

**【关键词】**国家治理 政党政治 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一论述深刻地阐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以其他什么文明为模版和标准,而是以中华文明本身作为基体、以中国国情作为条件、以中国历史及其经验作为逻辑,是适应时代和人民需要的制度体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制度认识论上的新飞跃。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各国国家治理被动卷入一次“同场竞技”。在这场共同参与的“防疫战争”中,中国国家治理的优势再一次得到全方位展现,为全世界树立了“国家能力”的样板。

政党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建筑。在应对和接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一方面吸纳了政党政治的现代性实质,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使政党政治“中国化”,构建了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不同的政党制度类型。习近平同志于2018年3月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021年6月25日国务院

发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笔者认为,这一制度之所以“新”,就在于体现了把政党政治作为现代民主价值实现的一般性原则与政党政治作为国家现代化治理效能实现的本质性工具相结合而平衡发展的思维新境界,是对西方所谓“经典”,我称之为“旧式”政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超越。

## 一、政党政治与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

从世界政治的演进来看,政党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政党治理国家是现代性政治的重要标志。

### (一)以“国家治理”为目的的政党政治

“为政治而结党”是政党的本来之义,体现了政党生来要与国家权力发生关系的属性特征。最早给现代政党下定义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认为政党“是建立在一些人们集体认同的特别的原则之上、以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的联合起来的实体”,这一定义被萨托利认为是“区分了‘派系’(part)与‘政党’(party)”,从而赋予了政党以现代政治合法性。<sup>[1]</sup>虽然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基金项目:**甘肃社会主义学院2020年招标课题“比较政治视阈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价值取向研究”(GSSYZB201903)

**作者简介:**王凯,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甘肃省青联委员。

集中代表了一定阶级和集团的利益,但政党政治服务于国家治理或者说是国家权力的行使却是没有争议的。无论是所谓“经典”的竞争性政党制度还是后起的非竞争性政党制度,都存在政党在获得政权后使本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将本阶级利益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政府公共政策的过程。在趋于稳定的竞争性政党制度中,执政党在代表本政党选民利益的同时为了争取连任,往往会使政策趋于平衡,通过尽量满足反对派选民的部分利益或是达成合格的整体治理绩效以巩固和扩大选民基础。因此,执政党往往倾向于制定具有普遍性的政策,这基本符合国家治理的需要。

### (二)表达和整合民众的利益

由于政党具有国家和社会的跨界性,因而相比于一般市场化和社会化治理主体,政党可以通过攫取或参与政权将社会利益表达和转化为国家利益进而实现于治理机制。由于现代国家人口的规模和利益的多元,政党作为中介机制对利益进行转换和整合是十分必要的。如英国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克(E·Buck)所言:“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机构的水车并使之转动的导管和水闸。”<sup>[9]</sup>同时,相较于帝国时代的君权治理,政党体现了“民主”这一重要价值,不仅通过民主获得相对充足的政治合法性,而且使治理所需的信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充分流通,大大增强了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 (三)国家认同的促进

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政党在客观上导致了政治的社会化,教育了人民。现代政党借助信息技术,普遍重视对舆论的影响控制和对意识形态的塑造。政党在自我表达时时往往选择以“国家为名”或以“人民的名义”,客观上传播了国家关于基本制度、价值理念和政策原则的知识,有利于共同体认同的促进。此外,政党通过“利益聚合”,把不同的利益聚合到一个更大的组织中,驾驭和平息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利益聚合”还能不断吸纳被政治体制排除在外的阶级或集团,从而有利于国家治理。<sup>[9]</sup>

### (四)治理人才的输送

随着人类社会趋于复杂,国家治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无论是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型治理还是古代中国的“垂拱平章”、“无为而治”,在今天看来都

是理想。治理好现代国家除了设计先进的制度外,首要所需就是人才。人才输送机制是一个关系国运的系统工程。除了治理之能力外,韦伯认为:“‘心智伦理’与‘责任伦理’合起来构成了道地的人、一个能够有‘从事政治之使命’的人。”<sup>[10]</sup>简单说,信念、理性、责任、能力是政治人才的基本素养。儒家也以“治国平天下”为取向对政治人才做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人格要求。因此,对国家来说,合格的“千里马”不多,发现“千里马”则更难。现代政治使执政党充当了“伯乐”。在政党的运作中,从人才吸纳、组织、教育、发展到成为“候选人”的考察甚至参选,再到任职后的评价、监督等复杂法定程序,既保证了使具有合格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的人来治理国家,也同时培养和锻炼了大批“人才”。这是政党政治现代性非常重要的一面。

### (五)对政治权力运作的监督

在当今世界,有的政党组织政府,有的政党监督政府,这已成为评价政党政治现代性的重要标准。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认为:“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三者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是现代政治的奇迹。”<sup>[9]</sup>负责制政府意味着顶层监督制度的存在,政党则是重要的监督力量。通过法定的程序,政党可以监督政府政策是否公正合理、职位人选及其选拔程序是否合格无咎,甚至包括宪法法律、发展规划是否需要修改等。

## 二、西方政党政治对国家治理的偏离

政党理论虽起源于西方,但西方的政党实践却越来越偏离政党政治服务“国家治理”这一价值初衷。

### (一)目标的偏离

民主本为共同体(城邦)治理而生。作为民主的载体,现代政党执政的最高目的是“国家治理”与“国家利益”的实现,但由于西方政党制度的竞争性设计,使得西方政党的价值发生偏离。“方法”变成了“目的”,“上台执政”取代“国家治理”成为“本质”追求,“民主选举”替代“政策绩效”成为评价“合法性”的标准。“本末倒置”、“买椟还珠”的结果是不仅造成公共政治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引发政治对立、社会撕裂。“公共政策”沦为“为选举服务”从而使国家治理缺乏宏观性、普惠性和长远性。简而言之,极端化的党争导致了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权威性与国家作

为治理对象的公共性的双重衰退。这是今天“西方之乱”的根源。

国家治理之偏离以自由主义传统为始作俑者。在作为政治学基本范畴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西方始终把“国家”及其拥有的强制力视作对个人“自由权利”的最大威胁,即所谓的“利维坦”(托马斯·霍布斯把国家比做一种邪恶的海怪)。西方近代以来一系列政治成果及其制度实践可以说都是在限制国家力量上做文章,如三权分立、联邦制,包括政党轮替。所谓对“自由的伸张”借对民主的改造得以实现。杨光斌认为:“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最大成就是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体系,约瑟夫·熊彼特改造了民主概念,将实质民主即人民主权改造为程序民主即选举式民主,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改造合法性概念,将韦伯的基于法律性和有效性所构成的合法性概念,改造为选举式民主+有效性的概念。此后这些理论演变为改造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革命理论。”<sup>[6]</sup>以“选举民主”为国家合法性的理论偷换及其实践削弱了国家拥有的权威性与强制力,偏离了国家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价值初衷。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写道:“美国政治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衰败,因为他传统的制衡体制愈益深化和僵化。由于政治极端化越趋尖锐,这个去中心化的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却让利益集团和活跃组织拥有过度影响,它们加起来并不等于代表最高权力的美国人民。美国的政治体制变得极端化和寡断不决……美国受困于糟糕的平衡。”<sup>[7]</sup>

### (二) 共同体意识的偏离

西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使社会固有的多元利益取向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被人为放大。社会被党争撕裂,国家作为“人民命运共同体”的凝聚性降低,国家的组织力、动员力遭到侵蚀。美国政治学者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分析西方政党竞争性时提出了著名的“合法反对”原则,认为“合法反对”是西方政党的伦理,使两党或多党竞争在对峙、监督和制衡中得以实现。所谓“合法”指三个重要条件即“在宪法框架内、负责地竞争、有效地反对”。一方面,政党间不得采用煽惑、叛国、阴谋、政变、暴乱、暗杀等非法手段,另一方面,反对党对现行政策的批评,不仅仅是为了取代执政党,而且要为社

会发展提出更好的替代性政策选择,并储备有能力实施这些政策的具体方案、机构和人员。<sup>[8]</sup>总体来看,“合法反对”理论只是嫁接在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政治自由主义上的新枝,依然仅以自由共识、宪法共识和理性共识为基础,缺少“民族国家共识”这一更高层面的价值。在这一点上,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思考较其更上一层。

理论指引制度,制度塑造实践。二战后西方政党制度的实践说明,英美等相对成熟政党制度勉强维持了反对与监督在“宪法共识”内,但是否符合上述“负责”和“有效”的原则值得探讨,如美国特朗普这一“另类总统”的上台及其对前任的“整体否定”,以及英国因竞选而炮制的“脱欧公投”。对其他在革命后移植了西方政党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政党竞争不少都超出了“合法界限”,如乌克兰、波兰和一些南美国家。在一个依然被现实主义原则所支配的世界政治中,国家治理的失败特别是共同体意识的淡化、政治秩序的混乱将是致命的。

### (三) 民主的偏离

政党制度中所隐含的“公私矛盾”使得西方普遍陷入“民主赤字”的困境。所谓公私矛盾是指西方政党由于身处选举政治的摩天轮上,因而不得不以公共利益代言人的面目示人,以图选票而上位。另一方面,选举所需的竞选资源与“回报原则”使得政党选举沦为计算“投入-产出”的“资本游戏”,政党被资本家和财团绑架从而囿于小集团利益不能自拔。正如休谟(David Hume)指出“政党很少是纯而不杂的”<sup>[9]</sup>,价值取向上的内在矛盾使西方政党在表面的“大公无私”与实际的“私心杂念”间不断转换,从而瓦解了人民对政党政治的信任感,挫伤了参选的积极性,导致人民放弃政治权利而引发“民主赤字”。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各民主国家的投票率都屡创新低。近年来美国大选投票率一直处于持续下降趋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2016年的大选只有55%的选民参加投票。连年降低的民众参与度,无疑将严重动摇西方民主制度的根基。<sup>[10]</sup>

### (四) 利益代表和表达的偏离

政治应坚持人民性还是精英性是自柏拉图以来政治学长期争论的问题,从而酝酿了西方民主理论

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精英民主理论，帕累托(Vilfredo Pareto)、韦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其代表人物。该理论以批判经典民主理论关于“公益”和“人民意志”的假说为起点，把“民主”包装为人民选择精英以及精英竞取领导权的制度化程序。很多学者对精英民主理论的假设和取向进行严厉批判。<sup>[1]</sup>如巴尔得摩(T·B)认为：“民主政府的维持、发展与改进主要并不是人民依赖极少数精英集团之间的竞争，而是有赖于创造无数的机会给大多数，让其得以参与制定对生活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政策。同时也有赖于将精英分子与群众之间的界限尽可能地减至最低程度。”<sup>[2]</sup>但是正如精英民主理论的很多实证分析一样，西方政党政治趋于以精英政治为形态的利益集团政治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制度性竞争需要拉拢民众以获得选票。拉拢民众的能力以对现实政治和社会中的资源掌控作为后盾，如强大的财力和对大众传媒的控制。政党选举实则是利益集团及其精英代表候选人比拼财力、物力、话语权力等社会资源的战场。精英民主理论不仅与现阶段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基本吻合，而且在韦伯、熊彼特等人的精心构筑下成为逻辑上比较严密成熟、“道义”上不可动摇的理论体系。

精英民主理论与经典民主理论的争论体现了西方政党实践对民主蕴含的利益代表与利益表达的人民性原旨的偏离。政党集团的精英化必然使国家治理偏离公共利益方向，而且掩盖了治理所需的有效社会信息。底层民众真实的利益诉求难以上达，更难以撼动贵族精英和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政党这一“水车”成为空中楼阁。底层民主沦为投票机器，通过获得虚无的“民主错觉”默认政治的合法性。这种“默认”在遇到重大危机时将难以为继，成为国家混乱的隐患。

### 三、新型政党制度对现代性的继承和超越

中国的政党制度并不排斥政党政治的现代性价值，而是吸取自中华民国以来政党实践的正反经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以本土化即“中国特色”为重心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其核心特征就是以“国家治理”为根本目标。因此，在当今依然以现实主义为支配原则、以国家能力为核心竞争力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中国的政党制度做到了对一致性和特殊

性的统一，体现了国家治理思维的进步性与政党政治的超越性，是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制度。

#### (一)以“超大型国家治理”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学》中将一切共同体建立的目标定义为“某种善业”，认为“善即是公正，就是共同利益”。<sup>[3]</sup>不过，亚里士多德所见的共同体为城邦，其规模和内部的复杂性比同时代中国的共同体国家要“逼仄”得多。因此，就古代政治思想来说，中国比西方要现实和深刻，这也是中国从国家到文化早熟的原因。<sup>[4]</sup>如邓晓芒在《西方哲学史》绪论中指出：“西方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基本是一种批判的关系，与中国深厚的‘实用理性精神’大相径庭。在中国，哲学和其他学术中的一切深奥思想都必须满足于为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服务的现实需要。”<sup>[5]</sup>由于中国自古是一个超大规模共同体，内部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农业文明的发展性和外部入侵的安全性势必成为有效“治理”的首要考量，因此“政治秩序”也就是“和为贵”，而不是“个人自由”，就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国家治理的绩效而不是权力运作的分配也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权衡。如王绍光认为：“先秦儒、墨、道、法四家都是对理想政治秩序的建构和预设。西方思想家关注的是政体，而中国思想家关注的是政道。”<sup>[6]</sup>总之，治理超大规模国家的实用理性孕育了“和而不同”的政道思想从而超越西方的“政体正义”与“合法反对”的思维。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导者，也是政党政治的领导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坚持国家治理主体思维在逻辑上同构共生。党的领导保证了国家对其他承担治理之职的主体具有权责上的超越性和主导性，这就是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原因，也是“国家治理”作为概念经常会被忽视的“国家主体性”逻辑。换句话说，国家即是治理的第一主体，也是治理的第一对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政党的权力结构上都延续了“政治秩序”稳定这一传统，从运作上保证了政党政治以国家治理而非政党政治本身为目标。

#### (二)以现代化“治理能力”为核心

现代国家是一个极其精密和复杂的组成，系统和要素之间的联动性和脆弱性几乎一样明显。有学

者将现代国家的能力归纳为六种(如下表)。[17]这六个部分并不是孤立割裂的而是矛盾的统一,既相辅相成又制约掣肘,至少某一部分的资源投入多一点

其他部分的投入就会减少。可见“治大国”非但不像“烹小鲜”那样容易,相较小国其难度应是呈几何倍数激增的,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六大能力	定义	衡量指标
强制能力	对外保保卫政权和领土完整,对内维护社会秩序	每十万人暴力致死率
汲取能力	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保证国家各项机制的正常运作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濡化能力	树立以国家认同与公民平等为特征的核心价值体系	贝塔斯曼国家认内指数
规管能力	对市场和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加以规范和限制	每十万人交通事故死亡率
统领能力	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包括各级政府)加以规范和限制,使国家工作人员尽职、廉洁、使整个国家机器统一协调	世界银行腐败控制指数
再分配能力	用再分配降低各类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UNDP 人类发展指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性配合政党政治的现代性,大大提高了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在继承“大一统”与“政治秩序”传统目标的基础上彻底改革了国家治理的传统模式——中央集权制。其中在机制层面发挥重要价值的两大政治品性就是民主集中制和协商民主。杨光斌认为:“党的‘民主集中制’不仅是连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中介机制,也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内核。”[18]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主体同构下国家能力中的刚性力量需求,特别是强制、规管、汲取、统领能力。其经验来自对近代中国政治衰朽、组织松散及其严重后果的反思。协商民主旨在满足国家能力中的活性与张力需求,特别针对濡化能力以及国家汲取社会人才、信息、智力资源的能力。

在治理过程中,“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向内收缩”的决策方式,需要“向外开放”的信息及反馈系统作为支撑与补充,“协商民主”由此而生,其作为学理概念虽产生于西方,但作为实践形态却在中国政治发展中具有长期独立探索的思想基础和制度成果,其中苏联的解体也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经验性资源。中国协商民主制度规定了超过六个层面的协商为“国家治理”服务,而政党协商是其中运作时间最长、最为成熟、实践效果最好的一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支撑,而且其所营造的合作政治格局与协商性政治文化,使协商民主成为合作政治的题中之义,自然

已成为整个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石。总之,民主集中制与协商民主二轮驱动,推动中国政党政治以刚柔二性“中庸”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某种精神与原则,保证了领导与合作的统一、执政与参政的统一、民主与团结的统一、独特性与合作性的统一、多元性与一体性的统一。

### (三)以人民利益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组织的“人民性”和“群众路线”践行着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作用,从而使国家治理坚持以人民集体利益为基础。九千多万中共党员,大量身处基层,在国家治理的末梢,是国家建设的中流砥柱,“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的纲领使政党的水车时刻浸润在社会的河流中,倾听人民的声音。在人民利益的约束下,西方代议制中的精英与大众的权力矛盾被做了“无害化处理”,包括以“协商”代替“投票”的“去政治化”和既开放精英参政渠道但限制其通过所掌握的优势社会资源把持政治权力的“反垄断化”。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两大民主机制在功能的划分上使得国家治理既保证了人民性,又能获得进行有效治理所需的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合法性资源。参政党以及政协其他界别通过相应制度发挥着社会精英对国家治理的智力供给和统战作用。正如习近平指出,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19]

#### (四)以凝聚共识为需要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中国现代民族与民主双重革命的法宝,其要义就是“凝聚共识”。中国的政党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基体、以统战文化为主体的政治文化,体现了历史与革命的双重塑造性。历史上,从孔子、孟子、董仲舒,再到朱熹、王阳明等,构建起一套以儒家政治哲学、心性哲学为主体的文化共识。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使“党建国家”成为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以建国为目标将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现代政治文化融为一体,创建统一战线作为新的文化共识基础。正如亨廷顿在关于“一党制”与“现代化”的分析中曾指出:“二战以来,一党制国家的产生多源于与殖民政权、传统制度或保守势力的斗争中,自下而上要完成革命的社会动员,形成统一的意志与革命的合力。一党制或以一党为主的政党制度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sup>[20]</sup>

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对各参政党始终发挥着政治引领、思想教育、文化感召的重要作用。各参政党通过统一战线机制,在组织发展、政党协商、参政议政中不断被输入“国家利益”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其工作以“坚持原则、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八个参政党形成一种共识性、监督性、合作性的协商民主机制,共同推进“国家治理”。

#### (五)以民主监督为重点

中国政党政治通过“民主监督”消解了西方政党之间严重的对立性和攻击性。民主监督的非权力性安排与监督议题的广泛设置和渠道畅通使“国家治理”处于稳定向上、有过就改、透明开放的轨道。中国党际的话语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以及“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等,体现出具有家庭性的价值互蕴特征,使得民主监督以“家国天下”的治理为目标导向,避免政党政治因囿于党派和区域的私利而撕裂社会、恶性攻击的弊端。

#### 结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凸显了政党政治在中国现代性与传承性、民主性与治理性的内蕴统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在于把政党政治作为现代民主价值实现的一般性原

则与政党政治作为国家现代化治理效能实现的本质性工具相结合而平衡发展,用治理性匡正民主性,用民主性推动治理性,实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的善业”是对西方所谓“经典”,我称之为“旧式”政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超越。这种突破既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也来自于中华文化“大一统”、“和而不同”、“和合共生”、“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主张,是现代与传统的智慧结晶。2014年10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sup>[21]</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全面展现,相比之下,西方自由主义生态下政党政治服务国家治理的脆弱性也显露无疑。

#### 参考文献

- [1][意]乔万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制度【M】.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2.
- [2]王长江.现代政党治理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2.
- [3][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第9版).林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23.
- [4][德]马克思·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A】.钱永祥.学术与政治美国选集【C】.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220.
- [5][7][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1,458-459.
- [6]杨光斌.论政治学理论的学科资源——中国政治学汲取了什么、贡献了什么?【J】.政治学研究,2019(1).
- [8] Richard, H.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0-1840). 1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4-5.
- [9][英]大卫·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M】.张若衡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1993:39.

[10]李建宏.西方普世价值背后的民主赤字[J].红旗文稿,2018(22).

[11]对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批评中较有影响的:彼得·巴赫拉克、兰尼·戴维斯、T·B·巴尔得摩、杰克·瓦克、克瑞斯顿·贝尔、亨利·卡略尔等。参见:金贻顺,《当代精英民主理论对经典民主理论的挑战》,《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2期。

[12]金贻顺.当代精英民主理论对经典民主理论的挑战[J],政治学研究,1999(2).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陈虹秀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2、117.

[14]国家早熟之论如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雏形’”。[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24-26页.文化早熟之论如梁漱溟认为“中国在民主、人权自由、民治制度之不见源于文化观念不同。西方文化是从身转到心的,而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出发,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52-280.

[15]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

[16]王绍光.中国政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7.

[17]王绍光.民主四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18.

[18]杨光斌.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中华文明基体论的延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3.

[19]中国土壤生长的“伟大政治创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EB/OL].中国广播网 [http://news.cnr.cn/native/gd/20190402/t20190402\\_524565545.shtml?from=singlemessage](http://news.cnr.cn/native/gd/20190402/t20190402_524565545.shtml?from=singlemessage).

[20][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66-387.

[21]习近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EB/OL].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13/c\\_1112807354.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13/c_1112807354.htm).

责任编辑:闫丽红

(上接第10页)

伟大建党精神的四个维度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内涵。从实践路径看,新的赶考路上要继续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sup>⑥</sup>,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理论,伟大建党精神也不是书斋里的精神,这些科学的理论和精神被大家接受和掌握,是能够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而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源泉,要以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科学世界观、蕴含的精神状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从而更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2]参见:白显良.基于四重逻辑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9-14.王炳林,马雪梅.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2-9.齐卫平.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属性、定位和特质[J].廉政文化研究,2020:1-8.韩庆祥.以大历史观理解和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与精神谱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7-2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9.

[5]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17)[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9:6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0.

责任编辑:李霞



# 新型政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

王远启

**【摘要】**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价值目标,有着丰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意蕴;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建构,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健全可靠的政党制度保证和多样化实现途径;激活政党制度的民主功能,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彰显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目标的制度优势。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 新型政党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sup>[1]</sup>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顶层设计与生动实践,对人民民主本质特征作出最新概括,极大丰富了人民民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形式,使得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新路日趋成熟。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共同构成我国政治制度体系架构的“四梁八柱”,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坚实的政治制度支撑。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

## 一、新型政党制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蕴含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顶层设计,全过程人民民主决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政党制度是指一个国家由法律规定或政治传统形成的政党执掌、参与、影响国家权力的规

则、方式、方法、程序等制度体系。政党制度的运行状况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缩影。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崭新的合作型政党制度模式,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合作共事、相互监督、和衷共济为重要特质,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本质。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共事,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根本理念和价值目标在政党制度中得到充分体现。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密切配合、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不仅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健全可靠的政治制度保证,而且使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丰富多样的具体实现形式。

从新型政党制度的根基来看,新型政党制度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探索和发展开辟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有益实践。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土壤,是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发展要求的制度结果。从历史形成来看,近代以来,中国进入政党政治时代,政党政治模式选择先后经历了资

**作者简介:**王远启,男,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产阶级多党制、国民党一党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制度更迭,新型政党制度最终成为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窑洞对”,对于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sup>[2]</sup>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此后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这一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从文化理念来看,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机组成部分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迸发出的巨大活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形式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使得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新路日趋成熟,新型政党制度自身的理论逻辑日益自足和完善。另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源于中华文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民惟邦本、天下为公的传统理念,继承了中国历史上问计于民、协商治国、开明政治的优良传统。在新型政党制度形成过程中,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衷共济、协商合作等中华文化优秀基因内蕴于政党制度,寻求真实、广泛、有效的人民当家做主制度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使得这种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质,中华文化基因和文明禀赋使得新型政党制度成为人类政治文明新范式。从现实基础来看,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中国现实国情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论断:“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sup>[3]</sup>他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

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sup>[4]</sup>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sup>[5]</sup>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宗教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政治参与渠道和制度平台,使得他们能够就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地方重要事务以及人民群众生活、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精华,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了兼收并包、利益融合、各得其所、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政治格局和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保持社会和谐和促进生产力发展,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具有坚实的现实根基和强大生命力。现代政党制度形式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成功嫁接,使得新型政党制度禀赋优异、焕然一新,成为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具备承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能力。

从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构成来看,新型政党制度为政党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引领、带动、代表作用提供了制度平台。政党是联系国家和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其重要职责是代表本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组织社会、代表民众、反映民意、实现利益,干预和影响公共权力,协调国家机体的各个部分正常运行。在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构成中,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他们由有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组成,其主体是知识分子,也具有党派属性。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人士的关系,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处理“党和非党的关系”的基本方针。<sup>⑥</sup>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共识,由此成功找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党制度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具有先进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具有进步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的,这种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根本政治保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凝聚政治共识,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持续推进多党合作事业,使得新型政党制度保持活力、健康发展、行稳致远,能够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可靠的政党制度支撑。

从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追求来看,人民当家作主始终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价值。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原则,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价值追求。就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而言,毛泽东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sup>⑦</sup>在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各个政党和来自社会各界的政治精英代表各自所联系的社会阶层和民众进行政治参与,其利益的一致性突出体现为为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而不懈奋斗。新型政党制度勇于突破西方政党制度窠臼,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固有的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利益和集团利益局限性,进行独辟蹊径的制度探索,走出一条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哲学思想智慧和传统文化理念相融合、结合中国国情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新路,形成“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显著特色,为破解世界政党制度难题、丰富政党制度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与西方两党制、多党

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本不是为政党谋私利的那种政党制度,而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崭新政党制度。这就使得新型政党制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其制度建设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制度形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政党政治上的制度体现。

## 二、新型政党制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建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sup>⑧</sup>新型政党制度从结构设计到制度运行,贯穿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理念在新型政党制度中有着充分表达、形成制度建构,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功能的制度化完善有助于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能力。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子系统,新型政党制度所体现的党际民主,建立在中国各政党和政治力量根本利益一致性的基础上,服务于人民当家做主的价值目标。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参与、民主协商、党际监督是以完备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为保障的,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国家政权,对党和国家重大问题进行广泛民主协商,各种意见和建议都得到充分表达,有利于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使得各政党和无党派人士能够团结起来、民主协商、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政党协商、政协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协商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相互监督是多党合作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层面的沟通协调、高层次民主协商、制度化民主监督,不仅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而且是实现广泛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渠道和关键环节。

在政党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极大增强了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功能的政治基础,使得共产党领

导人民当家做主、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亲密友党关系是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合作、肝胆相照,缔造了一种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的新型政党关系。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没有新中国的一切成就,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意味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不仅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发展人民民主的政治宣言,而且与中国共产党一道致力于发展人民民主。

在国家政权层面,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这对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功能作出合理的政党分工合作,使得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功能更加科学、精准、有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 and 作用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sup>[9]</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科学定位,是根据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确立的。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sup>[10]</sup>民主党派参政主要体现在:第一,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进行的政治协商;第二,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人民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占有适当比例,依法履行职权;第三,在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发挥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第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中党外人士占多数,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参政党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标,而是作为亲密友党协助中国共产党执政,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这种分工合作,使得不同政党之间优势互补,和谐有序,对发展协商民主具有引领、示范效应,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政党制度经验。

在社会基础层面,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基于中国社会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代表不同社会基础的利益,这种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注重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功能的社会覆盖,有利于社会整合、分工协作、凝聚共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作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代表和反映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同时负有协助中国共产党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对于民主党派的代表性,毛泽东指出,“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是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sup>[11]</sup>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认识不够,不懂得各民主党派都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就喜欢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看他们的宣言比看我们的够味。”<sup>[12]</sup>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仅能够维护和发展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能够充分兼顾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既有利于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专业特长,又有利于发挥他们广泛联系不同社会阶层人民群众的政治优势,协助共产党反映和代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型政党制度下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社会利益格局,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根本利益一致性基础上实现多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团结合作,它绝不是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的权宜之计,而是对各社会群体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统筹兼顾、对来自各社会方面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进行有机整合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形成了兼收并包、参与协商、合作共赢的良性机制,作为人民民主在统一战线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要求。

**三、新型政党制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功能实现**  
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功能,是以人民民主为基

本前提和政治基础的,其核心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党制度承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党制度方案,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治理国家提供了有效凝聚共识、推进民主决策、合作协商治理、保持政局稳定的制度路径。这使得新型政党制度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整体架构有助于充分激活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功能,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目标的牵引下,新型政党制度必将大放异彩,其所特有的功能优势更加彰显。

参加政权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政治参与最高形式。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角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通过“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在国家政权和国家重要事务中发挥参政党职能作用,其实就是以参政党的身份地位,代表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是新型政党制度民意代表功能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层次体现。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无党派人士参照民主党派履行职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主要在政治领域,议题广泛,主要是围绕执政党的大政方针实施以及当下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改革这的深层次矛盾,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对策;渠道方式灵活多样,诸如人大议案、政协提案、协商座谈会、“民主党派直通车”等等。按照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助手、好同事”的要求,民主党派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为政党协商深入开展打下坚实基础”<sup>[13]</sup>。

政党协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协商民主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sup>[14]</sup>政党协商是政党代表人民进行协商。政党协商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政党协商的内容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问题、重要事项和重大决策。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sup>[15]</sup>无党派人士作为政治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商联作为具有统战性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都参加政党协商。充分发挥政党协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就“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sup>[16]</sup>在某种意义上说,政党协商与投票选举一样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华,起到了增进政治共识、实施民主决策、发展多党合作、巩固政治联盟、维护安定团结的重要作用。

党际监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民主监督最高形式。政党之间相互监督是中国各政党作为监督主体享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我国政党相互监督的基石是人民民主、人民监督。新型政党制度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互相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强调,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更需要自觉接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同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为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盟友、挚友、诤友,负有监督的责任和义务。毛泽东指出,“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sup>[17]</sup>。邓小平认为,“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sup>[18]</sup>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政治监督。搞好民主监督,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环节,既要在全社会营造宽松和谐的民主氛围,又要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

内的人民群众敢于负责任、讲实话、真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sup>[19]</sup>

新型政党制度以其独有的功能优势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一是对人民民主的拓展、深化和提升。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新型政党制度坚守人民立场的基本立场,坚持人民民主的价值取向,贯彻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制度目的性,具有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制度生命力。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整体架构,使其深度嵌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打通了人民民主与传统政党政治之间的壁垒,不仅丰富了人民民主形式,拓展了民众有序参与政治渠道,而且深化了人民民主内涵,提升了人民民主质量,有利于更好地发展人民民主。二是促进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就是把传统的、集中的、封闭的、独断的决策模式转变成了一种分散的、开放的、协商的决策模式,从而把决策任务分布到社会的各个层面。”<sup>[20]</sup>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政治参与这一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就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努力做到“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广泛凝聚共识、凝聚力量、凝聚智慧,促进执政党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三是保持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稳定。现代化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具有不稳定性。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复杂多样,对执政党构成巨大风险和挑战。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社会整合的根本在于凝聚民心。新型政党制度架起国家与社会的联系桥梁,具有联系社会、沟通民心、反映民意、代表人民、服务群众的制度优势,发挥意识形态引领、政治资源整合、社会利益整合作用,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同时,新型政党制度还结合时代特点创造出多样化的人民民主具体形式,使人民民主实践充满生机活力。这些无疑都

有利于化解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风险,促进社会整合,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

#### 参考文献

- [1][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05).
- [2]黄炎培.延安归来.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49.
-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99:209.
- [4][7]毛泽东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99:291.
-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205.
- [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34.
- [9][19]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人民日报,2013-02-08(01).
- [10]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A】.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3.
- [11]毛泽东.同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的谈话(1950年3月—4月).转引自《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6.
- [12]邓小平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4:186.
- [13][16]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3-5(1).
-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809—810.
- [15]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0/c\_1117423452.htm.
-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394—395页.
- [18]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272—273.
- [20]郭定平.政党与政府【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64.

责任编辑:马霞

# 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及现实启示

孙宝林

**【摘要】**我们党领导统一战线已经有百年的历史,研究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律和重要特点,把握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脉络,可以为未来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遵循;研究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的主要内容和路径,把握其基本的理论特质,可以为未来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借鉴;研究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的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把握其发展历史方位和前进方向,可以为未来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建设提供重要的价值启迪。概而言之,研究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得到的现实启示是:遵循党的精神加强理论建设;在“双结合”中加强理论建设;紧跟时代发展加强理论建设;在兼容并蓄中加强理论建设;结合工作实践加强理论建设。

**【关键词】**统一战线理论 历史演变 内在逻辑 基本规律 现实启示

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奋斗历史和70多年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掌握着这一法宝,为实现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目标和中心任务发挥独特作用,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创立了行之有效的统一战线理论,并且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实际工作需要,与时俱进地健全和完善这一理论并逐步形成了完备的科学体系,使之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统一战线理论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科学体系,包括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工作原则等内容。统一战线理论体系由党的宣言、纲领、决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批示,中央文件、政策、法规等组成。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sup>[1]</sup>《报告》为做好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确定了正确方向。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一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规定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原则。《条例》第八条第四款明确提出:“组织开展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的学习、研究、宣传和教

育,把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教学内容,把统一战线工作纳入宣传工作计划,把统一战线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内容”。<sup>[2]</sup>回顾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 一、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

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与统一战线实践百年发展是相互支撑、共同前进的,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我们党领导统一战线百年发展不同历史时期中,由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不同,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不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同,因而决定了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和主要任务有所不同,这些诸多因素势必会对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产生重要影响。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

1. 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理论。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该文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

作者简介:孙宝林,男,博士,北京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sup>[3]</sup>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决议案》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sup>[4]</sup>《决议案》标志着我们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正式诞生。

2.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1923年6月党的三大制定了专门的《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了联合小农佃农和雇工的要求。1925年1月,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问题,肯定农民“天然就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同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三位一体的武装割据思想,解决了工农联盟的核心问题,这种思想付之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实际开端,工农联盟的这种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的新发展。

3. 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立即发出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号召,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红军愿意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力量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议,第一次提出了全国军队联合抗日的主张。同年同月26日,中央给满洲党组织和党员的“一二六指示信”提出,要“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在继续强调建立下层统一战线之外,指示信还提出“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sup>[5]</sup>1935年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爱国的官兵,抗日的党派和团体,爱国的侨胞,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sup>[6]</sup>《八一宣言》强调了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的范围。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根据地后,即提出“统一战线是抗日反蒋的总的策略”,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上,提出有上层、下层和上下层并用三种形式:建立下层的统一,又可建立上层的统一,在上层统一基础上来开辟与扩展其下层的联合工作;又在下层统一基础上,以加强和巩固上层的统一。<sup>[7]</sup>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根据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sup>[8]</sup>

4. 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sup>[9]</sup>所以,我们党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积极争取实现国内和平,组织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决定用发布口号的方式进一步表达中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4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sup>[10]</sup>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事实上接受了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成功地召开新政协,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 新中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主要任务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力量稳步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确定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民族资产阶级都必须执行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方针;国内民族关系已从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转变为平等互助的关系;各民主党派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中共对各民主党派既要团结它们共同奋斗,同时又必须在组织上尊重的独立性,推动和帮助它们逐步前进;工会、农会、青联、妇联等各种人民团体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形式各有不同,但都负有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和政协机关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环节,其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正确关系;要在全党加强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克服关门主义和敷衍主义、迁就主义倾向;统战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安排人士,调整关系。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首先,明确国内社会阶级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其次,明确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继续加强全党团结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纠正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妨害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再次,明确统一战线工作各个方面的任务。为了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使他们同工农形成亲密的团结;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使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必须继续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和有各种社会影响的爱国人士,继续团结国外各地的华侨;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错误思想的影响,统战干部遭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统战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主要思想理论。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 以邓小平同志为党的领导核心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思想理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明确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是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在以下认识中得到了发展。一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联盟。邓小平讲“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就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而不是窄有利。”<sup>[1]</sup>二是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三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全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sup>[12]</sup>四是统战部要管知识分子工作,要认真贯彻对党外人士的安排和使用政策。五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六是确定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应当按照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坚持正面教育的方法,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正确处理各种矛盾。七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发动全党来做统战工作。

2. 以江泽民同志为党的领导核心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一是明确提出爱国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党对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要求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二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一

致性基础上的多样性是爱国统一战线存在发展的客观依据。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三是提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着重做好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工作;四是明确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要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五是明确提出通过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六是明确提出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拥护祖国统一,什么人都要团结。

3.以胡锦涛同志为党的领导核心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一是明确提出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世纪新阶段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显著的社会性。二是明确提出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目标,是使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更加和谐,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更加协调,宗教与社会主义更加适应,大陆同胞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内外侨胞的联系更加密切,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爱国统一战线。三是明确提出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是政治和社会领域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关系,是爱国统一战线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四是阐明了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政策是“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二十字方针,引导他们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4.以习近平同志为党的领导核心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我们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涵和本质特征,对爱国统一战线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其思想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2020年2月党中央正式印发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一是明确了爱国统一战线的灵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条例》规

定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sup>[13]</sup>二是明确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条例》总结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8条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sup>[14]</sup>三是明确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体制是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条例》要求“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大统战格局”。<sup>[15]</sup>四是明确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任务是做好“四个服务”。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sup>[16]</sup>五是明确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动力是不断推进统战工作守正创新。所谓守正,就是统一战线为实现党的总目标总任务服务的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所谓创新,就是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就是适应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需要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的过程。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结合构成统一战线发展的不竭动力。<sup>[17]</sup>六是明确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条例》提出统战部“是党委在统一战线方面的参谋机构、组织协调机构、具体执行机构、督促检查机构”,规定了统战部的工作性质。<sup>[18]</sup>

## 二、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逻辑

理论既是实践的升华,同时也是实践的指导。回顾百年历史,一方面,统一战线在实践中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在统一战线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另一方面,统一战线理论也伴随着实践的发展,遵循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不断得到充实、健全和完善。

### (一)统一战线自身内在逻辑

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是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统一战线理论百年的历史演变历程中,统一战线理论工作者始终遵循马克思和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也学习借鉴国际社会和我国历史上统一战线的一些好的经验,无论是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始终在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和社会发展大局的实践中不断调整、充实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不断开创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尤其是在党的十八以后,统一战线理论工作者立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扣自身的工作重点,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大胆进行基层统战工作理论创新,充分展示了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的精神风貌,使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的优秀成果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统一战线自身历史逻辑

在百年的历史发展演变中我们党所创立的统一战线理论,科学地指引着统一战线实践沿着正确方向不断深入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为指导,从我国特殊的国情出发,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以探寻开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道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任务,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理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党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形成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围绕着一系列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理念,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观,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奋斗目标,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的内容。

### (三)统一战线自身现实逻辑

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爱国统一战线提出了新要求:即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并把爱国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地位,“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

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sup>[19]</sup>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维度来揭示“重要法宝”战略地位,赋予了统一战线理论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者,不仅准确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准确把握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准确把握爱国统一战线自身发展的新要求,在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中找准方位;而且积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勇于走在时代的前列,不断体现时代的特征,登高望远,切实增强了统一战线理论指导的预见性。

通过梳理研究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逻辑,可以让我们把握的基本发展规律:统一战线理论与统一战线实践是相辅相成、彼此支撑的,理论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以符合变化了的客观情况,才能做到理论和实践历史的统一;统一战线理论与统一战线实践是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中得到发展的,先机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去发现和培育,新局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去打开和拓展;统一战线理论是在学科交叉融合中得到发展的,包括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民族学与宗教学的交叉融合,国内统一战线理论与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交叉融合。而且,统一战线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吸收了中华传统“合和”思想之精华,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具有覆盖面宽、承载性大、包容性强等品质。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始终坚持中国化方向,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制度。

### 三、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的现实启示

统一战线经历百年的风风雨雨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理论历经百年的历史演变不断得到创新发展,成为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研究统一战线理论百年的历史演变,会得到以下宝贵的现实启示:

(一)遵循党的指导精神加强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不仅是统一战线理论百年历史演变研究的重要思想遵循,而且也是未来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指引。统一战线是我们党所领导统一战线,所以,统一战线理论建设必须自觉遵循党中央的指导精神,继承好我们党领导统一战线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新时代将其发扬光大;必须全面梳理和总结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成果,在新时代续写好新的理论篇章;必须掌握我们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普遍规律和重要特点,并将其提升到统一战线理论中来,使统一战线理论体系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

#### (二)在“双结合”中加强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建设

所谓“双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双结合”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是爱国统一战线理论面向未来的本质要求。有结合才会有提升,有提升才会产生新理论。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建设的正确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深刻总结和充分运用我们党领导统一战线的百年历史经验,从我国日益发展的国情实际出发,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什么需要爱国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爱国统一战线、如何发挥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如何建设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些重要思想为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增添了鲜活的内容。

#### (三)紧跟时代发展加强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建设

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建设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统一战线理论是爱国统一战线实践经验的升华,也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者的思想武装。回顾我们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统一战线工作实践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建立在统一战线理论创

新和发展基础之上的。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繁重任务,面对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实际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工作者只有秉承开放思路、坚持开放视野,走在时代的前列,体现时代特征,才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才能不断提升理论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 (四)在兼容并蓄中加强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建设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理论建设肯定是行不通的。新时代的爱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十分广泛的政治联盟,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不仅与国内与其他领域相互交叉、与其他战线相互交融,综合性日益增加,而且国际性也明显增强,国际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的频率也越来越频繁。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建设必须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在交往实践中博采众长,勇于并善于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此外,还需要吸纳、融合、会通古今中外,主要是学习和借鉴国际社会其他政党的先进理念和优秀成果,为统一战线理论建设提供思想养料和理论资源,在全面吸收人类文化之优长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只有如此,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命力和更久远的发展前途。

#### (五)结合工作实践加强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建设

理论建设只有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爱国统一战线如何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践中发挥法宝作用?爱国统一战线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实践中发挥法宝作用?爱国统一战线如何在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跨越实践中发挥法宝作用?爱国统一战线如何在健全和完善“一国两制”体制机制、强化港澳台统战工作实践中发挥法宝作用等。上述一系列重点和难点问题都急需通过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建设来破题。所以,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者必须着眼工作实践,以团结汇聚合作之势,以联合凝聚创新之力,不仅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而且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理论成果,使理论建设更好地为工作实践服务。

(下转第61页)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 统战理念变革研究

王书波 夏静雷 徐 阳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最新的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成果,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最大限度地拓宽了统战工作的内涵,赋予了统一战线工作重要使命,为实践好新时代统战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根本遵循,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上党的民族工作、履行新使命、完成新任务的思想武器。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能够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奠定思想与现实的基础,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 统一战线 现实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全面贯彻党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断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根本性的事业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效地拓展了统战工作的思想和宽度,推进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根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部署,民族工作已经正式纳入到“大统战工作格局”之中。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也在爱国统一战线的增加补充的内容中,进一步确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爱国统一战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凝聚起更为广泛的力量和智慧,目标统一,共同发力。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着丰富的统战理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中华民族成员之间

的共同认同和共同利益的意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团结力,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

2022年7月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这就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蕴含着丰富深刻的统战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新时代赋予统一战线的新使命。做好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十二个必须”,牢固树立休戚与共、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就是要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培育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有效拓展统战工作的思路和半径。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法宝,肩负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的重要职责。团结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统战工作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柏坡时期建国方略与中华民族复兴研究”(19BDJ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书波,女,民革河北省理论宣传委副主任(十一、十二届),河北师范大学马院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北美术学院人文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夏静雷,男,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徐 阳,男,石家庄国资委水投集团八水厂办公室主任。

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将“共同体”思想引入民族工作领域,从理论层面来看,是在深厚的历史逻辑基础上,创新民族领域话语体系的重要成果,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的理论支撑,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了民族工作的具体任务和长远的目标就是要让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赋予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凝聚共同体意识,增强共同体认同,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历史发展属性。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长河,在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推动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制度规范、集体共识。大统一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理念,“九州共贯,多元一体”在中华民族历史中,始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要牢固领地,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从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民族工作重要性,体现了新时代党对民族工作的重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在此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就中华民族超强的内聚力。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在各族人民互动交融的长期发展演变中,日渐形成的“统一性”特征,奠定了“民族团结”的基本精神底色。吃苦耐劳、崇尚礼仪的农耕文明,热情勇猛的草原文明,爱拼才会赢的海洋文明,在中华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交

融与借鉴中,形成了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基础、具有民族特质和禀赋的民族精神。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的认同根基,文化认同凝聚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文化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到党的统一战线具体民族工作中,就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的有机联系,深刻展现、塑造中华各民族命运相融、利益相连、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之历史内涵与未来景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民族血脉相连的沃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了与民族关系协调为主的民族事务治理范畴。各民族文化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互嵌共生、共同共通的文化,形成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追求美好生活,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宪法的政治规范,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宪法的意识形态规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的宪法的国际法准则,是有共同的国家疆域共有的历史记忆,共振的价值体系。

挖掘传承中华民族共享文化符号,弘扬中华民族共有民族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精神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概念,习近平概括为四种伟大精神“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源泉和不懈动力,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特别是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民族精神的精神力量会更加强大,是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强大现实力量。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统一战线新内涵新遵循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极大地拓展了统战工作的内涵和外延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极大地拓宽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有利于各民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对树立各民族大家庭意

识,对增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巩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顺应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要求,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思想与实践的基石。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更强调“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与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3月5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谐之魂。”要求在全国各民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为的就是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更好地更全面地了解党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政策,从而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树立起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达到增进各族干部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正是在历史与现实的接续互动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与继承,以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为核心、以“民族团结”为纽带、以“文化认同”为根脉,立足中国自身历史发展实际,突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发扬中华民族本身的内聚特质,倡导共建更具向心力与凝聚力的民族关系。

统一战线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是一种凝心聚力的先进理论,是一个重要的民心工程。习近平指出,“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这一统战理念落实到具体民族工作中,就是要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的有机联系,深刻展现、塑造中华各民族命运相融、利益相连、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之历史内涵与未来景象。形成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以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为新时代开展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工作指明方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建立“四个与共”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要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个方面的高度认同。要处

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四个方面的关系,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共同繁荣发展。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了统战工作新征程上的新使命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使命任务,也是民族工作发展的重要基础。民族关系与国家政治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从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统战工作的战略性政治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历史的延续与传承,也是新时代的召唤与使命。为积极面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挑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早在1989年,习近平在《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就鲜明地指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他在全面解读历史中国与民族发展现实基础上指出,实现各民族协同发展,是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习近平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这就从根本上指出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本质,即使遭遇重大挫折挑战,中华文化始终在精神上融为一体。意味着中国的国土不可以分割,国家不可以动乱,民族不可以分散,中华文明不可能中断,这是中华儿女的共同信念,这一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是各族人民的心之所想,命之所系。

我国的民族宗教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复杂而敏感,涉面广,影响大。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要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把握民族工作特点规律,增强做好民族工作的针对性、前瞻性、综合性,在团结进步上形成最大共识,尊重民族多元性为前提,增强中华民族认同为根本,夯实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三)共同体理念为新时代民族统战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民族宗教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遵循。我国民族宗教问题具有的基本特征,就是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重要性。统一战线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够为党和国家事业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新时代新征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要更加深刻的领悟和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在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中画出最大同心圆。

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基本国情,统筹谋划部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念,深刻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新时代民族团结与进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感觉、信守的观念以及行动的意志取向,也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存续发展的支撑性条件与制约性因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必然要求,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巩固和发展了新时代新征程全新的民族关系。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汇聚,呈现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的国家。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高度统一,民族团结,国家繁荣富强;一盘散沙,国家积贫积弱,人民苦难深重。

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形成民族共同体更具威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与价值呈现,只有在具备共同体意识时才能生发。民族共同体关涉个体生命、理性、情感、道德、自信、价值的体现,其形成奠定了思想上的理论基础和精神上的情感依托。铸牢共同体意识,既

关乎整体的命运走向,也涉及个体的生命价值。

新时代统战工作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基础工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引导人民积极参与铸牢过程、巩固铸牢效果,才能产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 三、统一战线民族工作要探索完善相关制度机制

统一战线是党的重要法宝,一直以来都是党的总路线、总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民族工作是党的一个重要工作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人心向背力量对比的战略高度概括了“十二个必须”根本要求。用“三个更加重要”阐释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历史方位。今年2月,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民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体系建设的意见》,对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工作具有定向领航的重要指导意义,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把铸牢共同体意识融入基层党建,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是民族工作的基本要求。

党对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历来高度重视。从党的民族工作历史发展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工作,采取了许多措施促进民族团结与平等,建立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共“五一口号”的颁布后,中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人民积极响应。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所处位置和面临形势、社会革命的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之间存在的打冤家、民族仇杀、不公平交易等现象,制约着民族关系的和谐,中国共产党秉持“慎重稳进”方针,努力协调民族关系、消除民族隔阂,加强宗教问题研究,调解了纠纷达580多起,有效推进了民族友谊的建立,加强了民族团结。在布局国家战略发展顶层设计中,虽未明确提出民族共同体概念、目标、任务,但在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却有着比较清晰充分的认识和自觉,在一系列的政策设计、制度安排以及舆论引导设计中,对民族关系提出了新要求,逐步形成和强化了各民族作为共同体意识的认识与认知。在政策层面,《共同纲领》的颁布实施,极大地强化了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与认同。在实践层面,《共同纲领》精



神指引着各项民族工作合理有序的推进和开展,规定“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民族工作取得显著成就。步入新时代,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民族工作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民族工作如何实现与中华文化的融合发展,怎样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任务。

2015年5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民族工作纳入“大统战工作格局”。统战部职责之一就是“统筹协调民族工作,领导民族工作部门依法管理民族事务”。《条例》作为统一战线各项工作的基本依据和理论方针政策,是新时代统战领域民族工作的基本遵循,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对统一战线进行的具体规范,是与统战工作实践相磨合的党内法规。如何全面准确学习领会统战理论方针政策,履行统战工作主体责任,推动《条例》在民族领域统战工作中的贯彻落实与深化,是一个重要课题。统战的目的是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凝聚起最广泛的力量。实施《条例》前后八年,国内外政治经济发生巨变,风险、挑战与机遇并存。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条例》落实深化情况如何?从执行层面看,主要是配套机制建立情况、遵守情况、执行情况、权利保障情况。从合规性、合法性、合理性、技术性、执行性、政治性六个方面考察,截止2020年4月全国共有14个省市自治区制定了实施细则或颁布了实施意见。其余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公开渠道未查到相关文件。与《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发布半年内即有24个省市地方制定实施细则的情况相比,差距甚大。《条例》执行性差距,江西省、四川省、安徽省、福建省、湖北省、广西自治区、陕西省互联网可检索到全文。浙江省、湖南省、吉林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北京市、河南省实施意见细则,检索未能查到具体文本。细化落实文件的地区相对较少,仅有三分之一之多。

《条例》是针对不同统战工作对象群体的引导性、建设性规定。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政策方略,大部分内容并非法律所管控的领域,要与宗教、民族、港澳台海外事务等领域相关的法律相适应相协调。民族事务重点地区,以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计算,前十位分别为西藏、新疆、青海、广西、贵州、宁夏、云南、内蒙、海南、辽宁,民族事务相对复杂,缺少符合地区实际的统战工作实施细则。各地细化《条例》执行情况,参差不齐,亟待在顶层设计上进一步推动《条例》的贯彻落实与深化。因此,需要从规范制定层面、角度分析“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存在的不足去寻找问题、解决问题,使政策与推进机制不断完善。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002).
- [2]孙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N】.中国民族报,2020-06-16.
- [3]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演进与战略意义【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03).
- [4]乌云格日勒.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01).
- [5]陈立鹏,汪颖.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的理论要点【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0).
- [6]王小鸿.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1).
- [7]青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红旗文稿,2021(05).
- [8]本报评论部.坚守“统一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人民日报,2023-06-16(005).
- [9]李学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6-16(004).
- [10]刘桃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支撑【J】.奋斗,2023(12).

责任编辑:闫丽红

#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创制与“两化”发展理路探赜

钟科丞

**【摘要】**“联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形成初期的理论成果,经过列宁的发展与完善形成现在所提的“统一战线”概念,进入中国后,统战理论进一步得到了中国化时代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联合思想在中国实践中的演进又经历并肩负起了实现国家独立、推行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等不同的时代重任,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由理论初创走到当代中国已有百年发展历史,从理论形成初期单一的“争取同盟”观点,到今天中国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涉及到凝聚国内外所有范畴所有阶层力量的宏大思想,经历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过程,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与国情民意、时代问题不断结合,具有一条内涵“联合”与“团结”为目标的理论主线。通过研究不同时期的统战理论,可以理清其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发展理路,发现统一战线由革命斗争武器向重要治国方略的转化,认识到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法宝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 联合思想 统一战线 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在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联合更多的力量强大自身去实现革命目标,一直是学界研究和讨论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后来继承者、发展者,都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观察和总结相关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撰写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这些经典文本中,形成一系列能够指导和团结各个阶级、政党和组织等去实现“联合”的理论,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联合思想”、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统战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都为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历史。”<sup>[1]</sup>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统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此基础上逐步与中国实践相融合,逐渐清晰地绘制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由西向东发展的清晰理路。

## 一、“联合思想”形成初期,以争取工农商同盟为核心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的“联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早的“统战思想”。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将这一团结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计划更多称之为“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比较集中的阐述,还有一些思想与论述大都分散在其他的文献中。

(一)资产阶级的结盟加剧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  
马克思在波兰起义十七周年大会中指出:“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同盟。这就是压迫者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助项目(22-A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钟科丞,男,硕士研究生,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讲师。

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同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同盟。”<sup>[2]</sup>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所阐述的是资产阶级联合成为同盟对付广大无产者,用更强大的力量进行剥削和压迫。可以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意识到了联合起来组成同盟军、用联合起来的力量展开对抗的问题,并且在演讲中明确指出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本国以外的资产阶级即便有着竞争和冲突、具有明显存在的矛盾,但为了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他们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依旧会进行联合并组成联盟。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能够有序展开,并且汇聚力量、形成规模,马克思恩格斯联合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反对联盟针锋相对,也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展开联合,一是积极实现自身的联合统一,也就是无产阶级自身首先要联合起来,走向阶级团结;二是最大限度地争取其他的革命阶级、革命政党,抑或是具有革命性质的社会组织,寻求革命道路上的同盟军。

### (二)共同目标使无产阶级实现自身统一

1847年恩格斯同样在波兰起义十七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过去使工人的各个部分相互分离的那种对立的利益已经消除,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趋于平均化,这一切你们都应归功于机器生产”<sup>[3]</sup>。在这一次讲话,恩格斯明确指出,工人生活水平的平均化是由于机器生产所导致的,而这种平均化造成的影响之一,就是去除了在没有机器生产以前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分离,这也就为工人阶级的联合和统一带来了机会,为胜利带来了可能性。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具有相同利益、相同敌人,其自身所展示出的团结与联合的基础先天具备客观条件,更具有共同奋斗目标的主观条件,应该共同战斗,并且也道出了联合的必要性就是在于要联合起来对抗剥削者,也就是资产阶级的联盟。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给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集中系统地阐述无产阶级自身团结问题,186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了第一国际,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对工人阶级团结统一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国际协会的会员应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以全国性中央机关为代表的全国性组织”<sup>[4]</sup>。马克思在这里进一步突出了团结和联合的重要性,并且在章程中指出:“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sup>[5]</sup>,

这不仅是在强调工人阶级自身的团结和统一,更是提出要结成永久的联盟。

### (三)争取更多同盟军壮大革命力量

要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及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任务,仅仅依靠无产阶级这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足以实现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革命的过程中,必须要根据形势和条件的变化适时地去积极争取同盟军,以联合成更强大的力量。这个过程,就是要实现与其他的革命的阶级、政党,包括社会组织的联合,组成革命同盟。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首先需要争取的同盟军就是农民阶级。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关于1848年的6月失败中,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农民阶级的领导者、先锋队的问题,农民阶级要向无产阶级靠拢这一事实。所以,无产阶级首先需要争取到的同盟军就是农民阶级。如果获得了农民阶级这个占大多数人的有力同盟军,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股合力,相反,如果不能争取到农民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sup>[6]</sup>。在无产阶级争取同盟壮大自身力量的过程中,小资产阶级就是第二个需要争取到的同盟军。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与城市居民有着紧密深厚的联系,同时,与许多农民阶级以及在农村的无产阶级也保持着比较紧密的联系,这是团结这些力量的基础,也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所以说无产阶级在自身团结的前提之下,要想扩大自己的力量就需要争取到小资产阶级同盟军。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sup>[7]</sup>这里不仅提到了需要联合小资产阶级,同时也提到了农民阶级的重要性。但仍需注意,尽管需要争取的同盟军包括小资产阶级,也仍然需要注意对待他们的态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也提出争取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并阐明了小资产阶级中的民主派与革命的工人政党是可以联合起来一同反对工人政党所反对的派别的,但是,如果小资产阶级继续只以本阶级的私利为目标,那么工人政党一样可以继续对其反对。也就是说,当小资产阶级与我们的革命任务相同时,我们要争取到

他们的帮助来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当在这一过程中小资产阶级想要去维护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时,我们又需要继续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是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sup>[8]</sup>在革命的过程中只要是与我们的革命目标一致的革命运动,包括发动这一革命运动的阶级、民主政党或是革命的社会组织,我们都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sup>[9]</sup>,同时对全世界的无产者和革命者发出最强倡议:“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sup>[9]</sup>。

马克思恩格斯的“联合思想”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基本的理论思想对后来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与实践均提供了基本遵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二、从联合思想到统战理论的转变,以推动“两个统一战线”形成为主要任务

“统一战线”<sup>[10]</sup>这一概念是在1840年恩格斯所写的《不来梅通讯》中首次出现的,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指出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把各个方面革命力量联系起来,反对宗教黑势力,联合反对反革命的力量。自此之后,统一战线这一概念也出现在了1869年马克思至库格曼的书信之中——“因为他们必然要和统治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的统一战线”<sup>[12]</sup>,在此马克思也做出了阶级联合这样的意思表示。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具有联合思想,并且分别在1840年和1869年就已经首次提出了“统一战线”一词,但与我们今天更为相近的统一战线概念,是由列宁所创制。

### (一)农民阶级是统一战线中的第一个直接同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列宁所提出的统一战线策略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来看是非常重要的革命策略。其主要内涵包括:“联合两个同盟军”和“建立两个统一战线”。关于“联合两个同盟军”,列宁所指就是要对直接和间接两种同盟军积极地争取。直接同盟军的“第一个同盟者就是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千百万计的、广大的半无产者以及一部分小农群众。”<sup>[13]</sup>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需要争取到的第一个直接同盟军就是农民阶级,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联合思想”一致,并且指出:“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

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sup>[14]</sup>。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苏联共产党对地主的土地夺取后给贫农进行了分配,与穷苦的农民阶级紧密地站在一起结成同盟,同时不断对中农对革命的态度产生影响,致使中农最终与贫农站在一起,成为联盟一分子。革命胜利后,1921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进一步强调维护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同盟关系是专政的最高原则,要让国家政权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列宁的论述不仅是对无产阶级联合农民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最高评价,更是对工农联盟重要性的最大肯定,说明了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不仅是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发挥作用,即使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使无产阶级继续领导国家、维护政权。

### (二)扩大统一战线范畴削弱反对力量

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相近,需要争取的第二个直接同盟军同样是小资产阶级。这个直接同盟军不仅包括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有其他革命的阶级和社会组织。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sup>[15]</sup>在列宁的理论体系中,统一战线已经被摆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一思想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并且是涉及范围非常广泛的阶级基础。这样一种把无产阶级专政与统一战线紧密联系起来的思想,开创了统一战线发展的新思路,为往后的革命运动更好发挥阶级基础优势和巩固政权展现出了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作用。与直接同盟相对应的间接同盟军,就是指利用敌方势力中存在的一切矛盾,将他们拥有的力量进行切割分化并逐个击破。列宁在论述中指出,一方面要非常留心、仔细和谨慎地利用好敌对势力中间存在裂痕这一情况,利用好各个国家中资产阶级之间、同一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集团之间的矛盾,“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sup>[16]</sup>,要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将他们进行分化,从中获得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削弱反对的联盟。

### (三)建立“两个统一战线”支持全球统战运动

“两个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列宁在1895年至1896年撰写《社会

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文章指出,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时候,如果只有一个工厂的全体工人联合起来或者是同一个工业部门的那些工人联合起来是不够强大的,“工人的零星发动就发展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跟厂主的斗争就变成了阶级斗争。”<sup>[17]</sup>列宁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工厂或一个产业部门的工人进行简单的联合是不足以对抗资产阶级的,单独部门的联合力量明显太过弱小,需要全体工人阶级联合组成统一战线。由于资产阶级具有共同利益,使得他们紧密联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的反对联盟,那么全体工人阶级就更需要联合起来,因为自此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联合也具有相同的利益诉求,也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将本阶级置于死地并维护自身阶级的权利。为此,工人阶级需要联合起来形成统一战线,争取到对国家政权的影响,从而捍卫自己的权利。另一个统一战线是列宁所指出的要把“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建立在东方的一些殖民地国家,也要在半殖民地国家推动建立。他在1920年撰写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一文中明确阐述到,苏维埃俄国须有相应政策,以保证所有民族解放运动与殖民地解放运动,都能够与俄国保持最密切的联盟,“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sup>[18]</sup>这表明苏维埃俄国要对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殖民解放运动提供支持,形成适宜的联盟形式。同时,要持续不停地向落后国家,甚至所有国家中占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揭示和曝光帝国主义一直在实施的欺骗,即建立政治独立的国家,再利用这个欺骗,实现帝国主义对国家经济、财政、军事等方方面面的全面掌控。“在今天的国际情况下,除了与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以外,附属的和落后的民族是没有其他出路的。”<sup>[19]</sup>列宁的一系列深刻认识帮助落后国家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建立了反帝联盟。列宁将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与反帝国主义斗争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壮大了革命队伍,进一步拓宽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内涵,进一步发挥了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

随着列宁对“统一战线”概念的正式创制,这一词语随即通过共产国际的传播成为全世界所熟知的概念。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也一直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

### 三、从国家独立到改革开放,统战理论进入中国后完成了重大历史任务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统一战线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联合思想”的形式所提出,由列宁进一步阐述并发展形成现在的“统一战线”概念。传入中国后,统一战线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也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演进成为了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和需要的理论与思想。

#### (一)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实现民族解放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做出了“最有觉悟性”、“最有组织性”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明确指出一定要团结一切革命的力量,即团结除无产阶级之外其他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共同实现革命胜利。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指出,我国革命如果只具备单一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即使中国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在所有阶级中最高,力量也太过单薄,不可能取得胜利。“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sup>[20]</sup>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强调,我们应该反对关门主义策略,这是一个对于民族独立斗争来说完全没有好处的策略,会“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sup>[21]</sup>关门主义壮大了敌人的力量,却把我们自己孤立了起来,力量反而被削弱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毛泽东提出革命的力量向反革命力量的进攻就是需要把民众组织起来、把革命军调动起来,在统一战线中把一切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把统一战线深刻地嵌入到中国革命斗争中,带领中国各个阶级、阶层一同实现革命胜利。

#### (二)扩大包容性增强统一战线力量

邓小平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国情深度结合,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统战思想,创新了符合这一阶段中国要求的统一战线理论,解决了国际国内当时遇到的实践问题。邓小平指出,我国发展不断前进,社会阶级状况和工作重点都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情况与问题。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所组成的工农联盟需要更加紧密团结,还需要扩大统战领域的包容性,“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sup>[22]</sup>。邓小平对社会

阶级的正确判断更加包容也更有力度地团结到更多力量,拓展了这一时期统战理论的内涵边界。同时,改革开放也使中国焕发出了更加强大的新生与活力。邓小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sup>[23]</sup>,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中也获得了发展,我国的统一战线更加稳固。在改革开放中,统一战线理论贴合时代要求,在国家建设、团结统战成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 (三)搭建制度平台夯实统一基础

伴随着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发展,邓小平构建了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出了一系列关乎国家主权的统战理论与思想。面对统一战线中最为特殊也至关重要的问题,为应对国内外政治因素和本国自身发展变化,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sup>[24]</sup>统一战线要完成好“统一”这个历史重任,需要更加广泛的力量支持。邓小平的统战理论将这一阶段的统一战线阐述为所有历史时期中最强大的统一战线。因为,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基础上力量又有所增加,团结的范围更加广泛,增添了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sup>[25]</sup>统一战线范畴扩展使得更多的进步力量可以凝聚其中。在实行“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时,统一战线成为联系连接、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邓小平对统一战线理论的发扬和扩展是结合了时代重任的科学研判,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的特性。

## 四、巩固国家基础坚持科学发展,是统战理论结合实践的目标方向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巨大,世界各国也均处于飞速发展中,国际局势不断变换,这些都促使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大团结、大联合的问题,需要更进一步的统一战线理论回应国家与人民的关切。

### (一)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国内稳定

团结国内一切力量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以及欧美国家对中国的影 响,成为这一阶段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主要方向,更加巩固统一战线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我们把各方面力量集中起

来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动改革开放不断向前;团结各个民族,维护社会稳定,贯彻落实民族宗教政策,营造了良好民族关系;团结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有优势和特点,共同参与到国家治理和建设中来,巩固了国家政权。这一时期的统战理论更侧重于研究和阐释党对统一战线工作领导的重要性。其理论的包容性在于从指导实践中更加完善统一战线工作的全局参与、整体安排,认为“统一战线工作只是统战部门及相关部门的事”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对统一战线必须全党高度重视、整个社会全力支持,统一战线本身就是联合和团结的大事,做好这件大事,需要全党上下、全社会上 下参与其中,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是进入新世纪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的根本保证。”<sup>[26]</sup>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把统战工作提升到事关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高度上来。

### (二)重视知识分子,促进人才发展

在统一战线包含的所有成员中,党外人士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重视知识分子,把这一股人才力量凝聚起来,是这一阶段统战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包含知识分子群体,“全面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全党同志和党的所有工作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sup>[27]</sup>。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越发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团结知识分子力量,在各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中的组成部分,坚持工人阶级立场就是根本要求,在国家和民族前进发展的过程中也应当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所以,对待知识分子,尤其是政治立场坚定、文化水平高、影响力大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不仅在生活中要多团结、多关怀,还要能够在政治上和工作中给予应有的信任和符合能力的使用,从认知和思想层面把知识分子的理想目标、人生价值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密切联系起来。

### (三)汇聚智慧,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统一战线是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统战成员关系和谐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对于当前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就是要聚焦于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这一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内涵与实践从“三者联盟”,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成为



“四者联盟”,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把这一股力量集中和引导到建设小康社会中去,将会提供强大的支撑和动力,所以要“努力把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上来。”<sup>[28]</sup>具体来说,就是要利用统战成员的特点和优势开展智力支边,做好扶贫工作,投身到新农村的建设和光彩事业中,让这一股强大的力量为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这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鼓励统战成员开展知识和科技创新,在创新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实现人才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国家经济建设等重大问题上,鼓励统战成员多调研、多建言,参与到国家经济建设中来。有针对性地具体地发挥统一战线中各个成员的优势和特色,投身到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去,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 五、大团结大联合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的本质与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统一战线理论继续深化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发展与创新是新时代统一战线新实践与新情况的迫切要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把统一战线摆在了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全局的重要位置,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最大任务,进一步强调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大联合,逐步形成了新时代的统一战线理论与思想。

#### (一)中国共产党是大团结大联合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至今领导了我国所有的五个阶段的统一战线,成就举世瞩目,“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sup>[29]</sup>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经历了长久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严谨、逻辑严密的制度体系。从工作范畴来看,以政党、民族、宗教、阶层和海内外为对象,工作范畴清晰明确;从组织机构来看,以人民政协为重要组织和专门机构,各级党委发挥领导作用,以及配合发挥统一战线各部门职能作用,组织体系行之有效并且制度严谨,“必须明确,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sup>[30]</sup>;从法律制度来看,以宪法为核心,围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等与统一战线工作和

培训相关的具体法律法规,形成了一整套法律保障,法律制度逻辑严密。新时代统战理论不断与时俱进,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这对统一战线在新时代的目标不改、性质不变、方向不错具有重要稳定作用,统一战线也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从战争时期的斗争战略,转变为了和平时期的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

#### (二)维护统一战线一致性与多样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统战理论中的一大重要创新,就是在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中明确加入了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围绕这一原则,有丰富详细的理论阐述,这是符合中国统一战线实际情况的理论指导。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sup>[31]</sup>。统一战线所包含的成员和领域非常丰富,这样一个广泛联盟中的所有成员在保持最根本的一致性的同时,也具有独特的特点与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接纳与包容的统战思想,作为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既要坚持和维护统战各部分成员的多样性的同时,也要找到最大公约数、要为统一战线画出最大同心圆。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共同奋斗的目标,在携手奋进中共同克服困难、创造伟大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孕育出共同意志。统一战线所具有的一致性,是统战领域内所有成员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广泛共识的一致性。统一战线的多样性,是统战领域所涵盖的党派、成员、阶层非常广泛所展现出的多样性。

#### (三)大统战工作格局是统战理论的实践运用

“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sup>[32]</sup>建立大统战工作格局为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提供制度保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寻求政治认同、为中华民族团结复兴凝聚力量,这是符合国情的科学决策,是统一战线理论与工作在新时代的具体创新。大统战工作格局是一套以党委为统一领导核心,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工作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工作制度。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能够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作用,为全国人民群众的长远、整体和根本利益负责。其所维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目标价值,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价值追求。提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思路与方法,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与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发挥好统一战线在新时代

的制度优势,运用大统战工作格局思路、发挥好统一战线制度。通过理论、政策、制度、法规全链条的完善,为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指导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学习与思考中得到了继承,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实践中与中国实际结合得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原创性也随之从欧洲大陆开始向东方和世界范围转移。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地学习、思考与实践获得了重要的经验,学会运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把理论根植在中国大地上,与国情融合在一起,并没有一味强求或生硬的与所谓“国际论调”相一致,这也正突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创造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经历了中国化的发展理路,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联合思想的理论创制,从不同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伴随着社会变迁、时代演进、国情差异、人类发展等因素影响,做出符合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变化,从近代到现代发展出新的理论、新的思想。这些理论与思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思想的基因密码,弘扬接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精华,进一步创新创制了中国的统一战线理论与思想体系。进入新时代,这一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的进一步发展融合,逐步形成了习近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成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根本遵循与方向指南。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使其由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转化为了联合与团结的重要治国方略。

新时代我国的统一战线理论是在结合了具体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统战工作实践的理论总结,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判断,更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赓续与创造,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工作实践。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J】.求是,2021,(22):6.
- [2][3][6][7][8][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3,315,769,499,435,435,435
-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3,174.
-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93.
-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25.
- [1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 [1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66.
- [15]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62-363.
- [1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9-180.
- [17]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7.
- [18][19]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5,10.
-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45.
-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5.
-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5-186.
- [23][2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68,58.
- [25]邓小平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158.
- [26][27]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3-154,148.
-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568-569.
- [29]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
- [3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61.
-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
- [32]习近平.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人民日报,2015-5-21(1).

责任编辑:马霞



# 政治交接与民主党派能力建设研究

张才学

**【摘要】**民主党派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保证政治交接的顺利完成。民主党派政治交接还存在程序和制度不规范、不完善,组织建设弱化,能力建设存在后备干部的培养受到思想工作短板的制约,民主党派合作共事能力受合作意识、方式和能力的影响,政治交接的建言献策能力受调查研究能力和质量的制约问题。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民主党派政治交接的机制和制度,在政治交接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的建议。

**【关键词】**政治交接 民主党派 能力建设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克服了西方国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资本对选票的支配和竞选时的随意允诺导致决策缺失公共理性,决策施政严重倾斜于利益集团进而造成社会严重撕裂的缺陷,保持了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必要的政治整合能力,同时体现多元性的要求,为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和表达政治诉求提供了合法的渠道。民主党派作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重要参与者,在扩大人民民主、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防范执政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民主党派能力建设,保证其政治交接顺利完成具有重要意义。

## 一、政治交接与民主党派能力建设的内涵和相互关系

### (一)政治交接与民主党派能力建设的内涵

政治交接是个政治概念,并不是组织换届的同义词,它是一个过程。政治交接内涵的深刻和广泛,它既是组织上的新老交替,又包括思想、观念等层面的继承和发扬。民主党派能力建设是指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五个方面。

### (二)顺利完成政治交接有利于民主党派能力的提高

民主党派的老一辈领导人在与共产党合作共事

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坚定信念。民主党派在他们的领导下,不但能尽量地向执政党反映公民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从而使执政党的决策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使民主过程理性化。同时,还能很好地利用党派的独特优势,把散落在社会上的情绪型诉求或消融在形成漩涡之前,或经过有机的“过滤”把合理部分引入体制内,使民主过程合理化。老一代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工作,要使政党的生命力延续下去,就必须把政党的火炬传给新一代党外代表人士。民主党派在政治交接的过程中,通过老一代代表人士的引导,新一代代表人士和党派成员普遍受到了合作史、党派史的教育,政治交接有效提高了成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加强了他们自觉抵御西方基本政治价值的侵蚀的能力,夯实了多党合作的思想基础。在政治交接的过程中,通过老一辈党派领导人的言传身教和开展“结对子”活动,使新一代代表人士尽快地把握民主党派工作的性质和要求,了解和熟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内容和程序,使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得到提高。民主党派政治交接应该扩大民主,增加透明度,提高群众参与度,使进入民主党派领导层特别是担任主委的人既

作者简介:张才学,男,硕士,江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又要有坚实的群众基础。<sup>[1]</sup>

(三)民主党派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保证政治交接的平稳实现

首先,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政治交接的顺利实现。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治人物和媒体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民主政治和人权等问题多有诟病,把中国政治体制说成是威权制度,把美国和中国的矛盾说成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在国际上组织民主国家联盟围堵中国。他们认为只有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才是民主的,中国政党制度应该照搬西方的制度。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政治制度没有向西方靠拢感到失望,认为美国过去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失败了,现在应该改为对抗、竞争和合作政策。应该说这些声音对民主党派内一些人造成一些困惑,具有一定的诱惑性,这影响了民主党派政治思想的传承。提高民主党派政治鉴别力,增强抵制西方多党制和议会制等不良政治思潮的影响,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民主党派实现政治交接。<sup>[2]</sup>

其次,民主党派组织领导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其政治交接的顺利完成。民主党派组织建设制度化、规范化有利于保障政治交接的平稳进行。组织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又必须以广泛民主为基础,在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理念下,择优任用。在培养选拔新一代代表人士的过程中,通过教育培训、轮岗交流、挂职锻炼,使新一代代表人士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得到提高。这种培养选拔模式既能防止那些有西化思想的人进班子,又能保证新领导人的素质和能力。制度和程序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保证政治生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避免了因人事更替可能导致的政党管理混乱的情况,使党派成员能够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sup>[3]</sup>

## 二、政治交接中存在的民主党派能力建设问题

(一)民主党派政治交接的制度不够规范和完善  
民主党派的制度建设是民主党派政治交接的保障。政治交接不是短期性的工作,而是一项长期性和关系到民主党派存续问题的重要工作,必须要有完善的制度保障,避免人治和用人中的腐败现象产生。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领导制度、学习与培训制度、年度绩效考核与任期考核制度

等等,是民主党派政治交接的重要制度。只有健全和完善民主党派的政治交接制度,才能保障政治交接的顺利完成。反过来,政治交接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民主党派各项工作的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因为政治交接不仅是人事的变化,而且包括经验和优良传统的传承延续,这些经验和优良传统的总结就是制度。

(二)后备干部的培养受到思想工作短板的制约

民主党派接班人的能力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是影响政治交接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近年来自费留学热的持续民主党派吸收了大量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由职业者、留学归国人员等,使得其成员构成和社会基础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新的党派成员,竞争、平等、民主意识强烈,富有创新精神,政治理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多样化。但是,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所处时代不同,他们对民主党派的历史、性质、使命缺乏基本了解,对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与共的历史传统,无法产生共鸣,这种“先天体验”的缺乏和患难与共经历的缺失,造成一些民主党派人士盲目推崇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怀疑甚至否定我国的政党制度。反映在一些新一代民主党派代表人士身上,如政治意识、政党意识、合作意识不足,政治理论学习氛围不浓,工作责任意识不强,加入政党是为了谋取职位、扩大圈子、谋取利益。选拔党派领导干部,应该将政治把握能力放在重要位置。但在党派后备干部培养中,思想政治教育缺少有效的机制和措施,形式主义严重,实效性不强,高层重视,基层忽视和漠视。另外在选人、用人的时候,重专业轻政治的现象严重,过分看重其行政职务、专业地位和社会影响的高低,对其政治把握能力的考察不够重视,使党派的政治交接越换越差。<sup>[4]</sup>

(三)新时代民主党派合作共事能力受合作意识、方式和能力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要求民主党派提高合作

共事能力,当前,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能力还有所欠缺,难以应对这些挑战。

首先,合作共事意识淡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对合作共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分强调自己工作太忙的客观困难,认为中共应该主动寻求合作,自己参加协商和合作没有报酬,耽误时间,缺少大局观和责任感。有一些担任了一定领导职务的党派干部,缺乏合作意识,不讲纪律,我行我素;还有一些担任实职的党派干部在分管领域,只讲分工负责,不讲集体领导。不讲奉献,只讲利益。这些党派领导干部合作共事意识不强,意愿不足。<sup>[5]</sup>

其次,合作共事平台缺乏。在基层统战实践中,由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不健全,党派成员参加活动少,参政议政、合作共事的机会少。在一些市县,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多局限于人事安排,多靠担任领导职务的党派成员发挥作用。当地各个民主党派组织之间没有合作的渠道,中共党委也很少为党派成员提供合作共事平台。这既不利于基层统战工作的展开,也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能力的提升无益。

最后,合作议题设置能力不强,合作共事能力欠缺。在与中共就什么议题,什么事务合作上民主党派议题设置能力不强,主动性不够,多依赖当地党委提出来被动合作。在怎么合作方面,民主党派领导干部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出身,从事科研和专业技术工作的较多,具有某方面的业务特长和专业技能,观察事物、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有其独特之处,但不太善于沟通交流、合作共事、协调配合。工作要么单打独斗,我行我素。要么消极合作,应付了事。事事充当“老好人”、“听话人”,监督软弱无力,建言献策没主见;工作不汇报、不请示、不商量,听不得不同意见。这都会对民主党派履职尽责、合作共事产生不利影响。<sup>[6]</sup>

(四)政治交接中的责任担当受到组织建设弱化的影响

民主党派换届的政治交接,中共党委和统战部门起到了主导作用。受民主党派组织建设弱化的影响,其自身缺乏政治交接的主动性和责任担当,缺少有效的途径和措施。首先,部分党派政治交接的合适人选出现难产。由于部分党派的代表性人士数量减少,在换届选举时,突击提拔和“空降”现象时有发生,这有违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的规律,也影响党派的

可持续发展和政治交接。其次,民主党派代表性人士培养、锻炼缺乏平台和有效途径。选拔党派新领导人时,过分看重其学术造诣和专业影响,忽视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给组织建设和政治交接带来不利影响,阻碍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和政治交接。最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总体上比较松散,纪律性约束较差。一些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片面强调壮大组织,追求成员数量增加,有的党派把发展多少新成员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不注重质量,对发展的新成员不注重加入前学习教育和加入后的培训管理,特别是对干部培养、对成员的政治信念、组织纪律等方面的教育不够,约束力弱,给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和政治交接带来不利影响。

(五)建言献策能力受调查研究能力和质量的制约

首先,近年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突出问题,低水平重复现象较多,由于各民主党派之间缺少协调和合作,同一个议题多个党派重复调研,重复提案,分析问题不深入,提出建议可操作性不强,同质化问题严重,影响了民主党派和委员们的自身形象。减少数量、提高质量。

其次,专业化程度不高是现阶段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核心问题。现阶段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能力与党和政府对民主党派的要求及人民的期待之间存在着矛盾。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人员多数为兼职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参政议政的能力和精力受限,这制约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专业化水平。有些提案讲大道理,不够具体,缺少可操作性;有的提案写成了科普文章;有些提案面面俱到,没有重点。导致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建议对中共中央的决策和施政缺乏价值。<sup>[7]</sup>

最后,民主党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有待提高。有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年龄偏大,对于互联网、大数据、朋友圈、微博、网络问卷运用不熟练,还是习惯应用传统的访谈、查询、座谈、问卷、视察来收集信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不强。

三、新时代搞好民主党派政治交接与民主党派能力建设的建议

(一)建立和完善民主党派政治交接的机制和制度

政治交接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民主党派政治交接顺利完成的前提和基础。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

的重要支柱,法治化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和保障,民主党派作为中国政治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加强自身制度建设,走法治化道路,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第一,建立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制度。在政治交接之前应进行调研,通过调研访谈、情况摸查,征求大家对新领导人的意见,找准政治交接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从而制定措施和解决方案,确保政治交接的顺利完成。议事规则的规范化、程序化有利于发挥每个领导班子成员的积极性,有利于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政治交接要严格按照组织和章程要求,高效推进政治交接过程。政治交接之后,要继续跟踪,建立问题反馈制度和岗位责任年度考核制度,以便考核新的领导人是否称职,决定是否留任。

第二,建立和完善民主党派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制度。民主党派政治交接要把民主程序贯彻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全过程。目前,有些民主党派的政治交接,民主发挥还不够充分,主要体现在人选产生方面依旧有“人治”的痕迹,有的人加入党派时间很短、参加活动很少就成为党派一级组织的负责人,导致人事任免中的腐败现象产生。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部选拔任用要求以民主为基础,以“公开、公平、竞争、择优”为原则,才能选出真正优秀的新一代党派负责人。<sup>[8]</sup>

第三,选拔程序要规范化、制度化。选拔的标准要公开化、细化,这些标准至少应包括道德素质、政治素质、领导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还要有党龄的标准。选拔程序还包括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意测评和民主监督制度。

第四,建立和健全民主党派后备干部培养制度。包括建立和完善民主党派后备干部教育培训制度、实践锻炼制度、政治安排制度、领导职务安排制度,将干部交流、挂职轮岗、实职安排、政治安排等实践形式融入培养过程,尽可能为民主党派后备干部提供实践锻炼的机会和施展才华的舞台,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民主党派后备干部实践锻炼的需要。<sup>[9]</sup>

#### (二)在政治交接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

政治把握能力就是科学地判断形势和准确地把握政治发展方向的能力,是民主党派能力的重要体

现。西方国家总是企图向我国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民主模式,改变我国政党制度,这对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信念和政治选择提出挑战。与党派老一辈相比,年轻同志思想敏锐,富有开拓精神,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部分党派成员不关心关注政治,只注重经济利益,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政治进取心和热情退却和下降;少数加入党派抱有谋求政治权力目的的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花瓶”、“摆设”,加入民主党派“低人一等”。一旦目的不能实现,对组织就不关心,不参与组织的活动,极个别成员还产生退出党派的念头。

第一,以思想建设促进党派成员整体素质与能力的升华。面对新的历史状况,如何通过政治交接提高民主党派的政治把握能力是一个必须完成的必答题。这就需要各党派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要加强理论学习,坚定信念。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中共中央重要文献,不断提高思想道德觉悟和政治水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坚定“四个自信”。二要进行党史教育。要引导党派干部认真学习党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真切认识到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加强优良传统教育,夯实政治交接的思想基础。民主党派长期积累起来的优良传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革命和战争年代,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发扬优良的作风,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并肩奋战,体现了他们优秀的品质、高尚的风范与巨大的人格魅力。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要学习各自党派的历史和章程,进行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教育,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科学、民主、求实的传统,与中共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传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优良传统学习要常态化、制度化。<sup>[10]</sup>

#### (三)在政治交接中提高建言献策能力

建言献策能力是参政能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民主党派的基本能力之一。建言献策的水平和质量,转化为政策决策及现实生产力的力度和密度,

是其能力较为集中的体现,是体现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身能力和社会影响的最重要标准。结合政治交接提高党派建言献策能力宜采取以下措施:

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高调查研究能力,是提高建言献策能力的基础,提高多党合作能力和水平的途径。重视调查研究是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参政议政的深度与深入实践与调查研究的深度成正比例关系。

第一,首先要选好调研主题。选题之前要了解以往的提案及办复情况,尽量避免重复调研、提案。一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选事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计民生的大题目,选老百姓和政府最关心的问题,紧扣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热点,替老百姓排忧解难,替执政党出谋划策。二要突出实践研究、经验研究和对策研究。三要发挥自身专长,在自己专业领域进行调研,写自己熟悉的提案,这种提案才可能有深度,有高度,才可能提出比较专业的建议。四要多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交流。真正做到不沟通,不参政;不调研,不建言。<sup>[11]</sup>

第二,要开展接地气的调查研究,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观察了解问题的基础,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必要准备。调查研究是指通过查询、问卷、访谈、座谈、视察等方式来获取所需资料,并对资料进行研究。民主党派调研之前一要拟定详细的调研提纲、问卷和实施方案;二是要亲自走出办公室、课堂,深入田野、工厂、社区,实地调查研究,与调查对象亲自交谈,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三要充分利用间接资料和互联网获得第二手资料。为了节约时间、减少人力、降低成本,要利用好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微博微信、数字媒体、互联网、大数据等收集相关材料,这对于我们提出有针对性意见和建议至关重要。

第三,提高对调查材料的分析能力。要运用分析思维、综合思维、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发散思维、收敛思维、逆向思维这些传统思维方法,也要用灵感思维、联想思维、群体思维、网状思维、头脑风暴思维这类新的思维方法,对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多种思维方法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实现创新目标。例如,在参政议政确定选题阶段,可以采用分析思维、发散

思维、头脑风暴思维等方法去寻找问题,在参政议政调研报告撰写阶段,可采用综合思维、网状思维、联想思维、逻辑思维等方法去凝聚主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sup>[12]</sup>

第四,提升调研报告撰写能力,提高参政议政质量,使参政议政更专业。参政议政文本撰写阶段更是实现参政议政工作创新的关键阶段,因为文本撰写不是原始调查研究资料的简单堆砌,而是必须运用归纳、分析、比较、综合等一系列创新方法对原始资料进行加工和改造,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写出质量较高提案,实现参政议政工作的创新,取得较好的参政议政工作的效果。调研报告的落脚点是提出针对性强的建议。在具体措施上,一忌面面俱到,没有重点;二忌不够具体,缺少可操作性;三忌讲大道理或写成科普文章;四忌把目标当手段。<sup>[13]</sup>

#### (四)在政治交接中提升合作共事能力

合作共事能力是指借助政协平台和机制,动员各方力量,妥善应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升民主党派合作共事能力,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强化合作共事的意识。现在一些年轻人,多半是独生子女,从小被祖辈父辈娇惯,在家是小皇帝、小公主,考虑问题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合作意识。在主题教育活动中进行合作共事理论学习,强化他们的合作意识,要突出学习效果,真正入心入脑,避免走过场、搞形式。通过民主生活会、专题组织生活会学习合作共事,在调研、考察中锻炼提高合作共事能力。

其次,要搭建合作共事平台,加强实践锻炼,提升合作共事能力。民主党派合作共事能力不强,根源在于合作共事平台缺乏、制度不健全。首先,各级党委及其统战部要建立和完善合作共事平台和制度,规范合作共事主体、事项、范围、对象,保障合作共事正常进行。提升民主党派合作共事能力,不仅需要学习合作共事理论,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加强政治历练。其次,要为各民主党派组织和成员提供合作共事的实践机会,提高其合作共事能力和水平。要把优秀的年轻党外干部选派到合适的岗位上历练,让他们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过程中,感受合作共事,学会合作共事,逐步提高合作共事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与民主党派组织及成员的沟通

协调,主动通报工作,听取意见建议,鼓励他们积极建言献策。各民主党派成员在立足本职岗位,干好本职工作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大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sup>[14]</sup>。

最后,要宣传表彰合作共事典型,营造合作共事良好氛围。提升民主党派合作共事能力,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当前,我们对合作共事先进典型宣传表彰的力度不大,合作共事的社会舆论氛围不浓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一大批乐于奉献的、献身多党合作事业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其成长经历和先进事迹所体现出的合作共事优良传统,应该大力挖掘和宣传。在新时代,也有一批优秀民主党派干部,他们自觉坚持党的领导,继承和弘扬老一辈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合作共事的好传统,在领导岗位和本职工作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合作共事的先进事迹和先进典型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表彰,在全社会营造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团结奋斗的良好氛围。<sup>[15]</sup>

#### (五)在政治交接中提高组织领导能力

提高组织领导能力就是能够运用正确的方式,把本党派的广大成员及其它各种资源有效整合起来,使本党派成为团结协调、配合默契的集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sup>[10]</sup>组织领导能力形成的基本前提条件是政党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 1.加强各民主党派各级领导机关建设

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与协商,首先是在主要领导人层面的合作与协商。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是党派政治活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们的组织领导能力的高低,是与中共合作共事成败的关键。

首先,要选好、配齐专兼职领导。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那些政治坚定、专业能力过硬、组织领导能力强、群众认同的优秀人才担任领导职务。要防止那些思想政治素质不高,怀有私心杂念,个人主义膨胀的人进入领导班子。一把手要有参政履职和很强的管理能力、协调能力、决策能力和很强的执行力。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健全领导班子议事制度、会议制度和工作制度,使领导班子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sup>[16]</sup>

其次,要进一步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把政治素质好,参政议政能力强,善于监督,敢于监督,业务水平高的代表性人士吸收进来,并为他们成长提供锻炼的平台和岗位。要加强后备干部选拔、培养的制度建设,使后备干部的发现、培养、管理、使用规范化、制度化。<sup>[17]</sup>

#### 2.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政治交接责任

一是创新组织发展方式,吸纳更多优秀人才,扩大党派社会基础。当前,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发展面临困难,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优秀者大多加入了中共,民主党派在事业单位、公务员中难以发展优秀新成员,不得不降低标准,影响了发展成员的质量;基层组织活动少,组织关系松散,大家见面少,互不熟悉等,与执政党的组织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要突破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的瓶颈,必须在工作思路有所转变,在方式方法上有所创新。对已加入的新成员要加大培养力度,量才使用,给他们创造更多施展才华的平台和机会,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党务活动,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实践中锻炼成长。对积极参与党务活动和参政议政的成员,要积极宣传他们的事迹,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并且要大力表彰和奖励。请各级统战部门及相关联系单位牵线搭桥,吸纳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高、社会责任心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物加入民主党派。<sup>[18]</sup>

二是提高基层组织活动实效,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基层组织是民主党派工作的重要承担着,针对有些基层组织生活不正常、活动开展难问题,通过制定活动计划,可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组织生活,比如采取学习与调研相结合、考察和学习相结合、考察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组织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不断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习与履职相结合的基层组织活动形式,既凸显政治性,又能激发大家的兴趣和热情。<sup>[19]</sup>还应强化组织纪律,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对于长期不参加组织活动的成员,批评教育,屡教不改,可以开除出组织。

#### 参考文献

[1]王淑华.搞好政治交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2):19.

- [2]杨爱珍.民主党派政治交接与中国政治发展[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4):16.
- [3]刘继华,姜朝晖.民主党派换届的政治交接问题研究[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3):35.
- [4]张峰林.高校民主党派的建设问题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25-28.
- [5]高拴平.新时代参政党自身建设路径研究[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1):80.
- [6]张毅.民主党派建设与政治交接的相互关系探析[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2):22.
- [7]吴幼英.搞好政治交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5):3.
- [8]张永红.在政治交接中提升民主党派参政能力的思考[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1):26.
- [9]王飞,刘琼,方秀娟.民主党派政治交接与参政能力建设研究[J].湖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6):23.
- [10]许立坤.关于加强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的探索[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2):15.
- [11]刘振清.民主党派参政能力提高的制约因素与路向选择[J].湖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4):8.
- [12]强亦忠,许红.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的思考[J].2017(4):50.
- [13]李娜.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的思考[J].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20(4):30.
- [14]张师平.以政治交接为契机加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建设[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3):58.
- [15]李鹏.新时代民主党派合作共事能力及提升路径探析[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1):43.
- [16]郭强,贾贤良,陈景.代际变化视野下的民主党派政治交接问题研究[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6):15.
- [17]张峰林.浅谈民主党派在高校中的民主管理和监督作用发挥[J].学理论,2009(3):49.
- [18]闻壮宏,毕朝文.推动民主党派政治交接形成长效机制研究[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4):33.
- [19]杨光,陶杰.新时代加强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党派建设的思考[J].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4):15.

责任编辑:马霞

(上接第42页)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
- [2]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8.
-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81.
-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0-32.
-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21-522.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34.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70.
-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46.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83-284.
- [11]中央统战部等编著.中国统一战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57.
- [12]邓小平.邓小平论统一战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6.
- [13][14][15][16][17][18][19]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条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2021.

责任编辑:邹平惠



# 新时代党的留学人员事业的若干思考

张晨

**【摘要】**留学报国事业进入新篇章,党的留学人员事业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党的留学人员事业具有鲜明的继承性、与时俱进性和实践性的“三个战略支撑”新时代特点。秉承“推动党的留学人员事业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初心和志业,对新时代党的留学人员事业发展做出思考。

**【关键词】**新时代 留学人员事业 报国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新时代党的留学人员事业踏上新征程,既有新机遇,也有新挑战,唯有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方能展现出新时代党的留学人员事业的新格局、新风貌、新风采。在即将走进新时代的第二个10年的重要时刻,要进一步增强为党为人民的底色,塑造整体事业观、工作观,着力推动党的留学人员事业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今年是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结合五年工作实际,撰此文章,以飨读者,还望方家指正。

## 一、从“留学人员工作”到“党的留学人员事业”

相比于留学人员工作和留学报国事业,基于更高的历史责任和更高的政治站位,为发挥出更高更强更广泛的作用,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新时代大统战格局出发,强化“党的留学人员事业”观念,极为重要。

一是新时代留学人员工作尤其是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发展到新阶段,党对新时代留学人员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强调“党的留学人员事业”是留学人员工作发展的必然。二是留学报国事业进入新篇章,广大海内外留学人员有更大热情全身心投入,贡献智慧和力量,积极展现了留学人员群体的使命担当和良好风貌。三是留学人员工作的内涵逐渐丰富、外延逐渐扩大,从业务工作的专项程度和彼此联系看,已经形成了较为全面的体系架构,应该更加突出整体性。

四是日新月异的世情、国情、社情等环境条件深刻变化,尤其是与既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大为不同,从留学人员工作的角度看,我们面临很多大的挑战;而从新时代留学人员事业的高度来审视,我们则拥有更密集的资源 and 条件、更广阔的空间和平台等优势。五是强调党建与业务工作的融合性以及跨部门的协作性,留学报国事业的主体承担是广大海内外留学人员,留学人员工作的职能担当是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及其具有权责的工作机构,留学报国事业不足以全面阐释工作机构的业务工作,而留学人员工作亦不能全面表达工作机构的使命任务,党的留学人员事业是党和国家多部门协作、共同推进和广大海内外留学人员共同奋斗的结果,而非工作机构一家的职责。

唯有树立“党的留学人员事业”观念,方能理顺中央统战部与总会的关系、总会与工作机构的关系、工作机构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丰富并调整工作机构的“工作观”为“事业观”,促进留学人员工作在新征程不断内涵化发展,并逐渐形成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蒸蒸日上的留学人员事业。

## 二、党的留学人员事业的新时代特点

新时代留学报国事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留学报国光荣传统的继承性、勇于攀登的与时俱进性和“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sup>[1]</sup>的实践性。新时代党的留学人员事业与以往

**作者简介:**张晨,男,助理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咨询中心七级职员。



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和当下新时代留学报国事业紧紧相连,既是留学报国事业的传承和延续,又是对留学报国事业的引导和助推。具体而言,新时代党的留学人员事业的代特点体现为三个方面的战略支撑,分别是:为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战略支撑、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战略支撑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战略支撑。

(一)为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战略支撑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古往今来,人才都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要把我们的事业发展好,就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人才的重大战略意义。留学人员作为具有秉承留学报国传统、较高专业素养、多元文化熏陶、求学求知上进的先锋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出了自身群体鲜明的独特作用。新时代广大留学人员在传承留学人员先辈留学报国精神的基础上,同样具备了时刻报国的使命意识和更加自觉的报国行动。发挥留学人员群体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等方面的优势,为国家培养一批批新时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留学人员群体的人才聚集和人才储能等方面的优势,为人才强国战略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时代人才供给;发挥留学人员群体坚守理念、坚持科学、善于创新、敢于实践等方面的优势,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带来持续的动能、资源和条件。

(二)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战略支撑

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广大留学人员群体拳拳爱国之心和现实的使命感,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广大留学人员既能发挥才智、施展才华、追求个人梦想,又能“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把自己的梦想融入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壮阔奋斗之中”<sup>[1]</sup>;既能当好“促进中外友好交往的民间大使”,又能主动地“内引外联、牵线搭桥”、勇于肩负“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事务担当;既能学有所用、释放专业能量、追求专业理想,又能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场域中

磨砺自身、检验本领、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战略支撑

广大留学人员群体既发挥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也发挥着在某些领域、某些行业尤其是制造、科技、质量、航天、网络、交通、海洋、贸易、文化、体育、教育和人才等12个方面的先决制胜的关键性作用。无论是具有留学人员特色的助力脱贫攻坚行动,还是体现留学人员特点的建言献策以及有着鲜明留学人员特征的会员活动,既有强烈的使命意识、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投身报效国家的思想自觉、行为自觉,又体现出了对留学人员的思想引领工作作为“第一服务”“最大的服务”的鲜明品格。潮头千百浪,事业有人推。只要把思想之舵,塑好行为之身,留学报国的一腔热血就能在祖国的蓝图上不断描绘未来与美好。滚滚潮流,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留学人员群体要不忘留学初心,要更有使命、更有担当、更有创举,“堪当大任、能做大事”。吹响新时代的冲锋号,遍布全球的广大留学人员团结起来,共同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推动党的留学人员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

如前所述,既有超越普通“工作观”的“留学人员事业”观念,又有继承性、与时俱进性和实践性的“三个战略支撑”新时代特点,也有“推动党的留学人员事业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初心和志业。我们只有继续提高站位与格局,构建留学人员工作理论为基础的事业思维和事业观念,进一步丰富工作观点和工作视角、主动精准拓展工作领域,方能切实推动党的留学人员事业进阶发展。

(一)构建留学人员工作理论为基础的事业思维和事业观念

1.探索建立党的留学人员事业发展战略

抛砖引玉,以欧美同学会建设为例,笔者赞同以“政治建会、改革强会、人才兴会、依法治会”为主要内容的构想。从新时代党的留学人员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战略决策乃是首要决策,它决定了工作策略、工作方法以及所有工作事务方面的工作措施、工作手段。囿于视野,战略性研究论述,不能详尽。从迎

头赶上“新时代”到引领“新时代”,不仅是时期划分,更是阶段跨越。《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改革方案》中的增强“三性”、去“四化”、推动“四方面创新”、增强“三力”和发挥“三作用”以及“工作领域拓展到全国,工作对象拓展到全球”,已经初步建构了党的留学人员事业的框架和体系。新时代第一个10年,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各领域各方面工作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新时代即将走进第二个10年的关键时刻,留学人员事业尤其是具象的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等方面的发展战略研究更应该得以重视和加强,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成效化的工作机制也将得以期待。

### 2. 大力开展调研和基础理论研究,推动建构留学人员工作理论

鉴于留学人员工作经验的科学化、成文化,还应及时加强工作调研和理论研究工作,大力开展留学人员事业领域内的相关决策咨询,推动产生一系列科学决策成果。及时编纂《新时代党的留学人员事业概论(纲要)》《留学人员工作》(暂定名)等基础教程,开班设课,大力开展全国留学人员工作者专项业务培训,提升业务能力和水平,依托有关科研和咨询部门或自身力量组建的专门智库常规化举办学术年会,在有关期刊媒体设置“留学人员工作研究”专栏,推动留学人员工作理论学术化、学科化进程。学术化(学科化)过程,亦是本工作领域各阶段历史发展的梳理过程、基本工作经验的总结过程、调查研究的实证过程、优秀工作经验提炼过程、工作理论的探索建立过程以及工作效果评价等过程。

### 3. 大力发展会员,密切联系留学人员组织和会员个人,全面推动留学人员基础数据库建设

工作观视域(思维模式)下,会纠缠“存量”与“增量”问题;事业观主导的思维框架下,则关注所联系的工作对象——留学人员的普及性和代表性以及留学人员工作受众的覆盖面和广泛程度。数据新时代带来更多思考维度,会引发一系列的“常识”变革,比如,工作常识将成为“旧谈”,工作经验的效用性也会日渐降低。数据思维要求以量化的数字和数据为支撑、质性分析为佐证,工作对象——留学人员在不同专业领域、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行业等方面的代表性将代替一般“代表性”,留学人员的数据

总量、规模与留学人员相关数据的潜能与价值挖掘将代替会员人数统计和信息收集工作,精准联系、精准服务与精准对接等精准工作目标和任务也将逐渐走进工作视野。关于“代表性”,就是“优中选精”,建设归国留学人员代表人士队伍是欧美同学会领导机构和领导体制改革的关键性工作,是建立和推行会员代表大会制度的首要条件。新时代要打破留学人员服务、管理、引导等工作模式的“条块”,打破信息、数据和资源的孤岛,塑造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和天然具备数据潜在价值(潜能)的留学人员基础数据库。与既往的“经过本人正式提交申请,审核成为正式会员”不同,新的吸收、联系工作模式可转变为:所有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自然成为会员。与既往的“谁建设、谁使用、谁管理”模式不同,数据资源对留学人员事业群体单位是以信息边际共享系统为基础的、以信息安全为前提的有限开放使用,各相关单位的管理者则集中精力于该业务领域的深度数据挖掘与价值开发等方面工作。数据是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数据化治理的基础,鉴于数据容量的相对无限性,留学人员组织的数据化也可考虑,同步加强对留学人员组织的数据化治理,通过科技+、AI+等形式为当前工作赋能。

### 4. 大力开展网络欧美同学会建设,大力提升“留学人员之家”的建设质量,大力引领和发展留学生文化

政治吸纳、政治引领是目的,文化引领、文化熏陶是手段。新时代更有数据、网络、信息的高精尖科技手段作为支撑,在建设网络欧美同学会的过程中,大力开展以留学报国精神为主旋律的“向老一辈留学人员学习活动”(比如,建国海归留学报国事迹的系列学习活动)、“留学人员之家”至少通过几项具体事务实际服务留学人员、弘扬留学人员精神文化、宣传留学人员优秀精神风貌和优秀事迹、推动设计以卡通人物“欧美君”形象为载体的视觉传播和以“留学报国”为主题的央视公益广告等方面的工作,通过一系列留学人员喜爱、接受的方式,创新活动模式,每年争取创造某一项活动能够直接或间接吸引、调动百万级规模的留学人员的参与和关注,通过能够实际影响留学人员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活动,协同推进留学人员思想引领活动,打造坚强思想阵地,完成好“首要政治任务”,真正打造一支铁军。

铁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活动,就没有活力”。或可通过中央拨款、社会各界捐款等在内的形式筹集资金,投建具备茶餐叙、会议、住宿、适当体育场地为一体的建筑实体,专司服务留学人员的“留学人员之家”。把“留学人员之家”作为对外直接服务留学人员的“窗口单位”。各地欧美同学会或可根据情况,考虑建设实体的欧美同学会培训中心或“留学人员之家”。同时,要着力解决平衡“活跃”和“调控、治理”留学人员组织的问题。吸引力、凝聚力、影响力“三力驱动机制”和作用机制也应积极探索和研究。如何吸引、怎么凝聚、影响到什么程度,从基本工作经验入手,归纳出三力驱动机制和三力作用机制,方能进一步探索留学人员工作方法论和留学人员事业发展规律。

## (二)基于“事业观”的其他考虑

党的留学人员事业是不断发展着的宏伟事业,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宏大课题。囿于视野,考量二三,暂以浅述。

一是深研服务对象,厘定不同服务对象和不同类型工作边界,细致谋划整体“事业观”下的具体工作方法、途径、载体、措施与手段。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制定广泛联络、密切联系各种其他类型(包括非官方、非正式和海内、海外)留学人员组织或者由留学人员作为主体构成的社会组织、民非企业以及各校校友会、知名学生社团和以留学人员为主体的各类型草根组织的工作机制。尝试探索建立海外联系机制和服务机制,以服务尤其是“第一服务”吸引、聚集各留学人员组织,先从组织体系的大图结构中扩展工作视野、增强精准观察分析的能力和水平,丰富和完善整体“事业观”下的基本工作思路。

二是逐步建立以欧美同学会(工作机构)为中心的工作单位集群,探索形成留学人员事业的工作部门集体结构和框架。或可考虑对欧美同学会(工作机构)工作系统增编赋能,有效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让“小机构大作为、小机构勇作为”,进一步优化工作部门设置、迎合新时代新增必要的业务工作流程,增强有关内部工作制度适应“开门办会”理念,从组织行为系统上进一步弱化“官性、官派、官气”,善于提高政治性、增强吸引力、优化聚合力,促使其进一步提升工作系统的总体工作效能。

三是鉴于现实中存在的赴港澳台求学归来人

员,要下大力气解决好“夹心层”“不管、失管、脱管”问题。“没有一寸疆土是多余的”,港澳台等出境求学(含归来)人员的思想引领应该得到重视,对于赴港澳台的求学人员以及港澳台当地的求学人员各类型组织,应当在充分调研、摸清底数的基础上,科学梳理工作脉络、探索相应的联系与工作机制,予以实施起来。港澳台求学人员同样具有强烈的“报国”情怀,笔者暂以为不能因为“出国留学”和“出境求学”的差异等方面因素,把留学人员统战与服务对象作生硬性的划分和割裂,同时,更不能因各相关工作部门的“职权职责”之限度,主动出让或放弃事业领地,主动为工作场域留白,造成事业里的“真空”地带并带来相应的副效应。党的留学人员事业更应强调整体工作观,不能以某一部门的“职责权限”作为事业领地的全部范围。实践表明,把赴港澳台出境求学人员和相关求学人员组织联系联络起来是十分必要的,开展同赴港澳台求学的莘莘学子的沟通联系等“连心”工作意义不可小视,组织、吸引、引领赴港澳台求学人员具有现实上的迫切性。

四是从事业发展的周全性考虑视角出发,暂以为要高度重视在我国求学的外国来华留学生(人员)的组织、引导和管理的工作。按照现有的“规范性”工作内容来看,外国来华留学人员不在工作系统的服务对象范围内,但从整体国家观和人民事业观来看,有必要对“工作周边”进行一定的讨论。择“组织化”一例而言,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或可考虑以特定的形式新组建“外国留学人员联谊会”或“外国来华留学人员联谊会”(暂定名),有效组织和引导在我国求学的外国来华留学人员。

经初步思考,“外国来华留学人员联谊会”或可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牵头开展思想引领工作,广泛开展中国革命传统教育、中国优秀家风家教与中国传统“知礼”儒家文化等相关活动;二是建立与所在高校机构的沟通联系(联席工作)机制,考虑增加“外国来华留学人员”集体学习、参观和体验等实践活动的时间密集度,或可考虑通过合理适当地设置相关课程,来培养和增加来华留学生对我国情社情的了解和认识,侧面压缩他们自由娱乐、自由恋爱等个人自主行为,组织正当合适的活动来激发他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下转第77页)

# 网格化背景下民主党派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屈莉莉 于静 段文浩 刘磊

**【摘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高度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民主党派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发挥参政党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主动担当作为,为基础社会治理添砖加瓦。社区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区创新,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社区网格化建设是关键。本文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解读民主党派参与网格化治理的重要性,以及推进网格化治理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民主党派参与社区网格化治理的路径。

**【关键词】**民主党派 社会治理 网格化治理 路径选择

## 一、民主党派参与社区网格化治理的重要意义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高度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sup>①</sup>。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的好坏,关系到社会治理的稳定性,“地基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治理工作就是一座参天大厦的地基,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做好基层治理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社区网格化治理作为基层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在解决社会问题、协调利益关系、疫情防控、综治民调、扫黑除恶、信访维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sup>②</sup>。小网格解决大问题,以网格作为承载各种资源、吸纳治理力量的平台,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基层社会治理中,民主党派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主动担当作为,紧紧围绕党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系列制度建设,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有序参与基层网格化治理,积极发挥联动作用

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对事关基层社区网格化

治理重要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形成高水平的调研报告等,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参政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到关键处”,推动基层社区网格化治理实践向纵深发展。对于一个具体的网格中的行政性力量和协管力量的有效配合,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需要将社区中的行政部门派出机构和协管辅助力量有机调动起来,借助网格化实时监控系統,规划设置多项管理预案流程,来完善“一般问题职能部门分头解决,综合问题街区牵头解决,疑难问题社区协调解决”的网格化管理机制。街区网格实体化建设,通过公安、工商、城管等各支执法队伍向街区派人员,实现城市管理工作由联动、联合、联网到联勤的跨越,形成了执法重心下沉、管理合力增强、权责明晰、反应迅速的城市管理“四联”新模式,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实行网格化服务管理,可以让基层的问题和矛盾在基层得以解决,从而为社会的稳定和谐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夯实民主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履行基本职能

民主党派干部通过民主监督的形式参与基层社区网格化治理,给社区干部决策和搞好网格化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建议和意见,使得社区网格化工作者能及时有效的发现和解决社区存在的问题。社区是社会

作者简介:屈莉莉,女,中共临泉县委党校讲师。

于静,女,临泉县委党校助理讲师。

段文浩,男,临泉县委党校讲师。

刘磊,男,临泉县委党校讲师。

各类要素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各类信息流动和变化最快的领域。社区治理的关键是实时掌握这些要素,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及时跟踪解决问题。在实践中,许多地区探索“网格化”+“信息化”模式,将社会管理最大限度落脚在社区、做实在街区。网格化管理以信息系统为支撑,有效解决了“情况不明”和“信息孤岛”问题<sup>③</sup>。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的预防作用,只有重视源头问题源头解决,才能在网格化管理中主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进而更好的解决矛盾和冲突。当前“互联网+”也开始运用到社区网格化管理中,进一步提升发现问题、互动、共享水平,提升管理效率。

(三)整合网格内的各种力量,提升城市管理的合力作用

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也是民主党派履行自身职能,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责任担当,是民主党派参与基层网格化治理的重要抓手。实行网格化管理,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服务管理搭建了平台。在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可以充分发挥“网格管理工作站”、“党群服务工作站”、“联动警务工作站”,将职能场所和党群工作力量整合到街区网格。同时,加强党建引领,发挥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组织力量,以街区网格为平台,开展“网格化联合走访、组团式双向服务”活动,为区域内驻区单位、“两新”组织提供服务,也通过走访为驻区单位和企业服务社区搭建载体,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新的平台,形成了社会的凝聚合力作用。

## 二、民主党派参与社区网格化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民主党派参与社区网格化治理机制不完善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网格化工作的推进已成为疏解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亮点。虽然网格化治理工作在各地已形成完善的工作机制,但在实际调研中发现,网格化治理工作在推进中仍然存在很大的难度,有的地方网格化治理仍停留在制度层面,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深入,工作没有真正落到实处<sup>④</sup>。尤其是民主党派有效参与社区网格化治理工作在制度机制保障方面尚缺乏较为明确与系统的支持。由于网格化治理需要综治办、派出所、司法局等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然而在实际工作推进中,各部门之间依然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导致综治协管员、首席调解员和警务助理等虽然都承担了各自在网格化治理中的角色,却没能真正有效衔接,形成不了有效融合的局面,这样一来既浪费了现有的网格人力资源,又不能及时解决真正存在的问题。

(二)民主党派参与社区网格化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网格化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需要一支专职化程度高、队伍稳定的社区网格化治理工作队伍。民主党派成员在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乡村振兴以及卫生安全体系建设等方面人才储备还有很大缺口。实际调研中发现,基层社区专职网格员很少,绝大部分网格员队伍都存在文化水平不高,年龄较大的现象。由于网格化工作都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来实现,需要网格员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水平,较大的年龄比重和较低的文化水平使得网格化工作的推进受到一定程度的阻力。专业化的培训可以更新理念和工作方法,因此针对民主党派基层网格员专业化的培训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作为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基层网格员,日常工作涉及面较广,专职人员较少,工作繁重压力大,加上工资待遇不高,晋升空间有限,导致无法调动基层网格员的工作积极性,也让网格员的工作效率大打折扣。

(三)民主党派参与社区网格化治理缺乏法治保障

当前,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重要性缺乏清醒认识,对民主党派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不够重视,缺乏支持,更缺少法治保障。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一方面是社会各界对社区逐渐增强的期望,另一方面却是社区居民间逐渐陌生的关系,特别是在城市社区中,居民间互不相识甚至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网格化治理也迫切需要相应的法治做保障。通过调研发现,关于网格化治理的相关立法文件几乎没有,这就导致在网格化治理工作中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资待遇等问题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严重制约网格化工作的推进。法治中国的推进需要自上而下的各类法律条文的制定和实施,而网格化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式,各项工作的制定和推进中也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律条文做支撑,才能保证创新方式的顺利实施和创新成果的有效巩固。

(四)网格化治理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家门口的优质服务和精细管理<sup>⑤</sup>。网格化治理在健全基层党组织

领导的前提下,还应该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民主党派依靠群众力量来提供更好的服务质量。调研中发现,网格化治理工作中,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在加快,邻里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也越来越严重,这就需要民主党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打破现有的僵局,激发群众“自治”的热情,积极调动更多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网格化治理工作中来,打通精细化服务的末梢神经。

### 三、民主党派参与社区网格化治理的路径选择

#### (一)党建引领民主党派参与社区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社区网格化正是这一体系的生动实践。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积极推动网格化工作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网格化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网格化治理效能。民主党派参与社区网格化治理工作要有长期和明确的规划和安排,以实现民主协商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各级党委政府要全力支持各民主党派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规定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帮助他们提高参与治理的能力,为他们广泛深入和多层次参与基层治理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不仅能确保新时代网格化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而且能够调动和整合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不同主体的资源和力量来服务网格化治理,推动多方联动解决跨部门、跨区域问题,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精细化的服务。更好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就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健全网格化治理党的领导体制。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网格化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使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的作用得到强化和巩固。发挥党建示范引领作用,还需要建立一套可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可以将社区网格化治理工作完成情况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考核结果也可以作为干部提拔使用和降职处分的依据之一,以强化领导的责任,培育领导干部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的工作意识<sup>⑨</sup>,真正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

#### (二)共建联动机制支持民主党派参与治理

党章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支持

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以党的领导为指引,把政治、组织、机制和能力等方面的引领融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才能使网格化治理政治方向不偏离,资源能力有保障,才能上下贯通、左右协调,形成社会治理有效合力,切实提升基层社区对抗重大风险的能力。共建联动机制,也是为民主党派提供广泛参与基层治理的条件和保障。极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以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为重点工作,在关键时间节点、重点部位要安排专项排查活动,尤其要在每月固定时间开展基层矛盾纠纷排查活动,落实“五个一”工作制度,及时交办,依法化解。积极开展“百姓评理说事点”工作,真正做到细心倾听民声,了解人民群众所期所盼,通过“百姓评理说事点”的信息员传递消息,使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得到稳控,第一时间调处化解,使问题消除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完善新乡贤、法治村长、法律顾问参与矛盾纠纷化解交办制度,持续推进政法干警进网格活动,定期组织司法干警、律师走进所包网格,与网格内的村干部、志愿者网格员进行工作结合,发挥职能优势,在网格内发挥“六大员”作用,开展法治宣传、化解矛盾纠纷、提供法律服务等筑牢网格化治理的第一道防线。

#### (三)努力完善民主党派参与网格化制度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将这句话放到基层治理上也是非常有指导性的。制度支持可以给民主党派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可操作的抓手。网格化社会治理作为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没有健全的制度建设作支撑,工作推动总会迟人一步。因此,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基层网格化制度建设,完善基层网格化治理机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工作协同、数据共享、智慧升级。针对“管理权限不足”等问题,增强网格化支撑力量,实现服务精准投送、治理精准落地,及时了解掌握网格内的各类情况,治理精准落地,激发网格员工作动力。深入推动网格化工作机制与基层治理体系的有机结合,做到党员挂上户,网格来服务,为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无死角服务”,着力提高基层党组织为民服务的能力,实现“一呼百应,各方相助”的局面,将功能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整合现有党建、综治、民政、信访等各类网格,实现无缝化管理、全覆盖服务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实现“一网多能、多



网合一”。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并试点实施民主党派监督基层公权力制度,同时将民主党派基层公权力监督制度纳入纪检监察体系当中,双向约束,到达完善基层公权力的垂直问责和容错纠错的目的。持续优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发展新路径,打造服务群众的党建品牌,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进行测评,以更高的政治站位、不断提升社区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构建网格员分层级的薪酬待遇,综合考核测评结果分级分档兑现报酬,对表现优秀的予以奖励,擦亮党员干部的先锋本色,高水平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 (四)提升民主党派网格员队伍专业水平

打铁必须自身硬,制度的落实需要强有力队伍的保障,网格化工作的顺利推行,得益于有一支爱岗敬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民主党派网格员队伍。民主党派要当好凝聚共识的角色,在社会治理中把工作重心向基层困难群众和特殊人群倾斜,多关注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开展调研,做好咨询等工作,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适当提高网格员的准入门槛。从年龄和学历方面入手,合理确定网格员数量,适当选拔素质和能力俱佳的专职人员作为网格员,逐步提高网格员的素质。针对目前网格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为提升队伍的业务能力,切实提高网格化服务管理水平,调动网格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常态化开展全体网格员业务培训,提高网格员的责任意识和业务水平,切实提升网格员队伍素质,为真正实现“小网格”服务“大民生”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时还要健全网格员的福利保障。网格员作为推进网格化治理的重要力量,基层政府应将网格员的基本工资以及网格员的培训经费和网格化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作经费等纳入当地财政预算,设立专项经费,明确考核标准,以保障网格化治理工作的顺利推进。此外还要建立健全与工作强度相适应、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相匹配的薪酬待遇正常增长机制<sup>[7]</sup>,真正消除顾虑,为网格员队伍建设营造一种积极的、良好的成长环境,才能真正让网格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看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得到自己应有的尊重。

#### (五)拓宽民主党派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民主党派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政府要保障其自身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社区不是孤立存在的,社区的发展及职能建构不仅与社会整体发展相互影响,社区的发展还需要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积极参与进来共治共

建共享。要破除社区网格化治理水平现代化难题、增强基层社区应对危机能力,民主党派就需要积极引导内外力量参与社区网格化治理。加强网格化宣传,以及对多元主体参与渠道的探索;提高居民素养,增强自治意识与能力<sup>[8]</sup>。广泛的社区参与可以调动社区资源,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对社区事务并不关心的居民之间的“机械团结”转变为大家共同参与社区事务、共同协商、献计献策打造美好家园的居民之间的“有机团结”,共同朝着社区建设目标努力,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网格化治理共同体。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吸纳合法的社会组织进网格,为社区网格化治理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购买服务之后,相关部门就可以引导和支持其参与到社区的治理建设当中,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扶持和奖励措施,为社会组织提供保障<sup>[9]</sup>。只有这样,社会组织才能在保证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保障自己的社会利益,为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贡献社会组织应有的力量。

#### 参考文献

- [1]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M】. 人民出版社, 2022:484-491.
- [2] 严旭,袁明.社区网格化治理的价值审视及效能提升【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01):102-106.
- [3] 王名,杨丽.北京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2(02):119-121.
- [4] 林晖.网格化治理的基层实践研究——以福清市为例【J】.福州党校学报,2022(04):92-96.
- [5] 周韵曦.总书记的关心关怀给我们带来奋斗创业的无穷动力【N】.中国妇女报,2023-03-06.
- [6] 王琦.江苏省社区网格化治理工作的实践探索【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01):58-64.
- [7] 李芸洁.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质效 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以四川省乐山市为例【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22(07):109-112.
- [8] 马海良,洪楚悦.农村社区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的逻辑体系和优化路径【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20(2):131-138.
- [9] 李玲.社会治理视野下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研究——以郑州市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为例【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7(03):87-89.

责任编辑:常海哲

# 中华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傅 宁

**【摘要】**本文旨在探究中华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文章首先回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然后分析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作用,包括家庭价值观、儒家道德观、和谐生态观等,其次探讨了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直接作用,着重论述了两者的思想共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社会制度与治理的创新等方面,最后指出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使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自信、社会稳定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继而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源,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引。

**【关键词】**中华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自信

## 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指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保留和弘扬本国传统文化,以及在现代化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的发展模式。与传统的西方式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社会公平、文化传承和环境保护,以实现全面发展。在这种模式下,中国试图通过保持自身价值观、文化认同和社会秩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凝聚力。这也意味着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尝试寻求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平衡,以创造更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已经引起了学者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些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他们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传统文化、西方现代化模式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和优势,还关注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以及中国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sup>①</sup>。一些学者关注了党和政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方面所采取的政策与实践,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以及这些政策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实际影响,并探讨了党和政府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平衡经济发展

与社会稳定<sup>②</sup>。

随着现代化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推进,许多国家在融入国际体系的同时也付出了文化认同的代价,而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显然呈现出了独特的模式,试图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保持文化的传承。中国在全球化与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这个过程并非简单地追随西方的现代化路径,而是在融汇中外的基础上,塑造了符合本土情境的发展道路。应该看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成功保持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关键也来源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华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石,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渗透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社会行为之中,不仅反映了过去的历史和传统,也承载着对未来的期许与愿景。

鉴于上述学理探析,笔者认为中华文化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基于此,文章旨在探究中华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所扮演的内在角色,以及其对于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独特价值。

## 二、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渊源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源自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化遗产。这些价值观在中国式现代化中

作者简介:傅宁,男,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编辑。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更塑造了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这些核心价值观在现代化进程中既是指导,又是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一)家庭价值观与社会和谐稳定

在中华文化中,家庭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孝道、家庭和睦以及代代相传的价值观贯穿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这种价值观不仅使得家庭成员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和和谐。中国式现代化在追求经济繁荣的同时,注重家庭价值观的传承,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当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下,家庭观念也发生了现代化的转化。家庭的角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生活和社会单位,而是扩展到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责任,这使得家庭不仅是情感共鸣的场所,而且是个体全面发展的起点。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不仅关系到个体幸福,也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个体在家庭的角色中融入现代社会的理念,既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也注重家庭的社会功能。这种将传统家庭价值观与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的做法,实为中国社会所独有。

#### (二)儒家道德观的现代转化与价值重构

儒家道德观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也经历了现代化的转化过程。儒家道德观强调的“均平”“仁爱”和“诚信”等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些价值观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被理解为鼓励社会公平、尊重他人、诚信守约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品质和社交规范。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下,儒家道德观被重新诠释为一种引导人民日常行为的道德准则,既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又有助于社会稳定。这种现代化转化使得儒家道德观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 (三)和谐生态观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与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等价值观相契合。中华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为人类应该尊重自然、保护生态。这种观念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得到了强化,推动着中国在能源、环境保护等领域采取创新的举措,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现代社会,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挑战。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生态智慧,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国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减少污染排放等环保举措,体现了中华文化和谐生态观的当代应用。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地球家园,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独特的人文关怀。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快速扩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截至2019年底,中国在运在建核电装机容量6593万千瓦,居世界第二,在建核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率显著提升,2019年全国平均风电利用率达96%,光伏发电利用率达98%,主要流域水能利用率达96%<sup>[9]</sup>。

#### (四)道德与社会责任的结合与社会稳定

中华文化历来注重道德建设,强调个体应承担社会责任。这种价值观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增加,道德观念的引导和社会责任的履行变得尤为重要。中国式现代化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倡导个体在社会中具有责任感和道德约束,这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提供了基础。中国式现代化鼓励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应承担起社会责任,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作出贡献。

在现代社会,道德观念不仅在个体行为中发挥着作用,也在社会制度和法律框架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社会公平、公正,坚持依法治国,将传统的道德价值与现代法律相结合,为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环境。这种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做法,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还有助于构建一个充满活力且具有凝聚力的现代社会。

### 三、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直接动力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结合不仅在理论上有所体现,更在实践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丰富的内涵。

#### (一)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共通性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共通性方面体现了其结合的可能性。中华文化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仁爱、诚信,这与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公平、人的全面发展原则相呼应。例如,中华文化的“仁者爱人”思想蕴含着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情感,与马克思主义

的关注社会公平的理念相契合。这种思想共通性促使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相结合,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思想基础。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文化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得到了巧妙融合。中华文化注重仁爱、孝道、诚信等价值观,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责任和社会的和谐,而马克思主义则强调社会公平、人的全面发展,着眼于消除阶级差别和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这两种道德观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框架得以统一。通过将中华文化中的“仁爱”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公平正义”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在道德层面强调了个体的社会责任和社会的公正。这种结合使得道德观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规范,更是社会秩序和个体发展的双重保障,为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 (三)社会制度与治理的创新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在社会制度和治理模式方面体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促成了中国强调人民福祉的治理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sup>[4]</sup>这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倡导的国家与人民紧密相连的治理思想,深受中华文化中“国之本在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体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切。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制度方面不仅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不断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例如,中国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结合中华文化中对农村的关怀,强调保障农民权益,为实现农村的全面振兴提供了制度保障。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发展方向上更具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 (四)文化自信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更能体现文化自信,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始终强调文化自信在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想体系,为中国

提供了参与国际事务的视角。例如,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不仅注重经济合作,也倡导文化交流,通过推广中国文化符号,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这种文化自信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更具有全球视野和战略深度。

#### 四、结语

本文通过探究中华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角色,以及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揭示了中华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而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直接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更在文化传承、社会和谐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展现了独特价值。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社会提供了道德引领,为市场秩序与和谐奠定了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理念则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前进的动力,并促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更是中国社会文化认同和传承的重要支撑。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崛起,更在文化、思想和道德层面展现了自身的魅力。这种文化自信和社会稳定的相互促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独特的发展路径。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中华文化将继续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也将继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久的力量和动力。

#### 参考文献

- [1]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70-372.
- [2]杨建华.发展社会学通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98.
- [3]新华社.《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EB/OL】[2023-08-25].[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2/21/content\\_5571916.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2/21/content_5571916.htm).
- [4]新华社.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3-08-25].[https://www.gov.cn/zhuanl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https://www.gov.cn/zhuanl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责任编辑:邹平惠

# 从左宗棠家规家训看 中华文化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促进意义

柴文斌

**【摘要】**清末名将左宗棠,以收复新疆开发西北的历史功勋而名垂青史。他的家规家训凝结在其家书、诗文及奏折文书中。左宗棠家规家训深受中华文化熏陶,其热爱祖国、反对分裂、简洁奉公、要求子孙刻苦读书明理,贵在力行致用,要永保寒素家风,力戒各种恶习等家规家训对当下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学习。

**【关键词】**左宗棠 家规家训 中华文化 作风建设

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风廉政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工作,言必信、行必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点准穴位、猛药去疴,标本兼治、驰而不息,从中央八项规定到反对“四风”,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开展,中央始终把干部作风建设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紧紧抓在手上。清末名将左宗棠,以收复新疆开发西北的历史功勋而名垂青史。他的家规家训凝结在其家书、诗文等文书中。左宗棠家规家训深受中华文化熏陶,其热爱祖国、反对分裂、简洁奉公、要求子孙刻苦读书明理,贵在力行致用,要永保寒素家风,力戒各种恶习等家规家训对当下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一、左宗棠家规家训的要义及核心内涵

左宗棠生于1812年,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但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他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一生经历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推动洋务运动、收复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

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73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中收录了左宗棠从咸丰二年(1852年)到光绪九年(1883年)的家书163封,其中除了几封是给其妻周夫人与侄儿、侄儿的,其余150多封都是给其长子孝威与二、三、四子孝宽、孝勋、孝同的。<sup>[1]</sup>从这些家书及诗文中得以让世人全面了解左宗棠家规家训的要义及内涵。

### (一)廉洁奉公、热爱祖国是第一要义

左宗棠虽然有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不光彩历史,但其兴办洋务,资助学人、书院,尤其是以年迈之躯,必死之念收复新疆可以看出他热爱祖国,一心为国的胸怀。左宗棠的爱国不仅是大事、国事,也是琐事、家事,是一种无形但有力的家规家训。同治九年,左宗棠的夫人病逝,左宗棠嘱咐儿女们要勤俭处理丧事,不要借母亲丧事为名大操大办,如果是理所当用的,稍多一些无碍;所不当用,即使是一文钱也不可多用。同年,左宗棠的儿子孝威和孝宽打算在湘阴老家添置一份田产,写信报告父亲,左宗棠

作者简介:柴文斌,男,新疆社会主义学院统战教研室讲师。

回信给他们,坚决拒绝,并告诉他们:“吾自少至壮,见亲友做官回乡便有富贵气,致子孙无甚长进,心不谓然,此非所以爱子孙也。今岁廉项,兰州书院费膏火千数百两,乡试每名八两,会试每名四十两,将及万两,而一切交际尚不在内。明春拟筹备万两为吾湘阴赈荒之用,故不能私置田产耳。”同治十一年,孝宽借准备为父亲祝寿为名,将家中旧屋改造一番,花费了600多两银子,他写信严厉痛骂:“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sup>[9]</sup>其对家人的“吝啬”和对国家的“慷慨”实质是其家国一体,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在这份家书总,他还写道“西事败坏至极,吾以一身承其敝,任其难,万无退避之理,尽其心力所能到者为之。”<sup>[10]</sup>可见,其为国家献身做事的坚强意志。左宗棠多为国家做事,少向国家索取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家书灌输给其家人,其家人深受其益。左宗棠总共有四个儿子,三个儿子都远离官场,只有第四个儿子左孝同曾在军中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官,曾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驻守山海关时,邀请左孝同担任总办营务。后来战争失败,吴大澂被免职,左孝同也离开官场过起了清静日子。

## (二)倡导统一,反对分裂国家

19世纪中叶,英、俄两国在中亚争夺殖民地,并觊觎中国新疆。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乘新疆动乱之机率军侵入,自立为“汗”,建立伪政权;十年,沙俄也出兵占领伊犁地区。新疆面临被英、俄肢解的威胁。面对“塞防”与“海防”之争,左宗棠痛陈利害,他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扰,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所以“时事之宜筹,漠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此论符合中华民族之长远利益,得到朝野普遍赞扬。清政府采纳左宗棠等人重视“塞防”、收复失地的意见,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收复新疆。要反对分裂,就要爱憎分明。对敌人坚决斗争,对群众坚决团结。对沙俄、阿古柏,左宗棠坚决与之斗争,甚至抬着棺材进疆。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各民族同胞是和中央政府站在一起的。对各族群众,左宗棠予以团结。他在《与孝

同》的家书中写道“我到哈密,久居新营,人马均吉,汉、回民情尚觉朴厚,其爱戴之意教关内无殊,我亦安之”,“不许妄行杀掠焚烧,故能迅赴戎机,永弥异患,老怀一纾。尔能细细体会,自可增长识解。”<sup>[11]</sup>面对陕西回汉纠纷与宁夏马化龙利用宗教蛊惑民众进行反叛,左宗棠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同治十年,他在《与孝威孝宽》的家书中写道“金积堡琐围久合,马化龙只身就擒。若论敷衍了事亦可结局,然此贼谋逆日久,蓄机甚深,此时稍微松手,将来仍旧是西北隐患。且戎狄之患最难收拾,本朝都燕,以为九边为肩背,尤不宜少留根荦重为异日之忧,不比陕回由积衅私斗起事尚可网开一面也。”<sup>[12]</sup>左宗棠曾深有顾虑的说,如果失去这次除灭马化龙的机会,恐怕日后马化龙会成为异日的李元昊。其认为马化龙势力做大,势必形成分裂势力,这是左宗棠一定要杀掉马化龙的主要原因。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1871年1月6日)马化龙再度乞降。清军其后从堡内搜出匿藏一千二百余支俄制枪械。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十三日,马化龙与其子马耀邦以“私藏武器”和“勾结外国”罪名被凌迟于吴忠四旗梁子。其以家书形式介绍当时形势,一来是“长见识”,二来在家人中弘扬了维护祖国统一、坚定反对分裂的思想意识。

(三)要求子孙刻苦读书明理,贵在力行致用,要永保寒素家风,力戒各种恶习

左宗棠三次上京应试落第之后,就决心再不应试,在家教书务农,教育子女,做了一段时期的职业教书先生。四十岁的左宗棠入佐湘幕,在外南征北战达三十多年,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社会实践经验丰富。他一方面要求家人刻苦读书明理,在家书中劝诫子女“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六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sup>[13]</sup>另一方面,他更强调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白圣贤所说的做人做事的道理,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正如他为左氏家庙所撰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一样。左宗棠要求家人要永保寒素家风,力戒各种恶习。他担任总督前后达二十多年,以每年年俸二万两白银计,则有四五万两之多,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足买良田数千顷,但他留给四个儿子的只是每人五千两,共两万两,只是他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其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

用来周济帮助穷困的亲友、寒士,或用于助学兴教、赈荒救灾等公益事业。光绪五年,当左宗棠的儿子们携家眷赶来兰州总督府与他团聚时,他又明确要求:“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sup>[7]</sup>通过家书,左宗棠向家人灌输了此类家规家训,其家人多学有所成,不沾父亲的“光”,靠自己的知识技能在各行各业为国家做出了贡献,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 二、左宗棠家规家训深受中华文化熏陶

左宗棠家训倡导热爱祖国、反对分裂、简洁奉公、要求子孙刻苦读书明理,贵在力行致用,要永保寒素家风,力戒各种恶习等。体现其深受中华文化中精忠爱国、克己奉公、清正廉洁、追求“大一统”、重教从善等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

### (一)左宗棠家规家训深受中华文化讲求精忠爱国思想的影响

左宗棠受的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忠君”思想虽然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而大力提倡的,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以“忠君”“忠于朝廷”等狭义的忠诚逐步延生出对祖国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形成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这种爱国主义可以说是质朴的情感和品性,它也是爱亲爱家爱乡情感的升华。由此形成一种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品德。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忠君报国历来被看作是“大节”。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也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特别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机存亡之际,各民族人民都起来反对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保家卫国”不屈不挠,不惜以身殉国,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在多次外族入侵面前之所以没有亡国,与这种爱国主义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左宗棠在家规家训倡导的忠君爱国思想,虽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从主流来讲,其为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而做事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 (二)左宗棠家规家训深受中华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影响

四海一家,协和万邦是我国的人民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的心理趋向和精神模式,先秦时期,华夏

的初民们分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创造着璀璨的多元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珍珠般地镶嵌在广袤的中华大地。秦扫六合,天下归一。西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以维护中华帝国的统一。董仲舒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得到武帝的支持,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董仲舒特别强调儒家“大一统”思想,认为大一统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将大一统思想推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后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大一统思想的内涵因此也相应地扩大为万民归心,国家统一。大一统观念成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基础,成了中华文化的永恒主题。<sup>[8]</sup>左宗棠捍卫祖国统一,坚决同沙俄及阿古柏等势力做斗争,维护祖国统一在其家书中皆有陈述,其思想深受“大一统”思想影响。

### (三)左宗棠家规家训深受中华文化克己奉公思想的影响

中华民族由于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培育了一种整体主义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克己奉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美德。中国伦理道德历来把“公义胜私欲”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公”之核心是去私欲,“背私之谓公”。奉公必须克己,克尽己私便是公,亦即是天理。但它并不完全反对私利,关键看它是否合乎道德。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中国人历来以“廓然大公”、“天下为公”作为价值理想。中国文化中的大同境界。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其基本精神都是一个“公”字。在这种精神的培育下,我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爱国爱民,为民族为社会舍小家顾大家的杰出人物。左宗棠家规家训对自己、亲属要求严格,提倡清正廉洁,不搞特殊化,其思想源流就是中华文化所提倡的克己奉公思想。

### (四)左宗棠家规家训深受中华文化清正廉洁思想的影响

清正廉洁,意为高洁、清白、廉正、俭约、公正、明察,它既是对为政者的要求,也是一般人应具备的品德,因为无“廉”则不“洁”,无“廉”则不明。“廉者,清不滥浊也”。清白不污,纯正不苟,为“廉洁”;能辨是非,以义取利,是“廉明”;能自我约束而不贪求,是“廉俭”。“廉”的根本是在取予之间,取道义,去邪心,

严格自我约束。法家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有了“廉”，便可能做到“正”。“正”的具体表现是“正直”、“公正”、“正气”。“正”即是遵循公义和道德。清正廉洁既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人共有的美德。历史上的那些清官谏臣，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体现了“清正廉洁”的美德，才受到广大人民的称颂和尊敬。如官居卿相，身居陋室的魏征，“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的诸葛亮，清正直道的包拯，刚毅不阿的海瑞等。左宗棠家规家训倡导的正清廉洁，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防止腐败思想行为的发生就是受中华文化中这一思想影响的表现。

(五)左宗棠家规家训深受中华文化勤劳节俭思想的影响

中国人民历来就以勤劳节俭著称于世。他们以劳动自立自强，形成了热爱劳动，吃苦耐劳，诚实勤奋的优秀品质。与此相联系，中华民族又有尚俭的传统。对劳动者来说，“俭”就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珍惜。孔子说：“与其奢也，宁俭”。他把“温、良、恭、俭、让”作为重要德目，强调节俭戒奢。老子提出为人处世的“三宝”是：“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二十九章）。墨家主张“节用”、“戒丧”。诸葛亮提出“俭以养德”。左宗棠提倡节俭，并且以身作则，让子女及家人严格落实。也就是管好了身边的人，管好了身边的事，这便是中华文化中勤劳节俭思想深刻影响其家规家训的体现。

(六)左宗棠家规家训深受中华文化勤学求索思想的影响

中华民族勤学求索的美德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光辉灿烂的根源之一。《周易大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鼓励人们要像日月星辰永恒运转那样，应有一种刚健有力、勤勉进取的精神。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孔子称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本人也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师徒二人这种身处逆境，发奋学习，锐意进取的精神，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落第不落志，从50多岁开始写作《聊斋志异》，直到70多岁的暮年才完成这部有430余个短篇文章的巨著。左宗棠就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劝勉其重视学习，

少一些不必要的应酬。

三、弘扬中华文化之传统美德，从家风家规入手，深入推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华传统美德对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着不可替代的现代价值。左宗棠家规家训深受中华文化之传统美德影响熏陶。作为一名“高级干部”，左宗棠的家规家训为我们推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家规家训的文化载体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陶冶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的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家规家训入手，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中的传统美德。传统美德是推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之一，如“尽忠报国”的“忠”奠定了爱国主义传统的基础；“克己奉公”的“公”奠定了为国家奉献的精神；“大一统”的思想奠定了维护祖国统一的思想；“清正廉洁”古今皆是干部应遵从的铁律；“勤劳节俭”、“勤学求索”更是与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需要弘扬这些优秀品德。当下,个别领导干部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贪污腐化,还出现了配偶、子女一起参与腐败的现象。纠正这些不良风气,必须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弘扬传统美德,发扬好的家规家训是一个重要途径。它可以启迪人们的心智,净化人们的心灵,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风廉政建设。现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按照党的二十大确立的奋斗目标他和战略部署,一步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从加强领导干部家规家训教育培养入手,做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对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基础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左宗棠的家规家训值得领导干部深入研究学习,做到人人有家规、家家有家训,在思想和行动上与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 参考文献

- [1]彭大成、杨浩.左宗棠的家教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3):95-96.
- [2]左宗棠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7:163.
- [3]左宗棠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7:157.
- [4]左宗棠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7:228.
- [5]左宗棠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7:196.
- [6]左宗棠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7:6.
- [7]左宗棠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7:121.
- [8]陈喜波、韩光辉.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3):58.

责任编辑:闫丽红

(上接第65页)

让志向、兴趣等成为他们人际交往、民间交往的主题;三是或可考虑初步建设外国来华留学人员基础数据库,协同配合有关部门全面技术排查外国来华留学人员使用国内社交平台的所有网络行为,及时辨别反华、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潜在危险人物,长期秘密监测形成专报供有关部门研判。

#### (三)培养和造就一支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工作队伍

党的留学人员事业再前进,离不开一支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有生力量。作为蕴含时代变革精神的基本特征主要有:(1)这支队伍遍布不同岗位、不同职位、不同领域、不同层级,是积极奋斗争取希望、英勇无畏、放下小我、努力实现大我的一批先锋性、模范性、能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的、具有显著“新时代青年”特征的先进份子组成的工作队伍;(2)这支队伍致力于充分发挥“三大法宝”中“统一战线”的工作魅力,致力于把不同情况的青年朋友们团结凝聚起来,让先锋青年成为国家治国理政后备军,让党集中统一领导起来的青年群体成为团结报国、为国奉献的中坚力量;(3)这支队伍具备较高程度的统战视野、统战特征、统战能力、统战水准,是具备一定认知本领、

达到一定认知水平、能够实现一定认知价值的、能够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基本社会需要、基本发展需求的自觉觉醒的群体;(4)这支队伍勇于面对充满新的变革性要素、充满风险与挑战的时代,时刻不忘探索党的留学人员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始终保持投入饱满情感、思想自觉式的积极工作,始终努力以“新时代统战人”的博大胸怀和担当精神去践行“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5)这支队伍始终做到绝对忠诚于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实践成果惠及大众作为成长的动力之源,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把青春和汗水洒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道路上。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0-21.

责任编辑:常海哲



# 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达文梅

**【摘要】**兰州民俗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的积淀,是祖辈们传统习俗的升华和时代发展的结晶,它是一种生活事相,是一种文化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总目标,为我国乡村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描绘了美好蓝图。民俗文化是乡村社会重要的传统文化,乡村振兴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引领,有了乡村文化,乡村振兴才会有魂。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文化振兴之路,努力改变乡村精神面貌,提升乡村文明程度,才能给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内驱力,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民俗文化 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

## 一、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

民俗是指民间风俗生活,民俗文化又被称为传统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民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贴近人们生活,体现风土人情的文化。宋代《图经》称,兰州“蕃汉杂处,各从其俗”,就是说兰州是个多民族地区,风俗各异,相互包容,具有从古至今的文化遗产体系。历史上经历多次大的人口迁徙,带来了民众各自家乡的民俗事象,跟本土习俗互相融合,使兰州地区的民俗文化异彩纷呈。兰州民俗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的积淀,是祖辈们传统习俗的升华和时代发展的结晶,它是一种生活事相,是一种文化模式。可以说兰州民俗文化是兰州人所创造的生产贸易民俗、衣食住行民俗、社会家庭民俗、人生礼仪民俗、生态科技民俗、岁时节令民俗和语言文学民俗等民间信仰的总和。2000多年历史的形成并保留了富有特色的传统历史文化和民间文化为主体的祠堂、庙宇等古建筑和商业遗址,各式民居别有风味,舞龙、舞狮,饮食等民俗文化长盛不衰,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不可多得的开发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乡村文化却几近凋敝,阻碍了乡村振兴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总目标,为我国乡村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描绘了美好蓝图。报告里谈到的生态、乡风和治理与民俗文化紧密相连,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经济和社会振兴,还包括文化振兴、教育振兴和生态振兴等全方位振兴,而利用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是必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无论是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还是标志文化生活质量各类活动,都与乡村相距甚远,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使传统文化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和作用,逐渐被关注。民俗文化是乡村社会重要的传统文化,乡村振兴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引领,有了乡村文化,乡村振兴才会有魂。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文化振兴之路,努力改变乡村精神面貌,提升乡村文明程度,才能给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内驱力,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 二、民俗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教育陷入“城挤村空”的危局。许多农村家长为了让孩子受到更优质的教育,纷纷背井离乡去城市打工,传统的乡村文化逐渐削弱,很多传统的节庆习俗,民间手艺失传,导致乡村文化陷入断裂危机。文化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还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繁荣乡村文化、保护乡村文化遗产、不断丰富乡村文化活动,对维护乡村生产生活

**作者简介:**达文梅,女,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兰州市西固区教师。

秩序和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作用。

### 1. 民俗文化是乡村振兴的资源宝库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他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农为本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农业养育了我们的民族,同时也孕育了博大精深、灿烂独特的中华文化。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农村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土壤。非物质文化遗产孕育于各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他们异彩纷呈,弥足珍贵,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

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兰州在长期的文化融合中,就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衣食住行、生产贸易、人生礼仪、生态科技、岁时节令、语言文学、民间游艺等异彩纷呈的民俗活动。乡村振兴,要走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之路,就必须充分挖掘与发挥民俗文化的优势。比如,我们可以有意识的打传统文化的广告,将岁时节令民俗与绿色安全食品理念相结合,将传统的山水田园观念与健康养生观念相结合,将传统的民间游艺民俗与自然教育相结合,建设田园综合体项目,集休闲教育、旅游体验、文化传承于一体。

### 2. 民俗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精神纽带

截至目前,乡村的凋敝与衰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有在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传统节假日时段或婚丧嫁娶时,才会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可见,春节记忆在乡村社会中仍有强大生命力,修庙祭祖仍在乡村中具有强大号召力,婚丧嫁娶仍然是构建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传统文化担负着凝聚人心的功能。正是在传统的召唤下,人们才愿意纷纷回到农村,节日中那种其乐融融、亲密无间的氛围,无形中在人们心中埋下了乡愁的种子,使得人们愿意回乡反哺。如:近年来,乡村修庙轰轰烈烈,乡民通过共同捐资修庙、共同祭祀、共同管理,形成了一个核心的组织团体,自发维持村庄的秩序。同时,人们为能祭拜祖先而感到高兴和自豪,弘扬祖先留下的家规家训等优良传统,香会、庙会等活动,被赋予了除信仰兴趣以外新的意义,文化传承成为村落中心的价值认同。民俗文化不仅在匡扶人心、提升道德水平方面具有不

可忽视的作用,而且有效抵制了境外反动思想的渗入,成为乡村振兴的精神纽带。

### 三、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若干举措

#### 1. 利用非遗资源,重建乡村传统

众所周知,乡村的衰败,表面看是村空问题,实际上是精神的衰败与崩塌。如果没有宗族观念,乡村便缺乏有力的精神支撑。精神重建非外力所能及,必须从内部去培育,激活内部资源,方能让乡村精神传统复归。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精神支柱。在民族精神的沉淀过程中,氏族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民间,它主要是通过族规祖训、家规家教等形式,将儒家推崇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爱悌”等行为准则传承下去。通过历代不断地修立祖墓、家祠和族谱,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氏族后人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大量史料考证,氏族文化价值观已深深扎入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血肉,由氏族文化形成的精神“气场”,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精神归属和精神家园。

乡村精神的重建需要依托与载体,全景呈现乡村历史风貌,全面激发村民爱乡热情,强化凸显乡村文化之美。以兰州市西固区达川镇的“达”姓为例,姓氏文化源远流长,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据文史专家研究,达川镇达氏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后裔,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明肃靖王在小西湖一带修建园林,迫使金城达氏一脉重迁别居。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先祖哈纳牙六世孙达敬复插旗于金城西八十里古台,改名为达家台。明天启年间,达尚举诸公率户众新辟盐池、啞旦二沟。从此,金城一脉达氏祖先弃仕从农,落业耕耘,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为争夺生存权历尽艰辛,形成了独特的达氏文化。可见,村落的信仰和伦理道德的振兴,是乡村精神振兴的重要基础。

#### 2. 传扬乡贤文化,参与乡村治理

乡贤是民间社会的代表,在村里具有一定的权威,扮演着乡村精英的角色,很多乡贤在乡规民约的制定与公共事业的开展和乡村治理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曾参与兰州市西固区民俗文化馆的筹建工作,接触了西固当地的十大乡贤,其中不乏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他们都已步入耄耋之年,却鹤发童颜,思维清晰,精神饱满,致力于地方文化建设。他们身体里流淌着乡土文化的血液,热心公益,为人楷模,有口皆碑。在西固民俗文化馆的筹建过程中,我认识了西固柳泉乡的一位乡贤,他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铁芯子”的传承人,建了柳泉非遗文化展览馆,挖掘柳泉宗族文化,撰写了家谱,还号召族众建成了柳泉碑林,后来该村被评为兰州历史文化名村。西固区达川镇的乡贤达毓相,现已98岁高龄,耳聪目明。他在古稀之年挖掘乡村“达姓”历史文化资源,并号召族众筹措资金,建成“达氏史馆”。可见,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民众,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上的力量,对于乡村振兴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我们需要挖掘“新乡贤”的人力资源,鼓励他们回归乡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如温州市政府2013年以来,出台优惠政策,盛邀在外温商回归投资,打造“归雁经济”。这一举措,也在无形中引导着有乡村记忆的民间能人、匠人、文化人纷纷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因此在乡村振兴中,要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

### 3. 留住乡村记忆,促进乡风文明

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民居、民具、古村落等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生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留住乡村记忆、促进乡风文明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各地应启动承载着“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的乡村记忆工程,具体来说,就是在文化遗产和文化底蕴深厚的乡村和社区,因地制宜建设民俗生态博物馆、乡村博物馆,收集和展览富有地域特色、文化特色和群体记忆的文化遗产,包括家谱族谱、地方志、非遗影像资料、乡土建筑、街区遗产、农业遗产、工艺、服饰、风俗礼仪、节庆习俗等,实现对乡村记忆的整体性保护。

### 4. 提炼民俗智慧,讲好乡村故事

村落的信仰、村落的伦理、村落的物质生活、村落的公共空间,都需要村落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去关心它,把村落的事情变成大家的事情,开展有传统乡村记忆内容的各类活动,是增强乡村凝聚力的重要方式,也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手段。历史上的乡村都有一个民众生活的公共空间,民众在饭后茶余聚集在一起拉家常。当前的乡村振兴,也需要开展乡村性的集体活动,调动民众参与乡村公共生活的积极性。如“乡村食品制作体验馆”等,让民众彰显技艺,增强乡村人际互动,既有利于乡村社会的团结,又有效促进了乡风文明。“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继承和创新、发展和创新是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高度重视的问题。“中国记忆”是讲好“中

国故事”的基础,“乡村记忆”是讲好乡村振兴故事的基础。乡村振兴从长远来说需要提升乡村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这就需要讲好乡村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故事,讲好乡村振兴故事,传播村落声名、吸引外来资源、提升人气。

### 5. 发展智慧产业,助力乡村经济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龙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乡村最重要的是生计资源,特别是几百年的村落,它有自己的生存基础。乡村振兴,就是要挖掘地方的生计基础,寻回它的特色手工艺,让它在新的社会条件之下,能够找到它的生存发展之道。乡村振兴不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化的东西,我们要根据每一村落的个性进行设计,做到一村一品。比如:白银市黄河大川渡口的顾家善就被冠以“花村”的美名。初入村庄,便可看到墙上的轮胎里、篮子里、地上的大缸里、盆子里,满眼都是争奇斗艳的花儿,百年古柳也浑身散发着“仁、义、礼、智、信”的文化气息。这里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营,但却让你感觉不到一丝商业味道。走累了,可以去品尝当地的风味饮食:臊子面、凉面、浆水面、洋芋面片、玉米饼、月饼等,热情好客的顾家善会让你情不自禁放下远行的背包,找到家的味道。经过几年的经营,顾家善已经成为白银传统村落旅游的品牌。

几百年、几千年的乡村生活发展变迁史,是民众最深刻的乡村记忆,构成了一个地方的文化资本。乡村振兴,文化先行,就是要找回人生礼仪、民俗游艺、民间体育、民间游戏等文化资源,发掘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利用价值。总之,我们要激发村落社会内生的力量,总结提炼乡村的民俗传统资源,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才能实现村落内涵发展的振兴之路,乡村振兴任重而道远。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论述,参见《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新华网。
- [2] 2016年,笔者参与西固民俗文化馆的筹建,进行乡村走访调查。资料参见《达氏族谱》,1994。
- [3] 史乃聚.深刻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内涵[J].人民论坛,2019(28):72-73.

责任编辑:常海哲

## 来稿格式规范

我院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来稿。为使来稿得到迅速与妥善的处理,敬请作者注意如下要求。

一、来稿应依次包括:主题、作者简介、单位、邮编、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如是基金项目,请注明项目编号。

二、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职称、职务、单位全称、通讯地址、邮编、电话。

三、参考文献统一格式

1、期刊类:[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例如:[1]王海粟.浅议会计信息披露模式[J].财政研究,2004(1):56-58.

2、专著类:[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例如:[2]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

3、报纸类:[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例如:[6]李大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光明日报,1998-12-27(3).

4、论文集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可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如:[7]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炜.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

5、学位论文:[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例如:[11]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1-7.

6、研究报告:[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例如:[12]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9-10.

7、条例:[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

例如:[13]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Z].1991-06-05.

8、译著:[序号]原著作者.书名[M].译者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例如:[14][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0.

9、电子文献:[序号]电子文献作者.篇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标识】.文献出处.日期。其中,【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标识】为:【J/OL】网上期刊、【EB/OL】网上电子公告、【M/CD】光盘图书、【DB/OL】网上数据库、【DB/MT】磁带数据库。

例如:[15]学术堂.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要求【EB/OL】.

<http://www.lunwenstudy.com/cankaowenxian/130239.html>.2018-03-14.

四、注释

注释是对论文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前面用圈码①、②、③等标识,放在加注处右上角。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编辑部

